

馬東發表時局聲明
提出和談八基本條件
並令共軍於實現和平前繼續作戰

平郊各鄉昨小有進展
津情勢頓于險境

報告當前局勢

華北剿匪昨集會

世界日報

和平使者昨欣然出城
往晤葉劍英呼籲兩事
休戰十日進行談判並勿再放令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第一版

立報
TAIWAN THE LIBERTY

今日天氣

世界日報
議會務政院閣令政府行
件條八黨共復答面

Lib Pao
息消後最 報立 息消後最

自由人

世界日報

蔣總統昨午在官邸
海陸空三軍

民生報

小世界
大義正心人起然
鐘山自界世鳴高
對星萬一

教育部擬設「專士」學位
「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施行與否
尚待部內決定、政院點頭、立院通過

慶祝建校四十六年
政大學生齊跳舞



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百歲誕辰專輯

效法舍老精神—紀念成舍我先生百年冥誕

舍老對子女的「三不」者，就是對子女的出處，不干涉政治傾向，不干涉宗教自由，不干涉婚姻、職業自由。又說，每天下午四、五點鐘時，舍老常在客廳中讓子女們發表言論，無話不談，但總是無法戰勝舍老的辯才。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葉明勳

舍老一生的志業，
在大陸為辦報，在台灣為培育新聞人才。
前者，
立報的風格，
為小型報獨樹一幟；
後者，
為新聞人才缺乏的苦難中國，
培育專才。

歲月不居，成舍我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日忽焉悖至，緬懷舍老一生行誼，典範宛在，令人永遠不忘。

舍老作古後，我曾撰文追悼，刊於八十年傳記文學月刊，對於舍老一生為人不及之處，認為至少有下列四點精神：

- (一) 盡瘁新聞事業
- (二) 涓滴歸公
- (三) 儉以養德
- (四) 事必躬親

凡是曾經追隨舍老的人，對上述幾點，在生活體驗中都有見賢思齊的感覺。這種遺澤在人，今日追思，倍有斯人不可見的悵惘。在世新創校四十周年紀念時，特別提出效法舍老的精神，舍老從大陸到台灣，他對新聞事業的擇善固執，不以困難而退縮，不以阻力而氣餒，能成人之不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對國家社會所賦予的責任感，充滿磅礴堅毅的正氣。

最近我讀到美國世界日報所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圖書館成立「成舍我紀念基金」的新聞，附刊特稿中嘉玲校長還提到舍老對子女的「三不」者，就是對子女的出處，不干涉政治傾向，不干涉宗教自由，不干涉婚姻、職業自由。又說，每天下午四、五點鐘時，舍老常在客廳中讓子女們發表言論，無話不談，但總是無法戰勝舍老的辯才。

舍老思想的開明從此可知，胸襟的寬宏，。與見識的超脫世俗，卓然而有獨特的風範。如民國七十一年大小姐之凡女士，在巴黎以「選我就是選和平」為口號，競選總統。現在大陸為外交官的二小姐幼姝女士，與擔任大陸全國人大委員會副委員長的獨子思危兄，便可以事實證明他們的行徑，舍老都未加以干涉，父子之間，如此充分獲得自由，這是難得可貴的。

舍老一生的事業，在大陸為辦報，在台灣為培育新聞人才，兩者都是屬於新聞事業。前者，他在戰前十里洋場的上海所創的立報，小而美，精闢的風格，為小型報獨樹一幟，民國七十七年已在台復刊，現在四小姐露茜主持仍然保持原有的風格，無愧舍老已得其傳人。而後者，舍老希望能為新聞人才缺乏的多難中國，培育專才，當初筆路藍縷，不能不佩其深具遠見。如今世新創校已屆四十二年，舍老桃李滿天下，嘉玲校長繼承父志，親炙庭訓，憑她的才智、學識、能力，都足以為世新廣拓新的境界。我已從嘉玲、露茜兩人的身上，見到舍老的影子，這是足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靈的。

目前台灣是一個多元化充滿競爭力的社會，也是知識的時代，沒有進步，就是退步。我們唯有效法舍老的精神，始能站在在時代前面，不為時代所淘汰。世新歷屆畢業校友，不乏傑出人才，無疑的將是世新發展最大的人力資源。我們懷念舍老，亦為世新寄以祝望，毋負舍老創校的精神與意願。

哲人日已遠 典型在夙昔

舍我先生於民國八年任「益世報」主筆時，適逢五四運動爆發，眼見當局將對學生採取暴力行為，而輿論界懾於北洋軍閥權勢，噤若寒蟬。舍我先生不顧安危，奮筆撰發「安福與強盜」社評，嚴詞痛擊軍閥暴行，全力支持學生運動。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余紀忠

舍老先生辦報，
在乎追求一項理想實踐的志業
也認定要辦好一份報紙，
必須抱持，
「編輯至上，內容第一」的準則。

我國現代新聞事業，從萌芽到今天一百多年的歷程中，啟蒙導正，思深慮遠，披荊斬棘，鏗而不捨的報人，舍我先生無疑是備受尊敬的前輩典型。

舍我先生在十一歲時，因其尊翁成璧任舒城典史，以監犯暴動事被誣，幸得上海「神州日報」記者方石蓀查明事實，撰稿澄清，公諸於世，冤抑得申。從而意識到新聞事業對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及影響力。遂立志投身新聞事業，以發揚正氣，為民眾作喉舌，為政府進諍言。這是舍我先生一生事業的發軔，也是他終身堅持奮鬥的使命感。千里之程，起於跬步。可以在先生身上獲得印證。

舍我先生從民國二年擔任安慶民晷報記者，過往轉任天津世報主筆開始。以後為實踐自己理想，而自行辦報。其重要者如民國十三年在北京創辦「世界日報」民國二十三年在上海創辦「立報」，二十六年上海淪入日寇鐵蹄，立報隨即於二十七年春天在香港復刊。香港淪陷後，即轉往重慶，於抗戰後期，即開始劃抗戰勝利後之擴大辦報規劃。「世界日報」、「世界晚報」、「立報」相繼在重慶、上海、北京復刊。直到大陸變色，播遷來台，政府實施「報禁」，舍我先生雖以立法委員身分，屢屢呼籲開放新報設立，均未獲結果。但仍在他創辦的世界新專中以學生實習為名，不公開發行「小世界」。規模雖小，仍由他親自監督指導。內容及編排，普獲新聞界肯定。舍我先生對於辦報的執著，屢仆屢起，不屈不撓，

於此可見。

舍我先生辦報，在乎追求一項理想實踐的志業，也認定要辦好一份報紙，必須抱持「編輯至上，內容第一」準則。在這一前提下，他在辦報的過程中，盱衡國家社會的大環境，而訂定階段的目標。譬如他在民國十三年在北京創辦「世界晚報」，鑑於當時的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社會風氣閉塞，以及「立場堅定、言論公正、不畏強暴、消息靈通」的宗旨。二十三年創刊「立報」，以當時民主思潮蓬勃興起，而外侮日極，政府必些有所作為，遂以「對內督措政治民主，嚴懲貪污，對外爭取國家主權獨立，驅逐敵寇」為標竿。二十七年「立報」在香港復刊時，日寇節節進逼，少數人士對國家前途信心動搖，乃提出「立場堅定、打倒漢奸、革新政治」為方針。辦報於此可見。舍老先生辦報，一則配合時勢之需求，再則堅持一貫之精神。必忠必信，始終不渝。

舍我先生辦報期間，報紙發行人，雖未普及，然主持言論者，均為意見領袖，時代俊彥，風行草偃，影響所及，往往形成強烈之輿論，足以立竿見影左右政局。如民國四年，洪憲帝制積極進行之際，梁任公即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一文，筆力千鈞，使帝制派望風披靡。又如二十五年西安事變，主帥被拘，全國惶惶，平日以立場公正，批評政府不遺餘力之大公報社論，由張季鸞先生執筆「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痛陳利害，顧全大局。舉國翕然從風。

而舍我先生於民國八年任「益世報」主筆時，適逢五四運動爆發，眼見當局將對學生採取暴力行為，而輿論界懾於北洋軍閥權勢，噤若寒蟬。舍我先生不顧安危，奮筆撰發「安福與強盜」社評，嚴詞痛擊軍閥暴行，全力支持學生運動。雖導致報館被封閉四日，總編輯遭拘捕。舍我先生亦從此成為北洋軍閥眼中之釘。但在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之下，軍閥備受壓力，不敢濫施淫威。舍我先生嚴於斧鉞的文筆，及其所表現的浩然正氣，可說與梁、張兩氏，互為輝映了。

然而在當時的環境下，直士抗言，是要付出代價的。舍先生在批北洋軍閥逆鱗的過程中，即有多次遭受牢獄之災。其中尤以民國十五年八月，因抨擊奉系軍人，被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扣押一案，情勢最為危急。命在旦夕。幸獲孫寶琦竭力營救，始免於難。舍我先生以追求正義為目標，置生死於度外的精神，至今尚為新聞界所樂道，且敬佩不已。

舍我先生除辦報外，又以前瞻之目光，認為今後新聞事業，將隨時代潮流而日益蓬勃。欲有質量並重之大傳媒體，必須培育人才為要務是圖。

因此早於民國二十二年即創辦「北平新聞專科學校」。抗戰期間又在桂林創設「世界新聞職業學校」，四十八年升格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復於年前獲准改制為「世新大學」。手定「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為校訓。四十餘年來，培育新聞專業人才，難以計數，分布各傳播媒體，對於台灣新聞事業的蓬勃發展，卓具貢獻。舍老先生歸道山後，由其女公子嘉玲接任校務，並由新聞界耆宿葉明勳先生出任董事長。近年校務蒸蒸日上，舍老先生的志業，得以垂諸久遠，日益發皇。

舍我先生畢生致力新聞事業，將近八十年。他比我年長十一年。其在北方及上海辦報時，我雖久深嚮往，但無緣接觸。迨至抗戰後其在重慶家樞口黃少谷先生家中，初次見面。以後幾經過從請益，彼此認識加深。來台以後，彼此同為新聞奉獻心力。交往的機會也就增加，在此這位堅守報人風骨，「百折不撓的先進百歲冥誕」之辰，特撰此文，以誌高山仰止之忱。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張怡欣 2005/07/21)

追思成舍我先生

舍老告我：「立報的立字，較申報的申字，更易發音，更便利報販的叫賣。立報之義，是要在上海立得住。再者，人要能立，國要能立，立之義大矣哉。不過我的靈感是得自閘北火車站的報販叫賣聲。」

——文章出處 [《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張佛千

舍老的基本事業，
是北平的世界日報及晚報，
又在南京辦民生報，
還要在上海辦立報，
我們戲稱之為報閥，
是中國新聞史上
以個人辦多家報紙的第一人。

我初識成舍我先生（以下簡稱舍老）。是在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他在南京創辦的民生報因為揭發行政院政務處長彭學沛經手建築行政院官署貪污弊案，行政院長汪精衛一怒之下，封閉民生報，拘押舍老四十日。其時我在北平主辦「老實話」旬刊，撰文仗義直言，置於雜誌首頁。措詞強烈。「老實話」被認定是「藍衣社」的刊物，在蔣汪合作中，如何可以罵汪。

閱世界日報知舍老已安返北平。第二天，忽然舍老來訪。他說：「全國無人像你這樣的為我講話。」舍老的基本事業是北平的世界日報及晚報，又在南京辦民生報，正要在上海辦立報，我們戲稱之為「報閥」，是中國新聞史上以個人辦多家報紙的第一人。這樣一位大人物竟然光臨小小雜誌社，真令我大吃一驚，從此我們經常往來。

舍老在上海辦立報，最費經營。上海已有申報與新聞報兩大霸主，是行銷全國最廣最多的報紙，要別張一軍，談何容易。舍老告我，他採取法國巴黎某報四開型，也可裝訂成雜誌。小報的型式、大報的內容，是小報型的大報。

為什麼叫「立報」呢？舍老發現：上海報紙最大的零售市場是閘北火車站，由上海通首都南京（蕪湖），由上海通杭州（寧波），沿途人文薈萃，財富聚集，每天上下旅客數十萬之多，大都利用在車上的時間看報，

報販很多，都要利用上下車的幾分鐘急迫的叫賣，申報只是兩個字，所以都叫「申報、申報」，與申報齊名的新聞報以及四個字的報名，只是間歇地叫一次。舍老告我：「立報的立字，較申報的申字，更易發音，更便利報販的叫賣。立報之義，是要在上海立得住。再者，人要能立，國要能立，立之義大矣哉。不過我的靈感是得自閘北火車站的報販叫賣聲。」立報發刊以後，我每月都要由上海到南京一次，在車站經常聽到報販的急叫：「申報立報」「立報申報」，便感到舍老用心之細。

立報的編輯也獨具特色，各報都採用國內外通訊社的新聞電訊，英、美、法、德、俄、日都有大通訊社，國內也有中央社及其他通訊社。各報通常都只是分類並列。立報則是將各通訊社的電訊，加以整合分析，重新編寫。當然這是一個大工程，總編輯薩空了先生告我：他每晚九時上班直到十二點。「屁股不離板凳」，寫好國外國內兩大類的特稿，也是立報的頭條，也幾乎是立報第一版的全面。其他國內某種新聞如果資訊繁多，各報編輯也要加以重寫。使讀者在簡明的文字中，系統了解國內外大事，讀過立報即可不讀申報，但讀過申報仍願在讀立報。

舍老預測立報初期可能廣告不多，他卻將廣告價格訂得與申新兩大報等高，因此他宣布：在立報銷數不達到一定數量（數字記不得了，應該是五萬至十萬份）不接受廣告，後來達到預定銷數時，宣佈開始接受廣告，廣告即如雪片飛來、增加篇幅，新聞內容只增不減。舍老告我：「銷路只要達到一萬以上，即可自給，不接受廣告並非冒險。」

舍老創辦立報時，所有的朋友及同業，都十分存疑，為他擔心；只有他一個人深具信心，揚帆前進，終於打破常例，創出小報型的大報，在上海申新兩大報稱霸之下，成功而「立」。

一九三七年秋全面抗日戰爭開始，軍委會政治訓練處袁企止（守謙）處長出示蔣委員長親筆手令，要在北方的石家莊與南方的蘇州創辦「陣中日報」，企公要我全部負責，我只願負責一地，選擇了蘇州。企公問我何時可以出報，我說：「最好是九一八」。當天是九月十二日，只有五天籌備，赤手空拳，什麼都沒有，那時年輕，只知打帳是何等急迫之事，也不知什麼是難，越難越要闖，當天下午組成四個人的班底，第二天一早乘火車出發，本來只有六小時車程，因日機不停轟炸，晚八時才到蘇州，在剩下四天籌備時間內，我們居然有了捲筒機、鉛字設備一應俱全，有了收發報機，可以接受中外電訊。最大的難題是如何能將十萬份報遵照蔣委員長手令當天拂曉送到長達一百里三角型陣地五十萬國軍手中？而且駐地是機密，部隊又隨時調動，在我們沒有一輛車、一個司機，也沒有軍隊

駐地資料的情形下，全部解決了，實際上我只花了兩天一個整夜的時間。（詳見拙文「值盾揮毫入戰場」，聯副刊載，即將結輯出書。）

我得到兩位名報人的讚賞，第一位就是舍老。陣中日報就是採用立報的形式。我們沒有副刊，向上海所有名家徵得的詩歌小品，都排在各版新聞之中，因而版面活潑多趣。也仿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方式，特向全國學人徵稿，在神聖抗戰的金字招牌下，來文踴躍，乃改為不定期隨時刊出，稿費比任何大報都高出很多。又邀請上海漫畫家以葉淺予為首組隊到戰地寫生，製版以整個版面刊出，是各大報所未有的特色。又發動「兵寫兵」，也有佳作。又特闢「戰地服務欄」，因為各省都派兵參戰，失去聯絡，在本欄尋人者上千上萬，增闢全版。

我在蘇州長打電話向舍老請教，舍老也常來電話對增版及頭條大標題多次特加讚美。陣中日報每天有幾千份寄贈全國機關團體及個人，我撤退到漢口，初謁張季鸞先生，他竟然一見面即提到他每天都看我寄去的陣中日報而大加贊譽。他又說：「籌備一份新報，都要一兩年的時間，抗戰後各報包括大公報，搬個家也要三四個月，而你竟只用了短短的五天！」我說：「他們是打陣地戰，我是打游擊戰，不能並論。」他說：「陣地戰有人有錢，游擊戰無中生有，更難更難！」我辦陣中日報不到兩個月，也不對外發行，卻得到這兩位最有名的報人讚譽，是難有的榮幸。

我退到武漢後，又與舍老相見，向他請教：今後如何辦理適應全面抗戰的陣中日報？不久，他派專人送信內附長文：「紙彈亦可殺敵」，要我加註意見，再交各報發表。內容正是陣中日報的新計畫，大意是：在中央設立陣中日報的「母報」，自設電台，版面編好後，用可以自行校正的兩種波長發到全軍以團為單位、全國以縣為單位的「子報」，子報配備一部小型收發報機，一部英製吉士特式速印機，有電源可以電動，每小時印三千份，無電源亦可手搖，可印三色，收發機及速印機一人可挑、接收母報的電訊、寫臘板、印刷、全社三四人即可，充分適應戰地移動的需求。統帥的訓示，中央的政令，翌日即可傳遍全國全軍，這一創見，在世界新聞史未之前有。正在此時，我因為陣中日報有許多名家的詩文圖畫及許多感人的戰場故事，都值得再宣傳，乃編印「陣中日報紀念特刊」，如四開大型雜誌，篇幅很多（頁數不記得了），即將上架付印，得到舍老此文後，特刊首頁、連同為大公報寫戰地通訊名噪一時的范長江、來函與我談戰地採訪；北閩時期女兵謝冰瑩、名作家向培良來函與我談戰地報紙及軍中文藝，排成兩全頁，加一大題「四封書」，一夜之間趕工付印，所以能與各大報同日發表。

舍老之文轟動一時，受到身兼九要職的軍委會政治部長辭修將軍的注意，即請舍老負責辦理，舍老因自辦的報紙移轉後方，不能分身，所以薦我，說是在蘇州辦陣中日報卓著成績。辭公立即召見，接談之下，即命我負責。辭公在政治部特成立「設計委員會」，在記者會上宣稱此為他的智囊團，網羅各黨派首腦社會顯達學者專家，舍老當然列名，辭公當即手令聘我為設計委員，我是年齡最輕，唯一沒有喝過洋墨水的委員。

消息傳出後，有人就向辭公建議，由他們辦母校的電台，一則抓住了電台就可控制報社。二則購置機器有利可圖。辭公特以此相詢，我說：「電台既要機器設備，又要運用機器的人，國內人才缺乏，物色既難，培訓不易。而且要花大量經費，現在打仗，國家又窮，我們要打省算盤。中央社的電台，機器與人才都很完備，不但有維修的能力，而且力求自造，我們只要與中央社訂約，每天撥給我們幾十分鐘拍發電訊，我們只付租費，省錢又省事。」辭公連連點頭，我覺得話要說清楚：「我請求容許我直言，可能有人說中央社是CC辦的，我覺得國家真的要亡了，我們還要分派系，蕭同茲社長我至今未見過面，我相信以您的大度量魄力，一定可作無私的領導。」辭公滿面笑容說：「好，好，你的意見很好，將來由你與中央社全權商定。」

陣中日報的籌備工作最重要的一項，是購買舍老所指定的英製吉士特速印機。這時所有需要外匯進口貨，都集中在香港辦理，由宋子文弟子安（子良？）駐港控制。原則上集中外匯進口軍需物資，如武器、彈藥、汽油、藥品等，像我們要求的與打仗不相干的油印機，根本不在宋考慮之列。我最初請求購一千部，後減為四百部，計畫三百部配給師，（因為國軍的員額嚴重不足，師才是作戰單位），一百部配給軍部、總司令部、長官部以及游擊部隊。在最精幹的政治部總務廳朱代杰廳長不斷催請之下，好不容易運到了二十部，而廣州旋即失守，內陸通路截斷，已再無進口之望。

這二十部速印機，總政治部認為好，留下幾部，辭公兼任書記長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也認為好又留下幾部，剩下不到十部，無濟於原訂的計畫，也不必設大規模的母報編輯部，更不必電台了。後來演變為「陣中簡報」，用一般油印機自編自印，政治部曾請中央訓練團各設「新聞訓練班」，即以這一班為陣中簡報的主力。其中有傑出之士，也有表現非常特殊的成績，我因離開重慶遠赴西安便不清楚了。

抗戰勝利後，我由西安回到重慶。舍老告我，他要恢復北平世界日報晚報、上海立報、南京民生報，並成立世界新聞企業公司，業務方面由各

報獨立經營，盈虧 各自負責，總公司成立言論部與採訪部，集中力量，統籌運作。他請我除了在總公司擔任他的副手外，並在三報中任選一報負責。他又說：「為了政治上的應付，希 望你在南京，為了發揮你的活動能力，又希望你在上海。」而我卻選了北平，一則我喜歡北平的環境，二則戰後的問題在北方，北平學人最多，我可以對總公司的採 訪與言論兩部多所發揮。舍老也同意了，但還都南京後，軍事委員會取消，成立國防部，政治部取消，成立新聞局代之（與以後的新聞局性質迥異），鄧雪冰（文 儀）先生被任命為新聞局長，要我擔任主管「輿情研究」與「公共關係」的第三處處長。雖然得到舍老的同意，仍有深負厚愛的歉咎。

舍老在北平曾創辦「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來台後因報禁未能突破轉而辦學，又因教育法令限制，先辦新聞職業學校，四年後才獲准改為專科學校。舍老給我的 聘書是「特約講座」，開的課是「新聞文學」，上課的內容我請示舍老。他笑說：「你只要像在我家講故事讓我的女兒都不去睡那樣就好了。」這一門課是根據美國 米蘇里新聞學院，馬星野先生在該院畢業，我特向他請教，他說：「教新聞文學的教授，第一堂課只交下一張書單有二、三十本，讀後必須選三、五本作報告。以後 在課堂上只是天南地北的閒聊一陣，也沒有講義。」我想，中國還沒有那麼多的新聞學著述，少數幾本台北也買不到。於是我以新聞為經、文學為緯、編成一套講 義。我要訓練學生成為一個有條理的人，運思要有條理，作文要有條理，說話要有條理，辦事要有條理。有了這個幾本條件，可作優秀的記者、編輯、主筆、經理。 我並蒐集許多例證。講義編好送呈舍老，他笑說：「這一逼、把你逼出這一套，正合我的想法。」

我當時位朋友謀求教職，要託人請客送禮，深知其難；但有校長教務主任找我教書，何德何能敢不應命；一、二年間竟然累積到每週四十小時以上，不分日夜， 天天有課，當時我剛四十出頭，身強氣足，但仍然很累，認為有傷身體，並笑說：「我們要留命以觀世變。」要我至少辭掉十小時，我說：「有的是上課不久，有的 是特別安排的課，不好請辭。」他十分關切的說：「你把這裡的課暫停一年吧！」我說：「我可以辭任何學校的課，不能辭世新的課。」他又說：「你有沒有教書教 得好又像你一樣會講話的朋友，請他根據你的講義來代課好了。」我忽然想起一位小同鄉好朋友宋海屏先生，他極善辭令，敏捷而風趣，在東吳輔仁中央都有課。於 是我請他代課，舍老也極為滿意。

舍老要我幫他找一位事務科長，我推薦了我的小同鄉晚輩朱振邦，他極精幹，舍老也滿意，我常問舍老，朱科長有沒有毛病。舍老總說他好。振邦做了兩年，因 為要自己做生意而請辭，舍老要我再找人，我沒有適

當的人不敢亂薦。振邦告我：「校長真了不起，涓滴歸公，沒有一分錢要做假報銷。辦事講求實在，沒有一分錢浪費。要求高效率，事無大小，絕不許拖。雖然有時過嚴，我向他坦白報告，他也溫言接受。」

我想，寫一個人，不能只寫他優點而迴避缺點。執筆為文，應該公平誠實。舍老一生光明磊落，清白正直，沒有什麼給人批評的地方，只有一樣說，說他「小氣」。朋友中相傳甚廣的一個「笑話」：某君與舍老暑夜在台北螢橋河畔品茗納涼（那時螢橋堤上，遍設茶座，為暑夜納涼勝地），到深夜一時以後，客已漸散，二人不願作東，默坐相持，舍老的司機付帳始散。這個故事，由司機傳出，我當然不好意思問舍老，只是幾次有意提到某君，舍老告我：「有一回我在台北請客，也請了他，那時還沒有計程車。他說他家附近叫不到三輪車，他家離木柵還有一點路，他卻要我在木柵叫車接他，而且車要早到他也可早到。結果過了七時半才到，三輪車伏奉命要向飯館結帳，車資是他家到飯館的三、四倍，原來他利用機會看了許多朋友。我的車夫說，他家附近就有三輪車集結處，後來我就相應不理了。他經常叫我『老闆』，說我開學店，其實學校收入節省下來的每一分錢，都存入銀行中的學校帳戶，這位老兄說我開學店，我極不高興，看在老朋友份上，也就算了。每次不論大吃小吃，即使燒餅油條，他也叫『老闆』會賬。」我趁機緊接著說：「連螢橋吃茶也一樣？」舍老笑說：「那一次我也自覺好笑，區區一點茶資，也一定要『老闆』出？我有意逼他一逼。」

我可以舉出親身的例子，證明舍老不是一個小氣的人。我們在北平時，常在中山公園著名的西餐廳「來今雨軒」小聚。參加者有黃少谷（他在追隨馮玉祥中原大戰失敗後因九一八而共赴國難，得以安居北平，他曾在世界日報工作，舍老念舊、聘為主筆）。雷嗣尚（後任北平市社會局長）、張明煒（在北平辦英文日報），也有名媛、是當時雷嗣尚苦苦追求終成眷屬的著名美人，後來成為「國大之花」唐舜君。我們輪流作東，舍老也常參加，他來了一定要作東，而且先把錢存在櫃上。

後來我到上海辦「十日雜誌」，舍老在上海辦立報，每隔十天八天，舍老一定駕車邀我到著名錦江飯店（那時只賣川菜，不像現在成為五星級的觀光飯店），每次都只我們兩人，也要了一個房間，最低的消費額也要四菜一湯，我們都在壯年，胃納很強，吃的光光，並不浪費，舍老每次都不許我付賬。我在上海門道多，我帶舍老到小街小巷的小館子，便宜又好吃，我告舍老：「貴的你會賬。便宜的讓給我，你不能再搶了。」

一次，舍老自歐洲帶回來一隻紙造的箱子，輕巧堅固，上海的南京大

馬路四大公司還沒有到貨，他聽我讚美，即以相贈，我保存了一甲子以上，鎖及把手都已壞了。現在作為「愛晚齋藏牘」之用。我對他說：「我對得起贈我箱子的人了！」舍老大笑。

過去在台北，我住永康街，他住麗水街，三分鐘即可走到。有一天談到中午，我要回家，他堅留並笑說：「今天有菜。」果然有全雞湯及紅燒鮮魚。他說：「我 從小家窮，到北京讀書辦報，常吃不飽甚至挨餓，工作日夜不停，有時餓得頭昏心跳。所以後來收入多了，我沒有任何娛樂，就吃好一點，要拼命工作，營養當然重要。剩菜我不許倒掉，留在下一餐吃，一點湯汁也可拌麵。他們笑我太節省，這是居家過日子老年人傳統的好習慣。」

舍老最初在北京辦報，赤手空拳、社長記者編輯校對工友集於一身。印刷廠是租的，機器房外一間小屋就是編輯部，也是他的臥室，幾張椅子拼起來就是「床」，也省掉租屋住家的錢。身上穿的、夏天是一件藍布長衫，冬天是一件擋不住北方寒風的棉袍。幾個燒餅就過一天，半夜看完大樣後，機器轟轟震動，他在「床」上酣然睡去，機器老舊、常有故障，機器聲音一停，他即自然驚醒，他與機器已成為一體，可見他對報紙是何等投入。

後來報社收入大增，可以買房屋、買機器，也有錢買汽車，但他並不常用，多坐黃包車，有時走路，但遇有緊急新聞，便將汽車讓記者用。

他在台灣辦學，也十分辛苦，雖有有力的朋友幫忙，只捐得一點點錢。他只好苦幹，將自己的住宅抵押。一石一瓦，慘澹經營，在第二學期開學時，南部學生家長送兒女入學，看到只有三排簡單的平房，有人不禁大哭，認為兒女讀的小學都比這個大，怎麼把兒女送到這樣的學校！後來，漸漸蓋高樓，蓋大禮堂，蓋電台。又 在深坑購置大面積土地，以作擴充光大的基礎，現在的人對從前的艱難締造真是不可想像。

他從家庭生活，苦讀生活、到辦報辦學，都是歷盡艱辛，所以養成他節儉的習性。他最恨浪費，即使五支光電燈，他也要親手適時關掉。他常說：「不該用的錢，分文必省；該用的錢，萬金不惜。」

他因為最恨浪費，強調節儉，所以在管理方面，有的地方似乎過嚴。但古人說：「矯枉難免過正。」又說：「矯枉必須過正。」因此我們應該欽佩他創業苦幹的美德，不必以此苛責賢者。

他平生絕不貪便宜，辦報以來從最早最苦時起從不要求公私的津貼補助。戡亂期間，白報紙缺乏，紙價飛漲，政府應報業要求，配發白報紙，有的報社更虛報銷數冒領，並在市場出售。舍老則拒領大量配紙，堅守不要津貼不要補助的原則。論語有一節：「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報紙拿了政府的津貼，就應該為政府說話。而且即使說公正的話，也變得動機不純了。想要拿津貼並以之牟利應該是孔子所謂的「慾」，舍老真正達到孔子所謂的「剛」，才是真正的「硬漢」，才是真正的「強人」。

舍老這種作風，也適用於辦學，所有學雜各費，不在教育部規定外多收一文，也不另設名目收費，也不向家長為不樂之捐。他是規規矩矩辦學，是以節儉興學，是以苦幹興學。」

舍老有幫助弱者的狹義心腸，有多位涉及冤案，或自冤獄中釋出，無人敢用。舍老不怕聞之色變的白色恐怖，一概聘用，其中有多位現都建在，著名學人如陳鼓應先生、王曉波先生皆是。而因雷案坐牢的馬之驢先生更是明顯之例。（他出獄後仍寫了一本四百五十頁的大書：「雷震與蔣介石」詳細記錄雷案始末。）

教授、副教授、講師的待遇有差別，舍老並不在這方面打算盤以特意壓低他們的級別，例如青年黨的沈雲龍先生，自農林部專員退下來，失業賣稿，缺乏大學教書資歷，如果在其他大學，可能只給講師，舍老卻請他做教授。（他著述許多近代史的書，成為「傳記文學」雜誌每期主題的作者，更成為青年黨第二時期的元老，代表青年黨參預國是，都是以後的事。）沈雲龍先生是因為青年黨被歧視，而我則受「孫案」影響，國立大學不會請我教書。且我在大陸也未教過書，甚至大學文憑上不是我現在的名字，既無經歷，又無證件，舍老卻給「特約講座」名義。稍後，中國文化大學首創「大眾傳播系」，系主任龔弘先生找我講「傳播文學」，月終發錢的紙袋上寫的是副教授，我告主管：「我是黑牌教授，此校降級，他校也會予以降級，所以礙難接受，下月的課另請高明。」主管認為需要專案請曉峰先生核批，故有難色。第三天主管欣然告知：「批准了。」後來，曉峰先生特聘我為文大創設榮譽級的「華岡教授」。我笑告舍老：「只有你們兩位大名家，才能鑑收像我這樣的破銅爛鐵。」

我住公家房屋被索回，要自行購屋，尚欠十萬，在二十多年前，也是不小的數目，因為沒有抵押品，所以借不到錢。舍老詢知，便要我向新店市世新存款的某銀行貸款，他作保人，但銀行按規定還要抵押品，舍老以他的住宅作押。我告舍老：「我認識許多人，都是不做中不作保，對你

更是您破紀錄之事，我不敢開此例。將 來增加您的麻煩。」舍老說：「可是您不能沒有房子住呀！」後來總算另外借到錢了。但我對舍老的好意，真是萬分感激。

又有一個人，是先創辦正聲廣播公司，退出後又創辦台灣日報，當時台中人口既少，工商業不振，銷行與廣告，兩俱困難，台灣日報債臺高築，我也曾請當時省 主席黃達公助其向省行庫借貸，一次他找到舍老，舍老同情他辦報之苦，答應介紹他向某銀行貸款，但銀行要抵押品外還要保人。夏坦告：「抵押品在形式上過得 去，但現在我的情形已找不到保人了。」舍老慨然說：「那我做保人好了。」銀行有了存款最多的客戶做保人，對抵押品只要有個樣子也就過關了。夏後來將台灣日 報轉讓，全部債款還清。但在夏既無可靠的抵押品又找不到保人的情形下，最後週轉不靈，必須破產倒閉。舍老明知而仍助之，可知舍老絕非如守財奴那樣只重錢財 不講義氣的人。

舍老有一次與我深談他的心事。我問：「您一直努力增加世新的存款，何不建設深坑新校區，景美現址狹小，但接近台北市區，可作夜間部及推廣教育中心。這 兩部分都大有助於學校財務。而深坑的校區土地面積也符合教育部對辦學院辦大學的規定，可以促成改制早日實現。」舍老說：「要再多一點存款才好。」我問：「您一定繫心大陸，是不是有到大陸辦學的想法？我知已有私校要到大陸設校。」舍老頷手說：「我相信，北京的世新到台北來，將來台北世新也會以新面目到北京 去。我在大陸創辦的報紙，將來也會由世新校友去恢復。」又笑說：「因為你問我，我才姑妄言之，我未曾對人談過。」我對舍老的堅毅深心，非常感動。

我聽說舍老病重，即去看他。他說：「我想不到我會活得那麼久，對於死，我已淡然處之。」我說：「您不但活得久，而是工作得久，現在躺在床上，還要耽心 學校的事。教育部核定世新改制學院已經確定，您也可獲得安慰。好在您的好友已經為您培植最好的接班人，為事而擇人，捨私而論公，這個接班人自然是完成您的 願望的不二人選。」

我所說捨老的好友事端木鑄秋（愷）先生，他在擔任東吳大學校長時（後改任董事長），曾對舍老說：「你有博士女兒，書讀得好，能力又強，為什麼不讓她到 世新服務，做你的助手，好繼承你的事業。」舍老說：「我在大陸辦了多家報紙，從來沒有想到成為家族傳承的私人企業。」於是鑄秋先生說：「那麼，我請她到東 吳來！」於是舍老的長女成嘉玲博士在東吳大學擔任法律系主任四年、法學院長十一年，一次鑄秋先生召宴，舍老也在座，我聽到鑄秋先生當眾極贊嘉玲的教書與行 政能力。舍

老雖默而聽之，但也喜形於色。

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舍老辭世。由董事長葉明勳先生向董事會提名經全體一致通過聘請成嘉玲博士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首任校長。她訂定「現階段校務發展 最高目標，是在十年內辦成一所精緻的綜合大學。」於是動用巨資擴建校區，美化校園、充實圖書設備，大量增聘學有專精博士級師資，提高待遇與福利。使得內外 一新，上下交響。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奉准改制為「世新大學」，達到舍老生前的願望，嘉伶可謂善於「繼志」了。

但她在「獻上第一份治校成績單」文中說：「我確實體驗到『看人挑擔不吃力』與『當家才知柴米貴』，而對於財務入不敷出的壓力，在很多支出上，也就不得不學父親的精打細算了。」文中又說：「我何其有幸，是父親眾多兒女中，唯一伴著他渡過最後三十多年的歲月，我真正體驗到父親對我的情感，何止是父母之情而已。」我想：這一對父女都是強人，父是虎父，女是虎女，父則精打細算，女則雄才大略，在父生前，未能交集，在父逝後，則能合而為一，從容中道。

舍老在世界新專先辦供學生實習的「小世界」週刊。不對外發行。舍老全神貫注，編寫排印，躬親指導，以他在立法院所得到的新聞，親自撰寫，作為頭條新聞，常為各大報所引用。副刊也有特稿，如阮毅成先生的隨筆，多年不斷，成數百篇，有許多可貴的掌故。「小世界」在所有各校的校內刊物中，最為突出。

舍老珍念他在上海辦「立報」的經過，以小報型的大報，在申新兩大報對峙群報如林之中，別張一軍。當台灣出報禁初開之際，進入報業的戰國時代，舍老告我：「今天辦不起大報了，因為必須要有非常雄厚的資金，要有最新最好的設備，要蓋大廈，要有編制龐大人力豐沛的編輯部採訪部。我們只能運用學校有限的資源，只能辦上海立報小報型的大報，以小部隊，以奇兵出現。於是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台灣立報」發刊。」

我收到贈閱的創刊號，立即按照定價郵政劃撥訂閱十年，我函告舍老：「我年已過八十，卻訂報十年，不是豪情，而是感恩，一念之私，祇能做此小小表示而已。」不過，這可能是世界新聞史上第一位一次訂閱十年的訂戶。值得列入「金氏紀錄」。

說來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美國建國二百週年，台灣大專教授一百人組團赴美訪問，我隨眾參加，一上飛機，卻有人索聯，因是初識，無從下

筆，只好嵌名，內部傳開，人人說好，人人有聯，回台後在中華日報副刊以「每日一聯」刊出，此後索者紛至，舍老笑說：「不能不贈我一聯，不過，我的名字不好嵌。」我試為之，竟得二聯，舍老大喜，因舍老與元老李石曾先生友好，要請其寫聯，但此老常在國外，偶然歸國，亦匆匆而過，因此耽誤，此老逝後，亦未另找人寫。聯曰：

人不自「舍」，乃貴有志。
天之生「我」，必用其才。
鏗而不「舍」，大業斯建。
專乃忘「我」，萬事可成。

二聯中的「舍」字，本說文：「舍同捨、棄也。」第一聯本李白詩：「天生我才必有用。」第二聯本荀子「鏗而不捨。」

我另外做了兩付不嵌名聯，美其辦報辦學之功，舍老也喜歡，也都未寫奉，以後在「九萬里堂聯選」中刊出。

今年舍老百歲誕辰，世新大學編紀念集徵文，並認為我一定保有函件照片。過去我在北平，舍老到上海南京都有信給我，其後我在上海，他返北平也有信，那時我喜歡攝影，當然有他的照片。在北平中山公園來金雨軒的小聚，就照了很多相。在上海他喜歡我自己設計的書桌舒服，一來就坐在那裡，也照了幾張得意傳神的相。這些照片及函件，一併與許多男女名人的照片函件藏在兩隻大藤箱中，在重慶被日機炸得灰飛煙滅，在台北見面容易，不需寫信，對於攝影我在抗戰中就已不玩了，因而無以應命。此文本應在舍老逝世後即寫，為文雖遲，而懷思愈深。老子有言，「死兒不亡者壽。」舍老之壽，在中國新聞史上必將永垂無疆。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張怡欣 2005/07/21)

我與成舍我先生

成舍我發起簽名反對雷震被補，

原簽名者不下十人。

但或以人情，

或經利誘威脅，

均紛紛退出，

最後只有成先生與我二人出名。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胡秋原口述（前立法委員）

成先生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第一代報人。我是因抗戰期間辦報而相識的。在與成先生相識之前，因其反對汪精衛，以辦報而坐牢以及其為名記者，已久仰其名。知己不少，最相知之一。我自民國十五、六年起即辦期刊，要說到與成先生關係，必須說到我辦報由來。

一、時代日報之接辦。

福建事件前，我到福州，曾任國民日報社長。但我只寫了幾篇文章並未管編務。福建事件失敗後我逃往歐洲，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請我幫忙，參加救國時報編輯。我除了由英文報紙看日本動態外，到瓦爾加世界政治研究所看日本報紙雜誌，我雖在日本留學，當時興趣在研究唯物史觀和文藝。我之研究日本是由救國時報始，當然我也研究俄國。

一九三六年我離俄至東歐宣傳抗日，繼至美國，原只準備停留兩、三星期（因內人懷孕），我已定了船要回香港，不料遇到西安事變，我不敢回來，住在哥倫比亞附近。陳翰笙介紹我在哥大看書，看了許多有關中國檔案資料。這對我研究國際問題大有幫助。但生了小孩，只靠譯書賣文生活，只在艱難。陳翰笙介紹我到唐人街當堂役，他說一天小費可過一星期，他可帶我去，但我太太反對。這時是六月底了，中日問題趨於緊張。陳又來告訴我說「紐約時報看到遠東緊張，決定成立九人顧問委員會。委員會對社論提供資料，他介紹我為顧問之一，已經通過了，預定七月八日在時報廣場一家飯店吃飯，屆時他與我同去」剛坐下，時報廣場大字消息，馬可波羅橋中日軍隊衝突，蔣介石將派勁旅北去云云。我不勝興奮，起立告辭，我要回國抗日，不能奉陪了。回到家中次日即到船公司，定期回滬。太太問我何以如此高興，我說四年漂泊就是等待這一天。回去又怎麼辦？我說我是日本問題專家，共黨且要用我，國民黨能不用我？再者，十九路軍與蔣鬧翻為的抗戰，現在我想蔣會起用他們，我雖不能指揮軍事，但總可在政治問題方面幫助他們。

船到香港，我去看陳銘樞，時蔣光鼐亦在座，說剛接蔣委員長電報，要他們即日來京共赴國難。我與內人、小女便和他們一起乘粵漢車北上到漢口，我回家省親，送內人及小女赴川，亦立即到南京。當時十九路軍將領和葉挺都受到政府招待。十九路軍四個領袖都承蔣先生招宴，各送軍委會參議名義、汽車一部。當時我與福建事件同人劉叔模、梅龔彬、林崇墉也看過一位地位極高的黨國要人，名字不說，他對我們大談哲學，無一言及於抗戰。我到中央圖書館看書，重讀中國書，或坐在他們的汽車出遊。

十九路軍將領與新四軍江南統領葉挺到前線後，主張退兵。因敵人砲火力增五倍，我們只有二倍。因國聯開會，蔣在上海將精銳犧牲殆盡，以後戰事，主要是雜牌軍打的。中央指示下令退兵。我們乘最後一艘船到漢口。在船上，一位蕭先生說我們只能辦報。同船蕭忠貞說，他有一位朋友龍取直辦有《時代日報》，可以改組擴。到了漢口，龍取直欣然願意合作。我們湊了一點錢，租了一棟房子作編輯部，那是四開小報如《立報》一般大。

《時代日報》在德潤里，族叔也住在內面。我在他家食宿。當時川軍二十二集團軍孫震駐京辦事處主任送我參議名義，車馬費七十元。抗戰前兩年，我靠此生活。時代日報我不拿薪水。《時代日報》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出版。共辦八個月，二百四十篇社論，都是我寫的。我在十月三十日晚上社論寫完後，曾寫一詩寄內人云：

四年夢寐思攘敵，大戰歸來袖手看，

尚有自由一筆在，風行雷厲令倭寒。

二、《時代日報》之知名與成舍我先生之來訪。

《時代日報》雖是一張小報，但不久即頗為知名，這有幾件事。

十一月底，德使陶德羅奔走和平。大公報一時代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五十七天大屠殺報導甚詳，不用轉述，但力說長期抗戰必勝之理。一千零一勝。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日本必征服世界始能征服支那。三國干涉山東問題對日本內政、國際局勢、日本進攻路線，我的預言皆不久被證明，此因我對日本國際問題有所研究。不到兩月，銷路日增，可以支持編輯部同仁薪水。

五月間，成舍我先生突然來訪。說到他每日看時代，最好的文章，最壞的印刷。他本來想在漢口恢復《世界日報》，但因種種條件不足作罷，他將他的機器一對開二全副組模鑄字爐馬達全部半賣半送，合計三千元。我說與同人商談後答覆，大家都高興。但三千元不是小事，而中央黨部來了兩個月補助費一千二百元，先一千二百元打地基裝新機。七月一日出兩開大報。六月廿三日馬當失守，政府下令疏散，全國各地機器遷川，新機器亦在其內。後來七月底時代停刊，我於八月

廿五日飛渝後，十一月機器到，我租親戚家開時代日報印刷所營業，辦《祖國》（按：雜誌名稱）。再還一千元，最後一千元通貨膨脹之下還清。後重新被炸印刷所遷南岸，仍出祖國，債台高築，三十四年賣出。

我能開印刷廠辦祖國，是成先生賞識我的文章和幫忙，有知己之感。成先生多半精打細算，對我卻非常慷慨。

三、但我對成先生盛意也有報答。

成先生到重慶後恢復《世界日報》。但剛安裝就緒，遭遇印廠被炸。那時內人是觀音岩國小校長，學校正放暑假，世界日報便借用她的學校作編輯排印場所，而沒有收費。我把機器賣出後修了一棟新屋，因菸酒公賣局要強租我的房子。後來我交涉勝利，不搬，賣與《世界日報》作宿舍，是照本錢賣的，使《世界日報》職員有安頓之處。

四、《自由人》之合作。

大陸變色後，許多老友集中香港，如王雲五、程滄波、阮毅成、王新衡等。當時一般人畏共，不敢用真名寫文章。我們創辦《自由人》，一律用真名。王雲五為發行人，成先生為總編輯，經費是王新衡在台灣籌措的。《自由人》辦了三年左右，主要的人都來台灣了，便由一位在香港的人主持，改名為《自由報》，而且由中國第二號要人出錢，但與《自由人》性質不同了。

五、成先生於民國四十五年創辦世界

他請了一些老朋友教書。我先教西洋史，後教思想自由史—這是英國（**Bury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此書早有羅家倫譯本，但似乎現在未印。我用原書口譯大意再加解釋。後來我因到美國，歸來，在中央究院事忙，才停止教書，但也偶然去演講。

六、免費印我《少作收殘集》

民國四十八年，我與成先生都在立法院擔任立法委員職。我蒐集舊作，編《少作收殘集》，上卷是在世新印刷廠代印的。我只付了一點定錢，以後並未再付，卻從未曾被催收，據世新蕭宗謀先生說，這是成先生不要我的印刷費。人說成先生精打細算，這又是成先生對我慷慨的一事。

七、五十七年出版法在立法院提出時，成先生與我共同反對。民國五十七年政府提出出版法於立法院，主要是行政機關可以查封報館，此本對《自由中國》而發。成先生與我及其他新聞界選出的立委曾共同反對。成先生作了精采演講，我也講了言論自由是天經地義，背之不祥。又寫了〈言論自由在中國歷史上〉。在這時

候，成先生又曾為龔德柏案說話，說龔案不審、不判、不放是不法。經成有力發言，龔德柏先生終於獲釋。

八、雷震案，成與我發表共同聲明。

雷震是我老友，因中國語言文字絕交（按：《自由中國》曾有段時期討論中國文字簡化與否的問題，當時雷震主張簡體字，而胡先生堅決反對簡體字，兩人因而絕交。），後因弔復交（按：《自由中國》有位先生過逝，雷震與胡先生都前往弔祭，兩人遂因而復交）。

1956年，我被派為出席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在機場送行時雷要我問蔣廷黻，他是否參加反對黨？在聯合國時我問蔣廷黻，他說如從聯合國下任，一定參加。繼之，此事起於宋（按：最初要成立反對黨是出於宋子文的構想，他耽心自己聲望不夠，就去找蔣廷黻，而蔣廷黻，則去找胡適）。蔣答應找胡適，我因怕雷信件被查，將蔣答覆函告內人（按：指其從聯合國下任，一定參加反對黨），殊不知我的家信也是在被檢查之列。雷要我參加，我說我同情但不能參加。因青年反國民黨，中年擁國民黨，如晚年再反國民黨，反反覆覆四個字即可打倒我。但我家門口住的即偵探，雷常邀聚餐，我也列席旁聽，成也常去。有一天雷來說胡適可參加了，我說他參加我也不參加。雷被捕，我覺以此抓人則大不可，我曾與周棄子探監。成發起簽名反對雷被捕，文是一位法學家寫的，原簽名者不下十人。但或以人情，如找張岳軍先生對我說項（按：指進行人情上說服）；或經利誘威脅，均紛紛退出，最後只有成先生與我二人署名。

此事對我的後遺症甚大。五十一年新年同鄉集會，一位季（神仙）預言我有牢獄之災，我笑笑。翌年新年，我見他問：「為什麼沒有牢獄之災呢？」他才說，這不是預言，是事實。情報人員到我處問你從大陸出來情形。大家知道你是與同鄉單幫客一同出來的。他們調查宜蘭（湖北人多），工人中有一人是與你同出來的，要他自認是共黨，來攀扯你，如傳雷案一樣。這工人也到了台北，但到後次夜即死，這計畫才未實現。大概祖宗保佑，然而你有文星官司，表示流年不利。

世界新專之久久不能改制為學院，也許是成先生簽名的後遺症。

九、文星官司中，一般大陸老人朋友中只有兩人公開支持我的立場。

《文星雜誌》開始創辦，自始我是支持者，其後發生官司，事甚複雜。要言之，是因文星先引誘我參加中西文化論戰，他們失敗，便用閩變戴我紅帽而起。我提出訴訟後，一般朋友、黨國要人參加調解者甚多。我接受調解，但有一條件，必須文星表示歉意。此事未成，不是姓李的（按：指李敖），也不是姓蕭的老闆（按：蕭孟能），而是蕭三爺（按：指蕭孟能之父蕭同茲）。先是有人對蕭三爺說，文星書店之不對，三爺說，兒大，爺難做。後來三爺向各方面打招呼，送白蘭地，

於是有許多人說要看三爺面子，甚至責我固執。只有兩個人始終支持我的立場，首先是成舍我先生。他曾請客，三爺在坐，他當面說文星不對，說世間沒有一個書店攻擊自己的作家的。最難得的，蕭（同茲）是世新董事。其次是端木愷先生。我的若干官司文件是他的打字小姐為我打的。官司又延伸並在自由報上說，我在香港做過《文匯報》主筆（其實該報當時根本無主筆，社論均轉載《人民日報》等）。我控告此文作者於警總。適此時韓國開亞洲現代化的國際會議，韓國一定要我出席。許多黨國要人要我撤銷訴訟，否則不許我出境。還百般威脅。我拒絕，也沒有參加會議。他們甚至託我的親戚羅學濂來勸我。羅先生勸他們說，你們對真正讀書人只能講理，不能耍手段的。羅先生後來也做過世新廣播電影科主任。

十、我七十歲生日承成先生祝賀並作一精采演講「民族主義與學術自由」。他追溯我們友誼的經過，並說到六十七年我在世新的專題演講。最後他將我的主張提出，「假使要使民族強大，一定需要人才，需要人才一定要有學術自由。我們還要有言論自由、有出報自由、有思想自由，然後才能使國家得到整個自由。這是我與胡先生共同主張的。」由於他辦世新，我辦中華，各人忙碌，但在立法院見面，也常談公、私之事，世新有會也一定約我參加。

十一、有一年（一九九〇年）他生病了，在一處休養，我與內人去看他。他非常高興和感動。我建議寫一回憶錄，因為他目擊和參加民國以來的思想文化運動，他說恐怕時間來不及了。

十二、大約一九九一年，世新有一紀念會，記不得是不是改為學院已經批准。我出席後看見他，還看見我寫的一張紅字還掛著。此時他已病了，旋即休息，這是最後一面。不久我就參加他的追悼會了，我有一輓聯，已不記得，不知還查得出否？

今天世新為紀念成先生百年誕辰。先生長我十三歲，除了五四前八年，我只事後聽說之外，五四以來之事

……在今日大家紀念成先生百年誕辰時，我的感想有三：

第一、如成先生在我七十生日所說，成先生所說要愛我們國家，使國家強大，一定需要人才，需要人才必須有學術思想，言論出版思想之自由，然後有整個國家的自由，這是我們共同主張。這是真正同志與知己。我痛惜此一知己先我而去，但我慚愧，我是托之空言，而他能創辦世新，培養人才和自由的思想。我亦望世新師友不忘創辦人之宗旨與目的。

其次，要愛護國家，維護思想自由，一定要有道德勇氣，否則崇洋媚外，趨炎附勢，學亦無用。袁世凱圖謀帝制，許多名人（如六君子）竟背叛民國擁護袁世凱。成先生告訴我，當時還有一新聞界名人自稱「臣記者」。梁啟超要寫文章反袁（按：

此文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袁世凱送五千元請勿發表，梁啟超在發表前夕逃走，倖免於難，再造共和。我們要有梁啟超、黃遠庸的道德勇氣，而不要有「臣記者」的行為。

第三、知識分子要有勇氣，必須自尊，保持人格尊嚴必須淡泊明志、清心寡欲，生活勤儉，不愛錢。勤儉自必正直，無欲則剛。嚴復何以加入籌安會？他抽鴉片，袁派人示意，不簽名即禁煙。嚴復晚年對其學生說，要「**Be brave to say no.**」（按：勇於說不），成先生一生是清白刻苦的，這不僅是個人問題。英國之民主，亦因是清教徒刻苦的傳統。韋伯說近代資本主義由於新教徒勤勞合理。工業（**industry**）源於勤勞，今日世新是私校中財產最大，財務結構最為健全的，學校財產由董會決定，不是由他一人決定。如以此種精神治國，國家豈有不富強之理？

在成先生百年誕辰之時，我提出先生愛國家、愛自由之精神和實行，他的道德勇氣、他的勤儉清白作風和辦事的幹練，都值得效法。世新師友應以這位創辦人為榮，而以繼續發揚成先生精神為己任。（王曉波訪問整理。）

追憶舍老二三事

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府遷台之初，國大代表龔德柏失蹤，長達五年。在國民大會及立法院，大家都知道他是被治安機關逮捕，但是無人聞問。只有舍老確悉此事之後，利用他立法委員的質詢權，於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四日，在立法院第十五會期公開會議席上，以（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為題，向當時行政院俞鴻鈞院長提出質詢。此一質詢發生效果，使得龔德柏得以平反出獄。置身於當時戒嚴時期之時代氣氛下，舍老之敢言，實為突出與充滿風骨。

作者/譯者：梁肅戎（前立法院院長）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我以東北地區代表，參加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獲選為第一屆立法委員，時年二十八歲。時任世界日報社長的舍我先生，以五十歲獲選為北平市立法委員。他比我大二十二歲，我一直視他為前輩，十分尊敬他。

來台後，立法院在台北復會，大家就有機會常常聚會，有小紅樓二樓的小咖啡室裏，幾位老者天天聚會。那時候端木愷已離開立法院，程滄波、胡建中、祁志厚、竇子敬、舍老等人，天天相聚聊天，暢談國家大事。當時，我以在座均為長輩，而自己年事甚清，多半坐在附近聽一聽天南地北的言論，並未加入談話陣營。

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府遷台之初，國大代表龔德柏失蹤，長達五年。在國民大會及立法院，大家都知道他是被治安機關逮捕，但是無人聞問。只有舍老確悉此事之後，利用他立法委員的質詢權，於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四日，在立法院第十五會期公開會議席上，以（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為題，向當時行政院俞鴻鈞院長提出質詢。此一質詢發生效果，使得龔德柏得以平反出獄。置身於當時戒嚴時期之時代氣氛下，舍老之敢言，實為突出與充滿風骨。

民國四十三年，雷震因「自由中國」言論為當局所不滿，被開除中國國民黨黨籍。民國四十九年，雷震與李萬居、高玉樹等籌組中國民主黨，並擬於九月底正式成立，為一反對黨，九月四日上午，即因涉嫌叛亂及「自由中國」之言論有助於共黨宣傳之嫌，與該刊編輯傅正、經理馬之驊、兼任會計劉子英等人被警總拘捕。

舍老、胡秋原、依據警備總部發表的罪狀，研究結果，認為雷案即使涉嫌觸犯普通刑法，但尚不至於觸犯懲治叛亂條例，因而不該受軍法審判，

兩人乃公開聯合 發表聲明，呼籲勿以軍法審判。其聲明全文，曾於四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刊載台灣各大報。文中提及雷震自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以來，就其言論而言，其主張反共 救國，甚為顯然。雖若干主張，非吾人所能贊成，惟書生論政，縱涉偏激，若其本旨在反共救國，為爭取民主自由，擁護國憲，反對暴力，則此種書生論政之是非， 實未可與叛徒之犯罪視一事，雖然此一質詢並未生效，然而金石之聲卻成為台灣民主政治演進過程之里程碑。

民國六十六年二月，我出任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負責與友黨及黨外人士溝通協調，舍老常常來找我打聽一些黨政消息，以提供「小世界」消息來源。舍老觸角甚廣，消息靈確，這是其過去所辦各報的特色之一，已成為舍老辦報的獨到之處。報紙通常以爭取新聞第一為職責所在，按照一般常識與經驗，晚報多轉載日 報的消息，週報多轉載本週各報的消息，絕對沒有日報轉載週報的消息，但「小世界」週刊則為例外，一向凡是標明「本刊特訊」的消息，曾多次發表在日報之前， 而被轉載於日報之上。如過去有些政治上敏感的消息刊出後，讀者們都將信將疑，但不久都能以事實證明其消息來源的正確性。民國七十三年三月，經國先生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後，有意繼經濟建設之後，更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促進台灣政治民主化，遂於七十五年三月，在中國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承先啟後，開拓國家光明前途的主要議題。四月九日，經國先生提議在中央常會成立十二小組，著手研擬六大政治新議題，以促成政治革新，落實三中全會決議案。七十八 年二月三日公佈實施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條例，維護憲政體系的傳承，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已達成改造國會的目的。立法院已經退職的老委員們，多半 本於滿腔愛國熱忱，對於國民黨施政有所不妥時，常常友直言讜論的勸諫。在威權時期，縱然個別能力有限，但整體表現，對於憲政與國家民主發展的支持與貢獻， 則無庸置疑。從整體操守或國家利益考量上而言，未必遜於現今之委員。至於常年未改選，並非委員們個人之戀棧，主要政治形勢使然歸咎給老委員，才算是公平。 也就是因為如此，舍老在病危前一段時期，曾經打電話給我，對於被稱為老賊，深覺受辱。今日若仍在世，相信他對於目前台灣這種誤任意自主為民主，扭曲民族主義成民粹主義之現況，並非其所願，必當秉持一貫勇氣而加以批判。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藍竑為 2005/07/02)

春風化雨

我初中畢業投考新專時，沒想到竟因演戲還有一段差點兒 不被錄取的經過。據說是這樣：舍我師對於學生的品德、家庭境況很重視，我演戲的照片曾在他辦的世界畫刊刊出，於是他認為我是一個喜活動號出鋒頭的女學生，一定不會好好在他那苦學校讀書。想不錄取我吧，又覺得從我的作文試卷看，倒也是個可造之才。幾經商榷，才算把我錄取了，這樣一來，竟決定了我的一生之業。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林海音（名作家）

我在清晨淅瀝不停的春雨中，到三軍總醫院探望數度住院的舍我師。進門前見他閤著眼昏然似睡，衰弱無力的躺在病床上。看護人員對我說，世財推他坐輪椅出去「散步」了一陣，現在剛回來放他躺在床上，是太累想睡了。

我趨前輕叫一聲「成先生，是我」旁邊陪伴他的學校職員也說：「是你的學生林海音先生來了」。他似乎聽見了，無力的睜開眼，也似乎看見我了。瘦弱深陷的兩頰，比我前兩次來看，愈顯虛弱。饒這樣，他還是不願住院，每次送進來，第二天稍好，就有氣無力嚷著要回家去。他想早點回家的心態，固然是要強的性格不願 讓人總當他是個病人，我卻認為也是他「戀家」使然。

我把一篇某報刊載龔德柏獄中回憶錄中，寫舍我師在立法院對龔案仗義執言的經過，拿給他看，他雖沒力氣，但腦子很清楚，還問說是什麼報？什麼人辦的報等語，勉強用放大鏡看兩眼，卻無力繼續了。我見他已昏沉睡著，便悄悄離去。

成師已故去七年了，現在我執筆為文，成師過去的影像，卻不斷的一幕幕湧映眼前。我十六歲初中畢業考入北平新聞專科學校，開始受教於成師，竟決定了我一生從事新聞工作，對我個人來說，意義相當重大。六十五個年頭兒中，除了抗戰八年我們倆家失去聯絡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和成師及他家人有聯絡的，啊，也有一甲子以上了，不正可以說他是我一生的老師嗎？

成師當年在北平創辦新聞專科學校，並不像現在台灣世新大學那麼出名，也沒有那麼多學生。一個初辦只有百把個學生的北平新專，在古城千百所大中小學校中，真是微不足道的一個。

我入北平新專以前在初中讀書時，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參加了當時余上

沅、熊佛西等戲劇界人士創辦的「小劇院」演話劇。試想我不過十四、五歲能演什麼，當然只是配角色而已，不過因為「小劇院」品質格調高，編劇導演都是戲劇大學教授，演員是大中學生在校學生，所以偶有演出，報刊畫報都會有專頁刊出主配角的照片特寫等等。我初中畢業投考新專時，沒想到竟因演戲還有一段差點兒不被錄取的經過。據說是這樣：舍我師對於學生的品德、家庭境況很重視，我演戲的照片曾在 他辦的世界畫刊刊出，於是他認為我是一個喜活動號出鋒頭的女學生，一定不會好好在他那苦學校讀書。想不錄取我吧，又覺得從我的作文試卷看，倒也是個可造之才。幾經商榷，才算把我錄取了，這樣一來，竟決定了我的一生之業。

我在未進新專之前，對於「新聞」的觀念（那時還沒有「大眾傳播」一詞兒呢！），極為淺薄，報紙倒是喜歡看，對於北平的報紙也很熟悉。當然更知道當時舍我師創辦的世界日報事北平數一數二的大報，而且是不受任何津貼，苦哈哈的由二百元資本先出版世界晚報辦起的。

那時舍我師的報業，正式蒸蒸日上的時期，他個人更是年輕精力富強，當時主持北平世界日、晚、畫三報，在南京又有民生報（上海立報尚未成立），加上辦 個學校，他那時不過是個三十幾歲的青年呢！而且在學校裡，有幾門功課他都親自教授，新聞學的課程不必說，連國文他也教。他說最看不得國文不通的人，做一個 新聞記者，首先就得把國文弄好。他雖然寫一手漂亮的白話文，卻認為古文更得念。他的國文課是選讀「古文辭類纂」的文章。

舍我師是湖南湘鄉人，高個子，面上難得有笑容，見了學生更是繃緊了鐵青的臉，每當他邁著略帶外八字的重重腳步進得教室來，教室內便鴉雀無聲了。鴉雀無聲並非表示像我們聽音樂會那種心情，而是因為對他太畏懼了。他開使用那地地道道的湘潭之音，吟誦起桐城方苞的文章，念一段逐字逐句的仔細講解。我們都是北 京孩子，沒有受過吟誦古文的訓練和聽外地方言的經驗，因此聽舍我師那樣陶醉的搖頭吟誦，都忍不住要笑，但是誰又敢笑呢！大家憋死了。好不容易一小時過去了，下課鈴響了，舍我師收拾起書本，又邁著他那重重的步子走出教室。我們這時才忍不住一陣爆笑出來！我們不是不好好聽課的學生，而是非得大笑不可。我後來 一直想問舍我師，他到底知不知道每週兩堂古文課，我們獲益的和所受的罪呢？然而我卻不再有機會問他了。

那時「新聞學」方面的課程，並沒有課本，只有一本徐寶璜翻譯的「新聞學」，以及邵飄萍等人寫的有關新聞學方面的幾本書，舍我師都瞧不上，所以他寧可親 自己講授他自己的一套，卻沒有講義。他口授，讓我們筆記下來，回家之後再把筆記用毛筆謄寫在正式筆記本上。這也是一門苦練的功課，

是為了讓我們藉此練習「聽寫」及整理工作，外帶練習毛筆字。這一整理，幾乎要通宵工作，這樣的訓練，練就我至今寫字快速，得益匪淺也。我也時想，如果那時筆記留下來（我確實留過若干年），豈不就可以出版了嗎？

提起新聞學課程，不能忘記英國報人北岩爵士。舍我師為我們講世界新聞史的課程，講得很多很細，但他對於北岩爵士特別推崇。

北岩爵士(Northcliffe 1865-1922)生於都柏林，兩歲的時候全家遷居倫敦。他從事新聞工作可以說是自十三歲開始，那時他編輯學校的刊物，時五歲時就正式幫人編報，從此以後正式踏入新聞界。先做青年報(Youth)的助編，又為晨郵報(Morning Post)做撰述員。他創辦每日郵報(Daily Mail)一八九六年的事，那時不過三十一歲。這也是他依據自己的理想辦的報。他稱此報為「忙人之報」。他把不重要的新聞縮短，所有的新聞皆以淺明的文字撰寫，而且請著名的作家來為此報寫文章。他要把報紙辦成是大眾的報紙，而不是少數人的。因為在百年前的英國，報紙也並不是大眾必讀的。這種革命性的思想，可以說是自北岩爵士開始。

「每日郵報」行銷六十萬份。後來他又辦「每日鏡報」(Daily Minor)，最初失敗，後來他又改變形式，從每一份便士降為半便士，在內容方面，又加入了插圖以增趣味，結果大大成功。北岩爵士和英國著名的報紙泰晤士報也有一段故事。一九〇八年他掌握了泰晤士報，這本是他一生最大的目標。他為泰晤士報的革新工作是啟用新機器，為使報份大增，他又把報價減成一便士，但是英國人的保守人士反對他，不贊成把高貴的泰晤士報也弄成他一向理想的大眾報的作風，後來他便退出泰晤士報了。

我想舍我師在世界許多的名報人中，特別崇拜北岩爵士，是有其理由的：第一，舍我師和北岩爵士一樣，也是十幾年就在報館工作，後來才入北京大學讀書。第二，他辦報的理念也是受了北岩爵士的影響：他要辦的是一份為大眾所看的報，為人民喉舌的報，而不是為少數人有什麼目的的報。

後來，舍我師辦了六家報（北平世界日報，世界晚報，世界畫報，南京民生報，上海立報以及台灣的立報）和一所新聞專科學校。我曾問過舍我師，世界著名報紙中尚有赫斯特報系(Hearst, W.Randolph 1863-1951)等，為何他當時對我們頗少談起，而有關北岩爵士的筆記竟寫了幾乎有一本？他說赫斯特對於社會新聞的誇張渲染，他認為是報下之品，看不起，因此，也不屑多講了。

我便是在這樣的觀念下接受新聞基礎教育。還有一點，舍我師認為要做

一個完全的報人，必須對於報館所有的部門，無論印刷、業務、編務都要受訓練，成為一個全能。他也根據個別的才能去造就，所以當別人上印刷實習課的時候，我卻被派去實習採訪。在採訪課上我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如何採訪、發問以外，最重要的一點是，一件新聞的發生（比如一樁兇殺案吧），你決不能只採訪一方，你必須採訪兩造，你要採訪他為何被殺和另一個他為何殺人，以及更多有關方面。而且，另一主要的是，親自採訪，不許坐在家裡靠電話，所以這又是感覺到苦的事情之一。但是久之，你就發現，每則新聞非得這樣處理不可。如果採訪了一面的消息，另一方面找不到的話，你自己就會心理不安。嚴格的訓練，竟成了一種習慣，也就不以為苦了。

因為在校讀書時，就已正式擔任採訪工作，所以我和其他同學不同的是，晚間必須到報社寫稿。那時世界日報由北平石駙馬大街的平房搬到西長安街的一所樓房。樓上的後進，便是舍我師的住宅。他的重重腳步聲，自後來走到前樓來，聽得清清楚楚。

舍我師對我這半實習的學生工作，也一樣要求的很緊，就連他到上海、南京去看他那兩個報紙「立報」和「民生報」時，也不放過每日閱讀北平的報紙。他把世界日報和其他各報來做比較，尤其對於北平的另一家大報「北平晨報」上的新聞，逐一比較。我那時專跑婦女、教育這類的新聞。他如果看見北平晨報登了一條什麼消息，世界日報沒有，而這條新聞是屬於我工作範圍的，他那航空寄回的新聞比較批閱本子上，就要大批一陣。然而，我也知道，從全班學生中挑選我出來正式跑新聞，是對我的期望高。

舍我師的嚴峻雖令人敬畏，「蕭伯納」卻非常可愛。「蕭伯納」是已故成師母蕭宗讓女士的外號，這個外號也是世界日報同仁給起的，來源如何，我不知道。成師母早年留法，脾氣非常好，對人和藹可親，和舍我師的嚴厲性格剛好相反。報社同仁也都跟成師母好，晚間工作完畢，總到後樓去找她打打牌，過年時就推推牌九，緊張的工作完畢之後，輕鬆一下，毫無拘束。師母在北平的社交界參加許多活動，她並不喜歡出風頭，而是做報社的社長夫人，也就自然的會被請進去的。我跑婦女新聞，她便常常帶著我去參加，介紹那些人物給我，使我的採訪工作，便於進行。她一生與人無爭，事事容讓，也毫無傲氣，是我一生中見到的使我敬愛的女性之一。

採訪的工作，以及做一個採訪記者應有的採訪態度，使我對社會上的許多現象，許多人物，有了更多的認識。我覺得把自己的主觀看法置身於外的客觀寫作，已經不能滿足我的寫作慾望；這慾望，便是我要發揮自己的看法、感受。因此才使我由新聞寫作走入了文藝寫作之路吧！

來台灣以後，舍我師如日之昇的新聞事業，隨著大陸陷共而完結，在台的前數十年，再也沒有他辦報的機會。若干年來因報禁不能辦新報，但有些關門報紙的招牌，還是可以買過來辦，為何舍我師不這樣做？他不要，他不要撿人家的賸渣，要辦就從頭辦起。台灣立報便是在報禁開放後，他終於辦起來的報了。

民國四十二年我進入聯合報副刊主編，舍我師也特別支持我，他於四十三年六月十四日起，以「一戈」為筆名寫「待廬談報」專欄，數日一次。他來台雖然沒有辦報，但是對於國內外報業的動向反而有更充裕的時間來研究，這個專欄是分題短文，每則不過五、六百字，敘述心得，報導新事，觀察正確，文筆輕鬆，內行外行讀了，應當都有所獲益。這也是四十四年前的往事，可惜的是他寫得不多，未能成書。今日讀來，雖為歷史陳跡，但感想、見解仍其有價值，留諸新聞史料是可行的，新聞學學子更應注意閱讀。

我和夏承楹（筆名何凡）在北平世界日報認識，他雖畢業首都師範大學英國文學系，卻喜愛新聞記者的工作，所以畢業後，沒有教書，就一腳踏入了新聞界，在世界日報當「學生生活」版的編輯。我們在民國二十八年結婚，那時舍我師和師母蕭宗讓女士已經入川到抗戰後方。民國七十八年是何凡的八十歲，又是我們結婚五十年金婚紀念，子女們便為了父母辦了一次熱鬧的慶賀會，我們想五十年前我們沒機會請舍我師吃喜酒，如今我們師生有緣，請這位長壽翁（那時舍我師九十三歲）來參加他的部下（何凡八十歲）和學生的結婚及生日晚會，不是一件可喜的事嗎？而且也要請他說說話，以補五十年前之憾，他很高興的答應，其實他那時因跌傷入院動過手術，行動不是很方便。這一天，舍我師在台的全家都來了，成師的女兒成嘉玲（我結婚時尚是嬰兒）校長，和嘉玲的女兒正好也自美返台。舍我師起立講話敘述我是他五十多年前的學生，何凡是他五十多年前的部下，這半世紀以上的新聞結緣，至今仍能同聚一堂，是那天的最樂事。

春雨季節又到來了，寫到這裡，窗外連綿迷濛。想當年我授業於成師，不過是個十五六歲小女孩，如今我以八十歲了。看到嘉玲克紹箕裘，把世新發展成一所綜合大學，而成露茜也接辦了立報，我心理實在很感欣慰，相信舍我師和師母必然也能安心長眠於地下。舍我師是我一生的老師，吾師雖已走盡人生（長眠於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凌晨六時半）。但對他的一切，我心中永存的是無上的崇敬和溫暖。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藍竑為 2005/07/02）

報業巨人 記者典範

他說：我的看法全不如此，惟其不怕頭破血流，才配做新聞記者。而我十分相信，這場反貪污的正義鬥爭，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我可以做一輩新聞記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陸鏗（資深記者、名作家）

在我六十年記者生涯中，新聞界前輩的三句名言，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和前進動力。

一是于右任先生說的：「新聞記者是時代最快活的人。」

一是張季鸞先生說的：「記者不坐牢，不是好記者。」

一是成舍我先生說的：「面對牢獄之災，才能表現錚錚的鐵骨。」

先賢范仲淹先生有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由於記者這個職業，對天下事多比一般人早一步得知，可以說是先天下之樂之樂，而信息的滿足，從精神層面看，是人生最高的滿足，所以右老說，記者是時代最快活的人，一點也不錯。

至於季鸞先生和舍我先生為什麼都把記者和坐牢聯繫起來呢？這與中國的政治環境分不開，中國在歷史上是封建專制的國家，「文字獄」正是中國的特色之一。雖然到了現代，建立了民國產生了共和，但仍有「白色恐怖」和「赤色恐怖」，在新聞界有不少人是因為辦報而送了命的，邵飄萍、林白水就是例證。被下獄坐牢的，更不計其數。我被國共雙方下獄而迄今仍能在第一線採訪，應該說是上帝的特別垂愛。今天，已經面臨世紀之交，馬上就要進入二十一世紀了，在中國大陸，新聞自由仍是一大禁忌，尚有不少編輯記者，關押在監牢中，成為時代的受難者。

成舍我先生把他的一生獻給了中國新聞事業和新聞教育，多次歷險，一九一二年因參與討伐袁世凱稱帝，在安徽安慶被捕入獄，後得友人之助獲釋，被迫逃往上海。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創辦「世界日報」因主張正義，堅持新聞自由，一九二六年，被軍閥張宗昌帶逮捕，即將槍斃時，為當時一位政壇大老孫寶琦救出，舍我先生自詡為「第一次值得追憶的笑」。一九二七年在當時的首都南京創辦國民黨統治下最早的一份民營報「民生報」。到一七三四年因揭發行政院長汪精衛親信彭學沛貪污案，「民生報」被非法封閉，舍我先生被拘禁四十天。在他釋放後的第三天，汪的另一親信，曾任外交部次長的唐有壬去拜訪他，婉轉地請他寫一封向汪精衛示好的信，然後在汪接見時，不妨表

示擁護之意，被他斷然拒絕。當時，唐警告說：「一個新聞記者要和行政院長碰，結果，無疑是要頭破血流。」

舍我先生怎麼回應呢？

他說：「我的看法全不如此，惟其不怕頭破血流，才配做新聞記者。而我十分相信，這場反貪污的正義鬥爭，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我可以做一輩子新聞記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

最後表達的這兩句名言，不僅反映了舍我先生守正不阿的錚錚鐵骨，也成為我遭遇挫折時的精神支柱。比如，當我被有「弱智兒童」之稱的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列入黑名單，不准進大陸以後，我就向一位親共的朋友表示：「我陸鏗可以做一輩子新聞記者，李鵬不可能做一輩子中共的國務院總理。」

舍我先生畢生辦報，在北京先辦「世界晚報」，再辦「世界日報」；在南京辦「民生報」，在上海、香港辦「立報」，抗戰後期在重慶辦「世界日報」，勝利後在北平復刊「世界日報」和「世界晚報」，到一九四八年準備在南京復刊「民生報」。一九八八年又在台北解除「報禁」後，復刊了「立報」。

我從舍我先生的經歷中，發現了一個特點，就是，他不單是發揚文人辦報的傳統，而且為了維護輿論獨立，在經濟上不受制於資本家，力求經濟自力更生。遠在一九一四年就與朋友湊了幾百元準備在上海辦「中國通訊社」，結果未能如願以償。到一九二一年北大畢業後，又邀約北大教授和學生創辦了「新知書社」。到一九二四年兩百大洋在北京創辦了「世界晚報」。由於經營有成，到一九二五年就出版了「世界日報」。做到了白手起家，獨立自主，在政治上爭取新聞自由的同時，先在經濟上做到了不受制於人，這是一般新聞從業者很難辦到的。

我和舍我先生一九四一年認識於重慶國民參政會，他自參政會在武漢成立之日起，即任國民參政員，當時我們年輕記者採訪參政會消息，向他請益，他也樂於給予指點，比如：「你們去找黃宇人，他是一尊大砲。」、「林伯渠明天會代表中共就陝甘寧邊區作一個報告，好好聽，有新聞價值。」

一九四五年，我出任中國駐歐洲戰地記者，當時曾教過我採訪學的老師趙敏恆先生正擔任舍我先生主辦的重慶「世界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部署我和毛樹清兄撰寫歐洲戰地通訊，由於我們都是一次請准購買一年的外匯，所以對「世界日報」是免費供稿。因為這一淵源，導致舍我先生一九四八年春決定在南京恢復「民生報」時，要從南京「中央日報」把李荊蓀、朱沛人和

我一起挖出來跟他合作。

在我們來說，卻是眼看國民黨敗象畢露，「中央日報」由於整個形勢的惡化，已不能發揮輿論監情的功能，在陶希聖堅持「先中央、後日報」原則下，諱疾忌醫，粉飾太平，實在毫無意義，不如追隨成舍我先生，在艱難中開一新局，起一點震聾發聵的作用。於是在和舍我先生商量將一套具體的恢復發行「民生報」的規劃以後，便聯名向中央日報社遞出了辭職信。

對於編輯部一個總編輯和副總編輯（當時央報的編制就是如此，不像現在台灣大報副總編輯高達十六七人。）同時要離去，社長馬星野老師固然大吃一驚，陶希聖先生也覺不妙，於是他以「中央日報」總主筆兼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身分致函我們三人，勸告打消辭意。而且用的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信紙、信封，說明頗費機心，信中有「站在一起吾人方能生存」之句。而由我執筆以李、朱、陸三人名義上陳、陶（按：陳布雷、陶希聖）函中竟不加思索寫出：「站在一起吾人同歸於盡」之句，引起陶的憤怒，陳的嘆息，馬老師也感到尷尬，並批評我「過分」。最後商討結果，朱沛人和我先離開央報，參與成舍我先生籌劃「民生報」的復刊，李荊蓀仍留央報，緩一步參加工作。

可惜，當時大陸形勢的發展比蔣介石、毛澤東估計的都要快，老實說也比成舍我先生和我們三人估計的都快。遼瀋戰役以後，國民黨在大陸敗象畢露，但不少人遙寄望於「隔江分治」，到徐蚌會戰（鄧小平稱為淮海會戰），黃伯韜兵團被殲，黃維兵團被圍，國軍敗局已定，舍我先生在南京復刊「民生報」的計畫也被迫流產。朱沛人則被派到北平「世界日報」駐京特派員。

我在南京為「世界日報」一直工作到北平圍城。有兩件事，在記憶上永遠無法磨滅，一是國民政府發金圓券，那是大陸王雲五先生的「精心傑作」，也是國民黨政府給百姓留下的最傷痛的印象。我參加王雲五記者會前就看到了公告，電話「世界日報」，並建議發一「號外」，結果未發「號外」，只是第二天報紙作頭條，我從新聞角度，強烈表示不滿，舍我先生，耐心地給我一信解釋未發「號外」的原因，蓋當時北平居民對南京政府已徹底失望，他們考慮的只是如何應付共產黨入城，什麼金圓券、銀圓券，都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了。

另一件事即舍我先生勤儉辦報，以身作則的作風，是這位報業巨人在新聞界廣受敬重的原因之一。當他請我擔任「世界日報」駐南京特派員時，我向他提出的唯一條件即要求有一部代步的車，因為南京實在太大，沒有車，要全面照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慨然答應，及時吩咐司機蔣寶華說：「從明天起，你這部車就歸陸先生使用。」這是一部紫紅色的美國Hudson牌新轎車，我用

它來採訪新聞，曾引起同業注目與羨慕，因為它是當時南京新聞圈子裡最豪華的一部車。殊不知，有一天早晨，開車途經一個公共車站時，見舍我先生擠在人群中，我立刻叫司機停下來，請成先生上車，問他：「何必自苦乃爾？」他答得很自然：「既然你採訪需要車，當然歸你用，新聞第一嘛！」

世界上有幾個這樣的報老闆？

想起成舍我先生，只有兩個字能概括：偉大！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台北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吳瓊月 2005/07/12)

成舍我的終身事業

我深信，如果沒有報案，他一定會先辦報，辦一個大型的報，不輸給余紀忠、王惕吾，但世新大學，也許不會有今天的規模了……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劉紹唐口述（傳記文學社社長） 發佈日期:2005-09-07

第一次見到了成舍老，是在一個台北新聞界座談會上，他為老朋友前南京「救國日報」主持人龔德伯喊冤與求情，龔素有龔大砲之稱，說話毫無顧忌，言論更為犀利。當時因在某學校公開演講，指斥最高當局要為丟掉大陸負責任，因而遭不明單位囚押。在白色恐怖時期，舍老對這個大家噤若寒蟬的問題不但大膽提出來，而且認為未經司法公開審判是不應該的，當時似有司法方面某負責人在座，他最後壓低聲音說，龔已是古稀之年，耐不住長期的牢獄生活，就人情言也應早日釋放。

今天回想起來，舍老當時說話的神情還依稀記得。他是一個文人，一個報人，似不太善於言辭。他講話很急促，很激動，大家鴉雀無聲，在座很多人為之動容。

龔最後終於獲釋了，恢復了國大代表身分，也寫了不少文章，「愚人愚話」雜文集就有四冊之多，當然龔的恢復自由雖然不完全是舍老一個人的關係，舍老的奔走呼號是有其影響的。

還有一次，也是為了一位報人李荊蓀被長期羈押的問題，香港僑選立法委員也是老報人卜少夫，就任第一件事就是邀請新聞界出身的老立委十餘人餐敘，主人發起大家聯名寫信給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請求釋放李荊蓀，飯後聯名者包括主人僅得五人，舍老是其中之一。

舍老到台灣以後，辦報的雄心始終未減，因政府有不准增設新報的禁令，徒呼奈何。但辦學校似在法令窄門許可之內，所以他先試著辦學校，抗戰前他在北平辦過新聞學校，名作家林海因就是舍老的高足。我深信如果沒有報禁，他一定會先辦報，而且想辦一個大型的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果報紙辦成功了，可能不輸給余紀忠、王惕吾，但世新大學也許不會有今天的規模了。

舍老辦學校的事，筆路藍縷，由小而大，這是眾所周知的事。當世界新專一天天發達起來，我還曾至校內參觀過，從外面走進世新要走一段很長的

泥濘路，舍老 自奉甚儉，他在世新辦公室內，正批閱職員出差帳單，一筆一筆毫不馬虎，終為世新奠定堅實牢固的基礎。但舍老想辦報的心情卻很少有人瞭解，他辦不成報，也想 過過辦報的癮。在世界新專草創之期，財務捉襟見肘，他還是決心辦了一張四開週報——「小世界」，除阮毅成每期必寫一篇雜文〈適廬隨筆〉之外，幾乎都是舍老 一個人包辦，自寫自校自編，都是自己動手，其樂無窮。

不要小看這一張週報，卻常有獨家的頭條，舍老為當時消息靈通的立法委員，知道許多第一手的消息，以右手的老記者採訪，以左手的老編輯下標題，引人注目，小世界不脛而走，舍老會感到某種程度的滿足。

等到報禁開放，舍老以九一之齡要辦報，辦報的雄心雖不減當年，但他畢竟老了。觀念想法做法都跟不上進步神速的資訊時代了，可是他並不服老，更不服輸。為了要辦報，一向省吃儉用的舍老，在台北銀翼飯店請了好幾次客（我都有幸作陪），甚至不惜買洋酒請大家喝，主要客人都是老一輩報人，前述卜少夫、李荊蓀都 在內，卜少夫曾是舍老的老部下，李荊蓀出獄後似無固定工作，這些人都已經過了創業的年齡。

我佩服其辦報之執著精神，曾建議舍老從學生之中選出四十多歲上下的人來負責，然以各種考量而未獲採行，最後終於找到在民營報紙退休下來的黃仰山，主持 業務，台灣立報出版已非舍老內心想像中的報紙了。世新大學人才輩出，希望將來必能使舍老辦報的夢，辦報的理想逐步實現。辦學校辦報，舍老都曾找過我當個小 嘍囉。但我因為「傳記文學」無法分散精力，未能從命，民國五十一年初，我決心創辦「傳記文學」月刊，並就商於時在台北的老校長胡適，頗得讚許，但胡適不幸 於是年二月二十四日猝逝。個人為承傳倡導傳記文學之薪火，並擴大傳記文學的影響，乃在名學人毛子水、蔣夢麟（傳記文學四字為其所題）、李濟、吳大猷等熱心 支持下，「傳記文學」月刊於民國五十一年六月一日在台北市正式創刊，每月一期，從未脫期或合刊或中斷，實創我國期刊史上前所未有之記錄，成為文化界學術界 出版界的罕有前例。

舍老對「傳記文學」一向極為重視，先後曾寫過文章與參加座談會，如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發表〈林白水傳記〉；民國六十年六月，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六期 刊出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專欄六月號專題人物——張季鸞，舉行座談會時，因其另有他約，無暇出席，會後應主持人（按：劉紹唐先生）與主講人程滄波之請，補提 書面意見——〈我所接觸的季鸞先生〉。當時他親自送稿子至傳記文學社來，送來後對於內容仍不放心，又坐下來再看過之後才把稿子交給我。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遠景事業出版公司出版個人主編

的「卜少夫這個人（續集）」內收舍老〈正氣凜然大節無虧的老友卜少夫〉一文；七十二年七月，發表〈如何塑造一個獨立記者 的典型——從『滄波文存』中可獲得三項珍貴啟事〉一文。在許多場合他都稱讚「傳記文學」，前輩風範，永難忘懷。

在舍老生命的最後幾年，也許由於老朋友日漸凋零的原因，我每月同舍老見面與吃飯的機會愈來愈多了。舍老每月固定參加的餐會很多，俗稱轉轉會（大家輪流 作東）。我記得的有以王雲五、陶百川、阮毅成等為成員的香港自由人月會，以吳開先、余井塘、王新衡等為成員的上海民意代表月會，以胡建中、陶希聖、程滄波 等為成員的陪都新聞界月會。上述前輩多數是「傳記文學」的作者，所以我常有機會被邀參加，還有一個固定的北大同學月會，他以成平的名字參加，算起來我們是 前後同學，不過他不是每月必到。

新聞界前輩名人多為才子，能文能詩，風流倜儻。舍老是名人，也是才子，但不是一般所謂的才子。他是以過人的精神、過人的智慧、過人的毅力從事新聞教育與新聞事業的人，他的成就將永垂青史，永為後人所懷念。
（喻蓉蓉訪問整理）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吳瓊月 2005/07/22）

舍我其誰的成老校長

每在畢業典禮上，校長總有一番訓勉：「我希望諸位同學記住三件事：第一，永遠不要放下書本；第二，不要忘了學校的校訊——『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第三，永遠追求世新精神的發揚光大。」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王效蘭（聯合報暨民生報發行人）

身為世新早期的老學生，在當年，由於學校小，學生少，師生間接觸多，關係近，老校長成舍我先生，更是時時在我們「視力」範圍內打轉，他除了擔任校長繁忙工作，也親自授課，學校裡上上下下、內內外外的一切事務，均事必躬親，他那堅毅執著的精神，對工作的投入與奉獻，使他成為中國近代報業史上，兼具報人與教育家雙重身分而最具成就和傳奇性的代表性人物，在他百歲冥誕之時，僅藉此文，表達對他的敬意、追念、並感謝培育之恩。

成先生十六歲投身報業，從校對、記者、編輯、總主筆做到總編輯，二十七歲那年，自己辦報、建校，更開立了許多新聞史上輝煌的紀錄，特別是到了九十二歲高齡，還滿懷雄心壯志創辦「台灣立報」，甚而親自出馬採訪新聞，就種敬業、奮鬥、堅守崗位的精神，不但是我們後生晚輩效法追隨的典範，更讓多少混混沌沌，不知人生志趣方向的年輕人感到愧嘆！

世新是我的母校，成先生是我尊敬的「老校長」，身為世新校友，當知世新事，我在世新求學的三年歲月中，印象最深刻的，自然也是老校長勤儉辦報、建校的各種事例。

傳誦最廣，莫過於老校長在大陸時期辦報，為了節省用度，報社的電源總開關，指定專人，按時起閉；編輯稿紙，使用的是通訊社廢稿，反面可以寫字的，皆按尺寸大小，分別整哩，而這種習慣，後來一直沿用到今天。

當時我們還是學生，由於經驗體會不成熟，總把這些看似瑣碎節省的事，當作趣聞笑談，事實上，老校長把辦報看做「主婦管家」，粒米寸布皆不浪費。他曾經高倡，這種節儉觀念的養成，是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在七、八歲時，父親發現我們做兒女的，丟了幾顆飯在地上，都會被痛罵，說是暴殄天物，要遭雷打，必喝令拾起。」何況處在物資為艱的時代，節流即是開源，捐滴可以成河，當省則省，當用則用，這是起碼經營辦報業的原則。

也正因為如此，老校長在主持世新校務時，也沿用了大陸時期辦報模式，

譬如「小世界」週刊，編輯記者所用的稿紙，均是各通訊社及其他油印稿紙張的空白背面；而學校每在天陰落雨時，縱使光源不足，教室的日光燈也須經由校長本人同意至一定暗度，才令工友打開，以節省能源。

「世新的精神是什麼？世新的精神就是刻苦耐勞，負責盡職、自強上進。」這不但是成校長經常掛在口頭的一句話，也是他終生奉行不渝的座右銘。

往年，每在畢業典禮上，校長總有一番訓勉：「我希望諸位同學記住三件事：第一，永遠不要放下書本；第二，不要忘了學校的校訓——『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第三，不要忘記學校，不要忘記師長，不要忘記同學，永遠追求世新精神的發揚光大。」

為了矯正專科學生自卑的心理，老校長不時強調一個青年人應該有自尊心，不可有自卑感，青年人前程遠大，只要自己肯自強不息，努力上進，一樣可以成績輝煌升學就業：「所以我們照一般庸俗的看法，覺得私立不如公立，專科不如大學，我們要反過來，加倍用功。」

大家多知，成校長在民國二十一年，三十五歲那年，在北平創辦「北平新聞專科學校」的時候，僅收兩班學生，專任教職十餘人；民國四十五年，「世界新聞職業學校」在台北成立，也僅收高、初級各一班，學生六十三名，等到我進「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就讀三年制編採科時，學校已粗具規模，但在社會普遍看重學歷文憑的價值觀上，大多數同學的心理上，總覺有所欠缺。也正是因為如此，老校長一方面為了破除迷思，不斷激勵同學打破傳統觀念，積極上進；另方面，更專心校務、充實師資設備，準備爭取改制，這一努力，終於在民國八十年經教育部核准改制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如今，更在成嘉玲校長的承繼經營下，更上層樓，升格為世新大學，不但滿足了無數世新學子的殷切期望，也了卻了老校長當年未竟的心願。

世新創校迄今，已有四十三年歷史，不僅歷年畢業學生人數早已超過萬人，畢業校友遍及全國各大媒體、圖書館及公私立機構。以聯合報系同仁來說，世新畢業校友為數可觀，而敬業樂群，表現傑出者，更不少數，至於在文藝界嶄露頭角的寫作人才，也同樣成績斐然。

老校長生前常和老師同學們說，文學與報紙，都是改造社會、振奮人心的最大動力，他切望所有有志於文學與新聞寫作的青年男女，都能挺起胸膛，冒險犯難，對伸張正義、轉移世運的大業，盡一己責任。

遙想民國十三年，老校長以三百元資本創辦「世界晚報」，辦報宗旨為「立場堅定、言論公正、不為強暴、不受津貼、消息靈確」，在軍閥割據的年代，

時局變動很大，辦報的困難比諸政府遷台之初更顯複雜，老校長因辦報被軍閥張宗昌逮捕，差一點就被槍斃，就是一個實例，而這個實例的背後，凸顯的意義：正是報紙為公器，身為真正的新聞從業員，應具備面對強權不屈，伸張正義不畏的勇氣。這一種勇氣和精神，正貫串了成舍我校長一生辦學、辦報的理念，不僅是道德情操上的高尚追求，也是一生行為的實踐，更是曾經以生命代價換取的。

「筭路藍縷，以啟山林」成校長一生奉獻新聞事業，近七十年「舍我其誰」的耕耘，不僅寫下近代中國報業及新聞教育發展史中艱辛的一頁，細細記述，也是一章美麗動人的個人奮鬥史，身為世新校友，身為新聞戰場上的鬥士，我深信，這把追求自由、民主、正義、和諧的火炬，將生生不息，永遠傳承。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吳瓊月 2005/07/22)

可貴的行誼

來到台灣以後的成先生，最受懷念的行誼有二：第一：他以將近六十歲的高齡，在台灣著手創辦世新。第二：當台灣還處在戒嚴時代，他卻不畏懼地邀請一些「野心份子」到世新教書。不媚俗的果敢作為，正是成先生最被津津樂道的行誼。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黃煌雄（前立法委員）

成舍我先生和我談不上私交，但在台灣出生長大，年齡和我差不多，或比我大十歲以內，以知識份子自期自勉，關心國事者，特別是曾在世新擔任專任或兼任教職者，談到成舍我先生，都不由自主會有懷念之情，讚嘆之意。

依我的理解，來到台灣以後的成先生，最受懷念的行誼，至少有二：

第一：他以將近六十歲的高齡，在台灣著手創辦世新。世新從一九五六年開始的「世界新聞職業學校」，到一九六〇年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到一九九一年改制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及一九九七年正式改制為「世新大學」。在漫長的校史上，成先生既不依任何權勢，也不畏任何困難，憑著信心與毅力，一步一腳印，走出這樣一條路來，這在台灣興學史上，可說是相當獨特的先例之一。

第二：當他創建辦世新時，台灣還處在戒嚴時代。戒嚴體制下造就不少異議人士，當時被稱為黨外人士，而當權者則視為是「三合一」理論下的「野心份子、陰謀份子、分歧份子」（所謂「三合一」，即黨外人士為台獨的外圍，台獨為中共的外圍，因而「黨外人士」——「台獨」——「中共」、「三合一」，黨外人士則為中共外圍的外圍）。社會各界在當局的操縱下，均以有色的眼光看待這些「野心份子、陰謀份子、分歧份子」，不少人或單位為避免麻煩，或不必要的困擾，也都盡量與這些人士保持距離，或故意批評幾句，以尋求官位或利益。在這種大環境下，成先生卻不畏懼，也不矯揉地邀請一些「野心份子、陰謀份子、分歧份子」到世新教書。這種措施即使不激怒當權者，也必然引起當權者不快，但世新卻能持之以恆，使得不少「野心份子、陰謀份子、分歧份子」得以倖免被完全排除在既成體制之下。這種不媚俗、不迎合的果敢作為，正是成先生迄今最被津津樂道的行誼。世新也因而成為當時「禮失求諸野」的天然選擇。綜觀成先生一生，這種可貴的行誼，實在有其淵源，也有其連續性。

成先生出生於清末（西元一八九八），成長於民國建立之際，年輕時代正值軍閥割據。隨著局勢的發展，他投入中國對日作戰，也經歷國共內戰。半個世紀以來，成先生見證了中國專制王朝走向共和統一的混亂與痛苦的追求過

程，成先生的「中國之旅」，表現出相當令人難忘的一貫特點：

第一：不管條件如何惡劣、政局如何困難，一有機會，他就辦報、興學。從二十七歲在北京以二百元創辦世界晚報，次年又創辦世界日報開始，到南京創辦民生報，上海創辦立報；三十五歲創辦「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四十五歲創辦「桂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在香港，也曾創辦「自由人」。

第二：在辦報興學過程上，成先生始終堅持「立場堅定，態度公正」、「德智兼修，手腦並用」。在軍閥時代，成先生本人曾多次被抓，甚至幾乎被槍斃，這種慘痛的體驗，不但更加增強他作為一個「報人」的超然獨立性，也更加強化他對特權的厭惡與人才的珍惜。

來到台灣以後，台灣的舞台雖較小，局面卻較穩定，這是成先生一生中最得以穩定規劃的歲月。在台灣，他經歷了四十個寒暑，約占「一生之旅」五分之一，「台灣之旅」，從某種意義，也是他「中國之旅」精神的延續。事實上，在台灣，他備受懷念的行誼，即與他「中國之旅」的背景有關。

大多數曾在世新擔任教職者，以及世新的畢業學生，大多會看到這樣一幅景象：一位個子高高，身體還算健朗的老人，以慢慢的步伐，在木柵溝子口狹長的校園內，一步一腳印，或者沉思，或者和來往的師生微笑，或者關注著校園內的一草一木，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從不間斷，學生來了又走了，教職員也有 的來了有走了，但這位老人卻風雨無阻，歷經三十多年，一直到他倒下去，這樣一位老人，這樣一個身影，或者這樣一個背影，正是成舍我先生鏗而不捨最生動的寫照。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吳瓊月 2005/07/23)

紀念 成故董事長舍我先生百歲冥誕—談舍老創辦「世新」艱苦歷程

舍我先生創辦世新有個崇高理想，培養「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的新聞人才，世新的學生，受他刻苦耐勞的精神影響最大，形成所謂的「世新精神」。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蕭邦導（世新大學董事）

老報人成舍我先生於四十一年舉家由香港遷居台灣，原想在台恢復其在大陸上所辦的世界日報等，但由於當時報禁的關係，未能如願。友人勸他辦一所新聞學校，他接納大家的意見，乃於四十四年邀集新聞界先進及文化界友人為于又任、王雲五、蕭同茲、端木愷、黃少谷、阮毅成、程滄波、許孝炎、葉明勳等開會商議，初欲辦一所世界新聞學院，亦因當時政府對專科學院、大學設立加以限制，不能新設。乃不得已先籌辦一所世界新聞職業學校，相當於中等學校。公推成舍我為董事長兼校長負責籌備並代表向政府辦理申請立案手續。四十五年四月間我應舍我先生之邀參加籌備設校事宜，就在舍我先生麗水街住宅，開始工作。五月下旬木柵溝子口校舍建築工程完成百分之七十左右，迄至六月底始全部完工。七月上旬創辦人成舍我先生囑我辦理立案手續應備表件及公文於七月十七日送呈台灣省教育廳請准立案。直至九月廿六日始核准招收高初級新生各一班，因招生過遲，僅招約成績及格學生六十三名。

十月十五日正式上課，當日舉行新生訓練，成校長向同學講話，其內容為：

（一）我們是一個職業學校，規模師資自然比不上大專學校。差的很遠。也比不上同級高初中，正因為如此，我們一定要加倍努力。老師認真教，學生認真學，我們一定要將世新辦到不比他們差。我並有信心，靠著這些努力，會使學校升格，由職校，而專科、學院、大學、以至研究所。

（二）儘管大家看不起的小學校，但是我以年將六十歲的老人，我敢向同學保證，我將我未來的生命全部貢獻給這個學校。我會盡量充實學校設備，聘請最好的老師，加強國文、數學、英文教學，使你們能升學，加強新聞技能的實習，使你們能就業，尤其品德陶冶，決不忽視，我們一定要符合校訓，做到「德智兼修，手腦並用」。

（三）儘管今天在座同學不到一百人，但我一定要向你們鄭重聲明，決不因學生少而放鬆紀律，讓你們上課逃學，考試舞弊，如果你們大家認為這個學校不如你們理想，則與其上課以後不願意讀或被勒令退學，不如

在今天新生訓練後能自動退學。學校即全部退還你們所繳的學費，使得你們父母免受損失。

（四）學校雖然是私立，但不是任何私人所有，所有學校的一文錢，不能浪費，不許貪污。你們交完教育廳所規定的學費數字，以後在整個學期內，學校不會向你們再收一文錢，你們可以告訴你們的父母，不要擔心所謂「樂捐」，使家長無法負擔。

以上所宣示的四點，就是舍我先生治校的目標和理念，世新就是照著這個目標和理念奮鬥，而壯大而成長，才有今日世新大學的新面貌。

早年筆路藍縷勤儉治校的故事

四十五年木柵溝子口仍屬窮鄉僻壤地區，無論文化交通以及經濟，都顯得落後，那時市區羅斯福路馬路尚未修築完好，景美木柵道路更是碎石路面，車行頗艱，有一天我陪著舍我先生前往校區察視工地，由考試院大門進入，沿著一條小路到達本校（世新），校區前後都是一畦一畦綠油油的稻田和菜地，三面環山，雜樹叢生，野花滿谷，後面雖有一條石階小徑通往景美，但人跡罕至，左邊山腰只住蔡姓一家，頗為寂靜，置身其中，確有一種世外桃源之感，這是一個讀書的好環境，右邊山麓築有小屋三間。那是創辦人成舍我先生到台時所購買，原打算市區疏散全家遷居於此，那知道以後竟成了本校第一所房屋，也成了世新發跡之地，可見成先生的眼光有獨到之處。

學校雖已開學上課，但校區仍為荒野之地，荊棘叢生，地面高低不平，排水不良，乃利用學生上勞動服務課時除去雜草，整地掘溝，經過一個月後，整出一快空地作為操場及升旗台。

當時教室雖僅四間，但能充分利用，以一間為辦公室，一間為圖書館，二間為學生上課教室，遇有集會或週會，則將上課教室打通作為禮堂。因經費的關係，其餘房屋如飯廳之類都是用竹子木板搭成的，圍牆是用木橋刺鐵絲築成，簡陋萬分。

成先生原欲籌募二、三百萬作為學校開辦經費，但勸募結果，因那時工商界對捐資興學意願不高，僅募得新台幣三十萬元，舍我先生乃放棄募捐念頭，認定只有自己咬緊牙關，精打細算來硬撐了。以三十萬來開辦一個學校，其捉襟見肘情況，可想而知。最初二年，真是苦不堪言，當年教職員工人數雖少，但每月開支亦需一萬餘元，教學用品清潔用具除外，有

時不夠開支，成先生將其在別校兼課的終點費，及立法院薪資帶到學校來抵補。並曾將麗水街住宅抵押借款供學校調用，經費雖困難，但對教職員工的薪資按時發給，從不拖欠……。直至第二年稍感寬裕。

四十六年春，向教育部借貸美金三千元購辦印刷工廠設備如機器鉛字之類，約定為教育部抵印叢書，在排版費內扣除百分之卅償還借款，當時並為世界書局及中小學教科書聯營處排印書籍，以增加收入。印刷廠當時並附印刷講習班，擬收社會失業青年加以訓練，講習時間以二個月為一期，分排版印刷兩組，所以訓練技工除供工廠自己雇用外大多數就業於各大報設及印刷公司。

學校雖小但所聘教師幾乎都是國內第一流的學人，因成先生私人關係，陶百川、蔣復璁、程滄波、阮毅成、端木愷、蔣勻田、胡秋原、沈雲龍、陳紀澄、王藍等專家學人均陸續來校任教。因他們給世新的鼓勵使嚮慕新聞事業的青年對世新有了信心。學生逐年增加，乃有四十八年教育部准許招收專科生兩班。三年制五年制各一班均稱新聞科。四十九學年度正式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以後改學院，現在已改為世新大學。成先生在四十五年世新開辦時第一期學生新生訓練席上所講的目標和理念都實現了，更證明了成先生的眼光遠大。

成校長那時居住台北市區麗水街，無論風雨，每日必來校一、二次處理校務，並要求大家今日事今日畢，每日收發文簿必須送閱，藉以了解校務動態。各單位主管及擔任重要工作人員每日須寫工作日記送閱，並分別予以批示藉已了解工作情形，同時做到上下互相溝通的效果。對人事管理相當嚴格，職員必須簽到簽退，那時人少事少，最少一人當兩人用，可以說做到人盡其才，尤其對財務管理，特別嚴密，物品出入必須登記，如工廠用鉛字木條鉛條……領用新品必須將舊品繳回，確已做到物盡其用的地步。

（提問者：）你認為其新辦學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

舍我先生調閱學生週記作文一本一本一篇一篇翻閱，藉以了解學生學習及老師批改的情形，從週記中了解學生個性作為指導，從老師批改作文上作為是否續聘參考。他事必躬親，每日工作達十餘小時，似有用不盡的精力。

辦學所以成功的關鍵因素，依我個人觀察結果，約有下列四端：

（一）舍我先生創辦世新有一個正確的崇高理想，他要培養「德智兼

修，手腦並用」的新聞人才，供自由中國反攻大陸後，建立新聞自由健全新聞事業之用，藉以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礎。同時他是當代畢生為新聞事業而奮鬥的老報人，必須貫徹其主張，實現其理想而後已。

（二）舍我先生具有刻苦堅毅的創業精神，他在大陸上所創辦的報紙「如世界日報、晚報及民生日報、上海立報都無失敗紀錄」，均依賴此種精神而獲致成功。即以創辦世報而論，其間不知遭遇到多少困難，不止是經濟上的問題，諸如校地的擴充，校舍的增建，常發生無謂的糾紛，不知凡幾，最後均能一一獲得解決。也是靠此種精神所致。

（三）舍我先生經濟公開，公私分明，他常說，不當用的錢絕不浪費分文，該用的錢一擲千萬，也不吝惜。學校一分一厘，捐滴歸公，不容許貪污，所以世新經他積年累月儲蓄，奠定了經濟的基礎，才是促使辦學成功的主要關鍵因素。

（四）全校教職員受舍我先生刻苦堅毅的精神所感召，同心協力，謀求校務發展，開拓了世新光明前程，而有以後的改制，為專科、學院、大學的成就。

（提問者：）你對舍我先生的瞭解與觀感

我自四十五年四月間追隨舍我先生左右一直至八十年四月他逝世，整整三十五年之久，朝夕相處，深知其待人和藹親切，從不說使人感受不了的重話，他雖有秋肅之貌，但有春溫之心，最令我慕仰的是他以不屈不撓的創業精神，刻苦耐勞的熱愛新聞工作的態度，他一生潔身自好，為人正派，從不利用立委職權，營求自己利益，從不參加無謂應酬，接受別人請託，從不向政府機關關說和介紹私人，他不畏強權，申張正義，在四十年代威權時代，他言人之所不敢言，行人之所不敢行，當時最轟動台灣的報人龔德柏、立委馬乘風、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三個大案，大家都噤若寒蟬不敢出聲，成先生挺身而出，在立法院向行政院院長提出質詢，當時以文字或言論所謂不當，受當局排擠或因而入獄者。出獄後，別的機關學校都不敢任用，成先生則延攬到世新任教者，有台大陳鼓應、王曉波、政大吳盛木、自由中國博正、馬之驢、國語日報朱傳譽等，尤其他節儉成性公私分明的美德，足為後人典範，他愛國家、愛家庭、愛學校、愛同事、愛學生，世新的學生受他的嘉言懿行，刻苦耐勞精神所影響最深最大，形成一種所謂「世新精神」。由世新畢業出身服務於新聞界傳播界的校友，都能刻苦耐勞的工作，獲得社會各界的讚許。他離開人世為世新累積了廿餘億基金在改大學之用，也培養了數萬名新聞傳播人才，為社會國家服務。成先生

對社會國家貢獻之大，實非言語所能形容於萬一。

（本文為蕭邦導先生接受沃土傳播公司訪問之訪問稿）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吳瓊月 2005/07/23)

舍老我師與國民黨

舍老為了表示決心，要到有自由的地方去辦報，在他離開上海車站之前，將最後一根煙蒂丟在車站，說：「不回大陸，絕不吸煙。」一直到他離開這世界，都沒有再吸過煙。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荊溪人（前世新編採科主任） 發佈日期:2005-08-18

舍老原來曾是國民黨黨員，也許很少人會相信，但事實確是如此。舍老在年輕時，是一位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十四歲就參加國民黨的「學生軍」。後來因為尊翁的反對，沒有到軍校去。大約在「五四運動」前後，他看不慣軍閥橫行，就加入了國民黨。

民國二十四年，他到南京去辦「民生報」，看到黨中央給各級政府的一份「密令」說：「各級政府科長以上的職務，都應由國民黨人擔任。」舍老才將黨證寄回給中央黨部，他說：「一個政黨以權位和金錢來籠絡黨員，這個政黨就開始腐化了。」

舍老雖然已是黨外之身，但對國民黨正確的政策，他在報紙上仍是支持的。一直到他晚年（九十歲）辦台灣立報時，他還對同仁說：「如果台灣沒有國民黨，共產黨早就過來了，如果要台灣能安定進步，國民黨的領導還是不可少的。」

絕不做御用記者

民國三十一年，大公報創辦人張季鸞先生病逝重慶，蔣委員長親蒞致祭，可見委員長對張氏的器重和敬慕。當年大公報有關國民黨施政的報導和評論，是「小罵 大幫忙」，對一些不當的措施，竭盡批判之能事，但當軍國大事，大公報絕對支持政府。張氏去世後，委員長亟欲物色一位適當人選，來替代張季鸞，一眼看中了舍老，希望舍老能成為國民黨的諍友。幕僚人員曾兩次轉知舍老，委員長要約見，但舍老都巧妙地婉辭，他表示：「生平絕不做御用記者。」在抗戰時，能蒙委員長召見，可說是一項殊榮，一般人都會受寵若驚，但舍老都視若無睹，立定主張要做一為獨立的記者。

要在有自由的地方辦報

當時在上海，中共要他們留在大陸，並將「世界日報」、「大公報」和「觀察」等雜誌，都還給他們繼續辦下去。當時王芸生和儲安平都留下，只有舍老不願意。第二天，他們借用中央電台，義正辭嚴地答覆中共，他

要到有自由的地方去辦報。

舍老為了表示決心，在他離開上海車站前，戒掉他吸了十多年，每天一包多的香煙，他將最後一根煙蒂丟在車站，他說：「不回大陸，絕不吸煙！」舍老從香港到台灣定居，一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都沒有再吸過煙。

舍老先到香港，和王雲五、阮毅成、許孝炎、雷嘯岑等，辦了一份「自由人」三日刊，繼續撰文反共，不遺餘力，那時他們的立場，還是傾向國民黨的。

在台灣也不能辦報

舍老一生辦報成癮，但在台灣報禁時期也不能如願。他四十年間來台，卜居在麗水街，當時他是立法委員，沒有辦報也不忘為言論自由而爭。老友雷震，因「自由中國」雜誌的言論，而含冤繫獄。舍老多方奔走，無法營救，曾和陶百川等在立法院提出一份聲明，指責情治當局對雷震案不進行公開審判，是何道理？當然這份聲明各報都刊不出來。像舍老這樣為人權而爭，為新聞自由而爭，台灣當局怎能放心讓他辦報呢？

四十三年時，文化學院建校，新聞系請舍老去演講。舍老認為，在自由中國不能自由辦報，這是一大諷刺。他說：慈禧太后時代也沒有報禁，台灣是在開倒車。誰知國民黨中好事之徒，向總裁打了小報告，蔣公傳話說：「成舍我不要辦報了，他不妨辦個學校。」這促使他有了辦個新聞學校的念頭。

早在北京時，舍老已辦過世界新聞學校，林海音、閻奉璋都是那裡的畢業生。所以他駕輕就熟，結合了在台港知名的新聞學者，兩年後，世界新聞學校在溝子口的「翠谷」中誕生。據說當時國民黨還捐贈了十萬元，算是給舍老的鼓勵。舍老在開學時說：「他要帶一萬名新聞尖兵，重返大陸辦報。」這番豪情，雖已給歲月沖淡，但世新從高職、五專、三專、學院到大學，走過了四十三個年頭，畢業生已超過三萬人，他們在全世界的華人社會中，都在善用他們對大眾傳播事業的影響力。

五十年代時，陶希聖（蔣公的文膽）在立法院對舍老表示，中央可開放給他辦報了，舍老一時信以為真，就在羅斯福路師大路口（現保固大廈）看了一塊土地，但遲遲不能定案。當時夜間部主任蕭宗謀，勸他先買下來，但舍老說，要等中央的手諭拿到，才可著手籌備，果然一等數年，仍沒有訊息。舍老笑著對蕭主任說：「如何，辦得成嗎？中央不會開放報禁的，

還沒有這樣的氣度！」

無意在香港設分校

民國六十三年間，香港時報要在原址改建大廈，缺乏資金。當時中央黨部張寶樹秘書長，曾兩度過訪，他要舍老恢復黨籍，舍老說，他年紀大了，不要再找麻煩了。但他又詼諧地表示，如果在他百年之後，給他覆上一面黨旗，他也不會反對。

張秘書長來訪的真正目的，因為香港時報要改建大廈，缺乏資金，希望和世新合作。港時出土地，世新出資金，改建地下二層，地上十一層，地下二層和地上三層的香港時報，地上八層的世界新專，成立世新香港分校。

當時外匯管制，張秘書長保證官價結匯，共七千萬港幣，約合兩億多台幣。舍老說，他沒有海外投資的意願。過了一周，張秘書長又來要答覆，舍老說，學校的錢必須通過教育部的核准，出國校資也要通過外匯管制。張秘書長說都可解決，但舍老又說：「太麻煩了，而且違法的事，我一生都沒有做過。」

事後舍老透露，他不到香港設分校，是因為一個外鄉人到香港去辦學院，到那裡招收不到學生，必定年年虧累，恐怕連台灣的老本都要賠下去。他指出：台灣有一個聯招制度，每年將足夠的名額送到學校裡來。在香港，錢穆可以辦學校，因為政府在暗中補貼。我們得不到補貼，我也不願意接受補貼，還是謝謝國民黨的好意，請他們另請高明。

不准黨派介入校內

在學校中，舍老不准黨派「入侵」。在戒嚴期間，各公私立大學，大都有國民黨知青黨部的分支機構，公然有辦公室，吸收學校師生為黨員，辦理各種活動。當年國民黨也有意在世新成立知青黨支部，卻為舍老婉拒。他說：「如果民社黨、青年黨，也要來設分部，我都得答應，這樣一來，還像個學校嗎？」

最後，經過不斷爭取，舍老答應在訓導處擺一個辦公桌，國民黨派一位專員來辦黨務。記得有位祁先生，他很盡職，也守分際，透過國父思想研究社等社團，將黨務辦得有聲有色，每年在各大專院校的黨務成績評估，均名列前茅。舍老從不過問，但他私下也表示，這不失為校園安定力量之一。

舍老很不滿意軍訓教官在校的作為，因為有些教官會到教育部去搬弄是非。舍老在立法院，提出一項書面質詢，痛陳「國民黨捧了兩個金飯碗在討飯」。他在文中指出，一個金飯碗是「三民主義」，有些文史老師，到世新來求職，舍老問他有什麼專長？他們提不出來；問他們能教什麼？他們這也不會，那亦不行，卻說能教「國父思想」。舍老說：「國父思想博大精深，你一無專長，怎能教國父思想呢？」

另一個金飯碗是軍訓教官，在私立學校裡要求領公立學校的待遇，軍訓課文是必修，要領超支鐘點費，更有些私校，將教官看成灶王菩薩，除了薪津之外，還有各式加勤津貼，希望他們「上天（教部）言好事，下界（學校）保平安。」

舍老的質詢，當然各報都登不出來，後來我將它全文刊載在編採學會出版的「新聞學報」中，不致淹沒。都是為國家儲才

當年有很多「白色恐怖」的學者入獄，出獄後不能在公立的大專院校執教，私立學校也不便收留，舍老很痛惜這些人才，一個個網羅入校執教，如陳鼓應、王曉波、吳盛木、朱傳譽、黃珏……等。有一天，警備總部政治部主任林中將來訪，舍老接待之下，方知有兩件事，警總不太諒解：一是「小世界」報導的部分新聞，是來自莫斯科和中國大陸的廣播，這是收聽俄共和匪區廣播，觸犯禁令。二是世新聘請異議人士為老師，也不太妥當。

舍老說，「小世界」的電訊，政府既有規定，不便收聽，今後只報導來自東京、香港的電訊就是了。其實這是換湯不換藥，內容並無兩樣。至於世新聘用政府不歡喜的老師，舍老說：「這些都是知識份子的菁英，如果任其在社會中漂泊，不但引起社會問題，也會變成政治問題，公立學校將他們拒於門外，我為惜才而加以安置，是為政府解決問題，應該不是給政府增加麻煩吧！」林中將悻悻然，連聲稱是而辭出。

以上就記憶所及，拉雜寫出，給舍老與國民黨之間，留下一鱗半爪，足以看出舍老的清風亮節，君子不黨的风度。也使一些身為國民黨黨人，卻並不知自我珍惜，比起舍老來，舍老可說是國民黨的知音了。

一九九八·五·三十於花園新城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吳瓊月 2005/07/24)

往事

舍我公對教師的選擇，是有一定的脈絡可尋，只要他有能力和學識，他老都予以尊重，莫非就是希望：「百川流入大海，匯成知識的學海。」而世新，就是他老心中的大海。

——文章出處：《成舍我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黃珏（世新大學董事）

往事無痕，但在我心中，卻清晰如昨，許多人、事、物都很難忘懷。

記得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我和吾妹都因「非其罪也」之冤被捕，送入秘密監獄裡，渡過了十年又兩個禮拜。從監獄釋出後，再度面對這個隔離久遠的社會，感到十分生疏，因此母親勸我找個工作，重新踏入社會，藉此調適自己的身心及信心。幾經考慮，我接受了母親的建議。可是這一步踏出去可真是不容易呀！我曾向一些國家機構及學校求職，也曾由有社會地位的人推介，但都以「安全」為理由，不予錄用。當時我十分迷惑，不知這「安全」二字究竟何所指？為此心中是十分難過。好在我的雄心壯志早已消磨殆盡，何況母親又為我們預備了一個溫馨的家，於是，心一橫，決定退隱家園，做一名家庭主婦也使得。

世事難料，人有時真是身不由己。有一天，我一位學姊跑來我家說：「我們學校正少一位英文老師，你去吧，校長很好。」我就是這樣糊里糊塗跟著學姊進入了滬江中學。校長是和善純良的基督徒，對世事的紛紛擾擾似乎知道的不多，也沒有探究我的背景，就認定我是位合格的教師。一學期很快就結束了。一日，校長對我說：「黃老師，你真是位好老師，你帶的這班學生，各方面都很有進步，我想下學期請你擔任高三的課。」，我欣然答應。心中十分歡喜，尤其學校離家非常近。但到第二學期開學時，我並沒有收到學校的聘書。許久以後，一位滬江的同事告訴我，沒有續聘我的原因；原來那學期學校期末時，教育部派一位督學來校視察，當他看到教師名冊時，立刻指著我的名字，很驚慌的問校長，「這是個危險人物，你怎麼敢聘請她？」。聞道此言，我只有無語問蒼天。心中不免叫屈，不禁輕聲的說出了一句：「他們只知道欺侮好人！」。

天無絕人之路。一天，世新校長成公舍我來我家看望我母親，舍我公是我母親的表弟。表舅一見我就問道：「你沒有出去工作？」。母親就將我曾經在滬江所遭遇的事情說給表舅聽，表舅臉色立即沉了下來，說道：「豈有此理，既然已經依法服刑，刑期滿後，就應該讓他們就業，都是能做事的人嘛。」片刻後，就很慈愛的對我說：「你不要灰心，你到我學校來，到世新來將書。」。

表舅毫不懷疑我的能力，就這樣提攜我進入了世新，擔任英文教師。這是民國五十五年八月的事。

第一週，走進世新的大門，那時的大門正位於現在後門的位置上，兩邊圍牆上寫有「手腦並用，德智兼修」八個紅色大字。走進教師休息室裡，看到了一些知名的前輩，竟也都是這裡的老師，我心中有些驚訝，也有些高興。第一位見到的就是蔣勻田先生，那時他是民社黨的黨魁，他的思想、觀念較該黨前賢都要積極開朗，對執政黨而言，並不是位受歡迎的人物。在當時，在野黨有兩個；一個是民社黨，一個是青年黨，完全沒有參與國事的機會和權力，只是在國民黨需要他們裝點門面，顯示是個多黨的民主政府時，才會提到他們。蔣勻田先生是先父的好友，他在政壇時浮時沉數十年，對執政當局的作為是十分清楚的。蔣伯伯見我經過十年冤獄之後，尚能來世新教書，非常欣慰。他不止一次對我說：「成校長很愛惜人才的，在這個苦難的時代裡，他總會想方法設計保護受害的知識份子，你能來這裡教書是很好的。」他還用手指著周圍：「你看，這裡的老師，都很自由自在，都很快樂，雖然錢很少。」說畢，蔣伯伯自己又笑起來了。

事實上，當時師資陣容裡，許多都是碩彥之士：有曾任外交部次長的胡育慶大使，教國際政治，胡老師雖是外交官，但教學很認真，親自寫講義，講起課來，聲音宏大，滔滔不絕。有時我從胡老師教室旁邊走過，真恨不得走進去旁聽。還有於民初以「勤工儉學」留法十五年彭襄教授交法文，他曾居高位於廣西省政府，被視為是桂系的大將之一。還有抗戰時即曾在清華大學任教的張佛千教授，另有詩、書、畫三絕的蕭一葦老師，他與江兆申先生（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都是溥心畬大師的大弟子，可惜蕭老師曾是孫立人將軍的秘書，這就難以出頭了。

其餘還有許多老師是我所不熟知的，但那間小小的休息室裡確是濟濟多士。因為這些老師們，其中許多都是響噹噹的政治人物：如胡秋原先生、也有些是特立獨行的學者：如史學沈雲龍教授，曾約農先生（曾文正公四世孫）。他們都不計較待遇而熱心來世新教書。這凸顯了他們對舍我公興辦新聞教育的肯定。學校早期還有一位副校長，就是今日的董事長葉明勳先生。葉先生來台時，正值盛年，思維縝密，才華洋溢，是國民政府中央通訊社派駐台灣的第一位特派員，因為年輕，所以活力旺盛，加之在大陸時即是新聞界的翹楚，所以人脈廣泛，作為副校長，確實是校長極大的助力。今日擔負起世新董事長的重任，也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由於台灣國內外局勢，均已漸趨穩定，諸位大師也日益忙碌，於是許多名師不得已辭去兼職離開世新了。

時序繼向前推進，到七十年代世新學生，人數倍增，老師員額也增加不少。

而整個社會，生活態度以及社會價值均在迅速改變，惟有舍我公對知識分子疼惜之心，不曾變過。由於五十年代時，許多具有良知的智識分子，有鑑於大陸慘敗的教訓，因此，不斷的以文字、以語言對時政予以嚴厲的批評，更有人建議政府應以民主法治為基礎進行全盤革新，可惜書生報國，雖是一片愛國熱忱，卻激怒了執政當局，紛紛以多種不同的罪名，被捕下獄。直至刑期滿後，這些精英分子才逐漸被釋放出來。但出牢就是失業，因為受到人為的排斥。此時只有舍我公了解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對社會不合理的現象，觀察較為敏銳。反應也較激烈，但愛國自強的熱忱卻是應受到重視的，況且均是些學有專長的人，有豈容投閒置散？於是他老就像一把大大的保護傘，將許多無辜受難的讀書人容納在世新，發揮所長，也尋得了一條活路。當時舍我公此類舉動，不但當事人深深感激，也叫社會大眾感動。

一般人都認為在普通學校教書的一定都是文人，其實並不盡然，在世新的教師群裡，不但有文人，還有武將哩。大概是民國七十年左右，我在教師休息室內，看到了過去在鳳山，孫立人將軍麾下的副總司令舒適存將軍，我在驚訝之餘，立刻趨前問候：「老長官！您好！您來找誰？」。「我來教書，教國文。」。舒將軍很自然的回答我。我心中十分嘀咕，怎麼將軍也來教國文？後來從許多湖南前輩處，才知道籍隸湖西的舒將軍，果真不是等閒之輩，文臣武將之才兼而有之，他的國學造詣很深，尤其擅長詩詞。老校長特邀他來校授課，是希望他多教學生古文及詩詞。老校長恨不得他的學生都是全能高才。世新早期的國文老師都較年長，均會寫詩填詞，彼此唱和起來，都有「當眾揮毫」、「倚馬可待」的本事。傳聞在諸位老師的詩作裡，舍我公最欣賞舒適存老師的詩，因為詩裡不但有詩情，還有豪氣。不過有關此一評語，可得求證於蕭邦導老師了。蕭老一生服務世新，是舍我公的左右手，對世新校史耳熟能詳，特別有關世新校產、地界、老風景，他老都能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所以現在仍在本校董事會襄贊葉董事長，在許多事務上，也是嘉玲校長的最佳顧問。他老年高德劭，謙和敦厚，是我非常尊敬的長者。

到了白色恐怖的末期，民進黨建黨成功，本土化的浪潮漸漸湧現，台灣的政治生態也有了新的面向。一日，有位面貌很熟悉的老師，與我並肩走進世新大門，定睛一看，原來是民進黨的立委黃煌雄先生。哇！新世代的人物也來到了世新。此刻，我心中突然有了一種嶄新的領悟，我感覺到舍我公對學校教師的選擇，是有一定的脈絡可尋。他老重理性、崇尚自由主義、他自己也無任何黨派色彩，所以他不計較人的身家背景、思想主張、社經地位，只要他有能力和學識，盡心的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他老都予以尊重、包容、禮聘。我推想：他老以這樣的尺度來聘請老師，必定對未來有一個希望。莫非就是希望：百川流入海，匯成知識的學海，而世新就是他老心中的大海。

舍我公創辦世新，擔任校長時，也是一位立法委員，當時立委的待遇相較其他行業，略高一點。而世新初創之期，經費常常入不敷出，遇到這種情形，聽說校長總是將他立委的薪津填補學校資金的短缺。尤其是教職員的薪水，決不怠慢拖欠，必須按時發出，記得每月二十一日就是世新發薪水、鐘點費的日子，這天，一早就見會計欽春慶小姐抱著一大包薪水袋來到教師休息室，親手將它送到各位教師手中，欽小姐那時約莫二十歲，長髮披肩，十分清麗秀美，對待老師有如對待長輩，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世新按時發薪水從不拖欠的規範，數十年如一日，令人敬佩。

台灣早年，社會資源很貧乏，許多私立大專院校，財務周轉不靈時，只好拖欠教職員的薪水，所以有人就因世新不欠薪，待遇雖薄，但每個月總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乃辭他職而來世新工作。由此可見舍我公辦學，實在用心良苦。可是社會人士有人批評他老「小氣」。我常仔細細量，身覺事實並非如此。只因他老自奉甚薄，從豐富的生活經驗裡，深深體會到節儉必得好果實的因果律，所以也希望別人節儉，他老從不負債，也不向人借錢，有時和我們晚輩談話，總不忘記告訴我們：「有獨立的經濟權，才可以理直氣壯的做人做事。」我無論辦報、辦學校都是從「勤儉起家」四個字做起。」。可惜老人家的理財原則，我和妹妹等都沒有掌握得住，以至積蓄不豐，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

立法委員是民意代表，是代替人民向政府表達意見的人，所以向行政院質詢是他們的天職，敢於直言的立委微乎其微。惟有舍我公獨樹大旗，為民喉舌，他在立法院質詢時，言辭犀利，擲地有聲。當時他對軍法的不公，言論不得自由、人權毫無保障，均有過嚴厲的發言，令人萬分敬佩，而成委員的質詢，也確實能產生實質上的影響力，如質詢老報人龔德伯案就是明顯的實例。龔德伯先生湖南人，是南京救國日報的創辦人，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在大陸是有名的老報人。三十八年隨政府來台，三十九年在陸軍大學演講後即告失蹤，音訊渺無長達五年之久，家人焦急可想而知。其實大家心理都明白，大概是被捕了，只是不知關在那裡。舍我公就以這個案，義正辭嚴向政府質問，強調「抓了人，不審、不判、不殺、不放，百姓的人權究竟在哪裡？」那時可是個危機四伏的時代，這樣勇敢的將秘密揭出來，直接責備政府，是冒著生命的大險，當時這種久未聽過的正義之聲，帶給社會極大的震驚。其實，五年以來，龔老伯一直被關在桃園南崁情報局的感訓所裡，這裡是絕對不許與外界有任何接觸的，我和妹妹也是關在這個天牢裡，所以常常看到這位古稀老人在院中散步，時而抬頭茫然的看天，時而低首常常嘆息，見到此情此景好生不忍，深深感到這時代的殘酷。所以每當我們從他身邊走過，就會輕輕的對他說：「龔老伯！保重身體啲，要活著走出去呀！」他老才會微微笑道：「丫頭！不要胡說。」（丫頭是湖南人用來稱呼年輕女孩，我們和龔老伯都是湖南人，故語言

相通。）。。

自從舍我公對龔案公開質詢後，龔老伯在獄中的生活立刻獲的明顯的改善；每個月政府給他九十元的營養費（當時可是一個大數目），不久就被調至台北延平南路谷政文先生管轄的偵防組看守所裡，谷先生對「文化犯人」一向最為優待，他將龔老伯安置在一間最大的牢房中，並替龔老伯買了許多的書，任他閱讀，如此約莫一年，龔老伯終於獲得無罪開釋，還他自由，此時龔老以年近八十，無罪也坐了七年牢。回家後，龔老見人就說：「我沒有死在牢裡，是舍老救了我，他在立法院講話有力量，政府也怕他，不得不放我。」。這裡是他出獄時，管理員說給他聽的。在五十年代，權威體制下有何自由可言，只有舍我公抱著舍我其誰的堅強鬥志，冒著危險捍衛人權，不遺餘力的爭取言論自由，他真是台灣民主鬥士的第一人。

任何一個大時代，總有些人，不倚權位，不仗財勢，卻做了許多不平凡的事，意義非常重大，對國家社會產生長遠的影響。成舍我先生就是在中國長期的困境裡，適時而出的賢士之一。他老一生為推動國家走上民主的種子，開出自由的花。感謝前輩的努力，如今我們果真擁有了這朵自由的花。舍我公也曾為爭取言論自由而奮鬥不懈，為新聞界立下了典範。他的所作所為確實是後世子孫應念茲在茲，不斷學習的課題。

歲月悠悠，時光飛逝，今年舍我公已邁入百齡之年，他老一生轟轟烈烈，有苦有樂，終究寫下了輝煌的生命史頁。天上人間均會因他畢生的貢獻而齊聲頌讚。面對今日的世新，傑出學生遍佈海內外，而教師群都十分年輕優秀，時代的腳步是既快且新，世新、立報在嘉玲校長，露茜社長的主持下，也快速地有了全新的風貌，受人讚美，相信舍我公在天之靈，必也領首微笑，欣慰不已。

而我，自入世新以迄退休，匆匆竟也幾近三十年。對過去一切，仍能感懷依戀，昔日生活週遭所發生的點點滴滴也仍印象深刻。回憶往事，總令人有些許感傷，更何況說我敬愛的舍我表舅，數十年來對我的愛護、了解、提攜，如今卻已天人永隔，這深厚恩惠我是無法報答的了，只願您的靈知道，我對您的感激與懷念是永恆不息的。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吳瓊月 2005/07/24)

憶舍老往事——舍老百年冥誕有感

舍老在世新發行「小世界」小報，其中藏有「大新聞」，其「大新聞」，得自外國廣播與翻譯，雖歷警總等國特單位多次警告，仍繼續按時發行。——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吳盛木（前世新教授）

今年九月二日適逢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先生百歲冥誕紀念日，筆者追隨舍老服務世新前後二十餘年，舍老為人處事之諸多往事，迄今仍然令人無限懷思與感佩。

一九六八年，筆者因蔣介石政權興起文字獄之恐怖統治，遭受其國特暨職業學生之構陷，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暨國防部覆判局以筆者在政治大學任職副教授 兼任台北市國中教師訓練班教務組長，於授課時，攻訐政府為匪宣傳之罪名，依據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判刑七年。蔣家王朝恐怖統治時期，政治犯出獄後，處處受到 其國特之監視，無法覓職，謀生不易。一九七五年，筆者出獄後，承蒙吾友陳先生向舍老推荐，舍老質問吾友為何不在政大任職，吾友稟明受到政治迫害之詳情，舍老立即面告白：「聘」。翌年八月，筆者接到世新專任副教授聘書時甚感驚訝，後經吾友告知當時舍老嘗謂：學校已開學，明年將聘為專任等語，舍老果然履行其言，吾等深為舍老愛護政治犯並堅守誠信而銘感肺腑，感激不已！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厲行恐怖統治時期，全國大專學校屈服於其淫威，無人敢聘政治犯任教，惟獨舍老敢聘數十名政治犯在世新任教，當時舍老堅持維護學術自由，無人出其右。但，舍老每年均受到警總等國特單位警告，不得續聘這等政治犯，舍老卻以渠等縱然過去犯錯，亦已受到政府之懲罰，現在恢復其自由身，何況渠等均具才識為何不能聘用等語予以反駁與保護。筆者兼任世新教務主任時期，國特亦曾當面指名數名政治犯不得續聘，筆者告以本人無權決定續聘與否，請該國特向 舍老董事長建言。國特單位每年暑假均對舍老警告不得續聘政治犯，舍老深感不勝其煩，最後乃以這數十名政治犯於世新山谷中，只有前後兩個校門，汝等隨時要再逮捕亦較易等語予以反駁，促使國特單位支吾其詞，其後未再騷擾。舍老之用心良苦，竭力愛護政治犯與維護學術自由，堪為當代學術界之典範，惟眾多學術界人士 屈服於蔣家王朝之淫威，威武不能屈之士大夫精神蕩然無存，豈無靦顏？

新聞傳播界屈服於蔣家王朝魔掌之下只報喜不報憂、歌功頌德為能事之時代，舍老在世新發行之「小世界」小報，其中藏有「大新聞」，當時

亦讓立法委員諸公 競相閱讀。其「大新聞」，乃得自收聽外國廣播與翻譯日本報紙（當時只有國特單位特准之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等人士始能訂閱）而成。筆者曾奉舍老之命，參與日本報紙之翻譯工作，譯稿均經荊溪人先生寫成新聞稿後當晚燒毀，以免遭遇不幸。「小世界」雖然歷經警總等國特單位之多次警告，仍然繼續按時發行。舍老堅持新聞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可是，後來余登發事件發生，警總等軍法單位以余登發先生口頭翻譯日本報紙給他人聽取而違反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暨知匪不報等罪名予以判刑，乃迫使舍老不得不停訂日本報紙。之後「小世界」再無「大新聞」之出現。足證蔣經國時代扼殺新聞自由更甚！蔣家王朝祇圖滿足個人權力慾、專制獨裁、實施戒嚴三十餘年、厲行恐怖統治而扼殺自由民主之逆行，抵擋不住不屈不撓、前仆後繼之黨外人士暨多數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之時代潮流，終由蔣經國吐出最後一口髒血而告結束，還給台灣自由民主之天地。

舍老重視學生之心理輔導，一九八一年暑假曾令筆者籌設學生輔導中心，任命筆者兼任該中心主任，並文呈教育部核備。同年末，又任命筆者兼任教務主任，依據當時法令，凡教授均可兼任大專學校教務主任，世新文呈教育部核備，惟教育部受到國特單位之干擾，歷經一年始終未予核備亦未退回。筆者兼任教務主任期間，國特單位更加頻繁查訪騷擾世新，壓迫張校長（按：張凱元先生）更換。成主任（按：成秀峰女士）曾請筆者向教育部安全室孔服農主任打一個招呼以利核備，筆者告以本人絕不向國特低頭。筆者曾向舍老建言，請勿因本人而加增世新麻煩。舍老面告筆者教育部若違法退回核備，勢必遭受黨外人士之撻伐，而教育部亦絕無膽量不准核備。後來，舍老終於顧慮為避免筆者再受國特之誣陷，而不得已另請高明，讓筆者專任教授兼任學生輔導中心主任。政大教授諸公明瞭其中曲折，乃嘗謂：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反比教務主任接觸學生之機會為多，教育部暨國特單位之無知愚昧與違法蠻橫，為教育史上之一大醜聞，而嗤之以鼻。

舍老以勤儉廉能治校著名。四十餘年前，傾其財產創辦世新，由高職而專校而學院以至今日之大學。身後乃留給世新數十甲土地與校舍，積存數十億基金，並培養出新聞等各界四萬餘名人才。創校以降，世新學生繳交學雜費，除教育部規定應收款項之外，絕無額外收取。至於教職員工之薪俸，按月發給，從無延誤或賒欠。學校之各項開支，切忌浪費。舍老善於校外理財，除每月按專任教授接受微薄薪俸之外，所得一切獻給世新，分毫不納入私囊，其廉能，為教育界所稱頌，而其清高奉獻之精神，更非假教育中飽私囊之徒所能效法。

值此舍老百歲冥誕之日，敬謹草提以上數則往事，聊表感激與追念之忱，祈求舍老在天之靈冥福，並保佑世新大學茁壯與國家自由民主之永續發展。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吳瓊月 2005/07/25)

舍公的理財與世新

他老人家一隻眼睛，因白內障開刀失敗已失明，
另一隻眼睛，不久也患了白內障，
舍公都要在昏暗的燈光下，用放大鏡一一過目，
往往步下樓梯，已夜晚十一點了。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欽春慶（前世新大學會計室主任）

每次談到舍我先生一世新大學的創辦人，我就不由得嚴肅起來，他老人家深深地影響到我，讓我在為人處事方面，得到深切地教誨，這位嚴格卻又慈祥的長者，永遠令我懷念。

創辦世新、羣路藍縷、勤儉刻苦、點滴累積

舍公在六十歲的時候，才創辦了世新，那是他心中的理想；舍公生平還有另一項大目標就是辦報。民國四十五年，他向幾位前輩籌募了數十萬元，就開始了在台灣創校的教育工程。辦學過程的艱難，是想像得到的，所幸舍公胸有成竹，從「勤」、「儉」兩字下手，而且以身作則，刻苦耐勞，處事嚴格，公正不阿，終於成功，除學校校舍、土地、設備等外，並累積建校之現金存款達二十餘億元。舍公創業的毅力與決心，令人無比的敬佩。在世新，蕭董事邦導老師曾陪同舍公走過這段艱辛歲月，迄今已四十餘年，對於世新也有著莫大的貢獻。而我服務世新也近三十二年，追隨舍公擔任會計室主任工作迄今已二十九年。舍公創辦世新，在羣路藍縷之中，艱苦奮鬥，點滴累積，可謂是親眼目睹，體會尤深。事實上，我認為舍公不但是新聞界的巨擘，新聞教育的泰斗，更是一位成功理財專家，奠定了世新今日發展的最重要基礎。

尊重老師、作風難得、嚴格管理、事必躬親

時光過得真快，今年已經是舍公的百年冥誕。回想起來，舍公的許多風格，現在的同事也許不大瞭解。舉例說，舍公非常尊重老師，即使借貸

，學校對老師的薪水也絕不拖欠一天；每月發薪時，儘可能當日送到，絕不准延遲。他說：「老師辛苦的上課，我們就應準時送上薪水，這才是負責任，表示我們的尊敬。」我當時擔任出納組長，每逢發薪時，有些老師未來領薪，我就必須要到教師休息室將薪俸一一的送上；甚至下課後，教師未到休息室，我還要等在交通車上親自送呈，舍公絕不准延遲。那時，有些私立學校常發不出老師薪水，而舍公這種作風是很難能可貴的。學校畢業以後，我就到世新工作，由於舍公對財務管理十分嚴格，尤其是對總務、會計工作督促甚嚴，以致我工作中經常要加班，非常勞累！那時我才二十三、四歲，好幾次真想辭職換個輕鬆點的工作，但是家父堅決不同意，他說舍公是極有名望的新聞界前輩，而且訓練部屬非常嚴格，年輕人能有機會追隨他老人家學習，是一種磨練，也是運氣。的確，經過他的嚴格訓練，以後的三十年我從不覺得辛苦。記得，我在出納組兩年多期間，會計室接連換過五位主任，最後舍公堅持要我接任。初接會計主任業務，我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作「戰戰兢兢」。因為每筆帳目都必須仔細計算、核對，只要稍有疏失，絕對逃不過舍公的眼睛。那時，他老人家一隻眼睛因白內障開刀失敗已失明；另一隻眼睛不久也患了白內障，卻因為有前次失敗的經驗，而不願再冒險開刀。因此，他的視力極差，但學校的每一筆帳，從請購單、傳票、相關憑證、各項報表等，舍公都要在昏暗的燈光下，十分費神地，用放大鏡一一過目，詳細核對。以致舍公常常要加班到夜晚，視力雖差，他也一定要看完當天的公文和帳目等沈重工作才下班。往往步下樓梯，已十一點了，還絕不要人攙扶，想想看這位八、九十歲的老人，他那堅決的毅力和認真的程度，實在是無人能及！學校的帳目若被舍公發現些微錯誤，必定會受到嚴厲的責備：首先是在傳票或報表上指正；其次是在每天的工作日誌中批示；三是當面責備；四是在業務會報上公開指責。舍公之所以如此嚴厲，就是要我們處理財務，必須戒慎警惕，不可再犯類

似的錯誤。舍公巨細靡遺，事必躬親，所以教育會計處官員來校查帳時常誇讚：「世新是私立學校當中會計帳務最清楚、最正確的學校之一，除會計制度良好外，財務狀況更是所有私立學校中最健全者。」

該省則省、絕不浪費、遺失股票、扣薪歸還

有人一提到舍公就說他「吝嗇」，但我不是這種看法，他是該用則用，即使千萬元也不在乎；該省則省，即使一毫也不浪費，並且公私分明。舉例說，記得有家廠商向學校推銷一種新式的掃把，總務處完成採購，會計室根據發票出帳，傳票送呈舍公核閱時，他只批准出帳一把掃把，另外一把則由他自己付款；因為那一支掃把，總務處已送到他宿舍使用，因此他在傳票批示由他自己付款，不願隨便由學校支付。由於舍公的公私分明，當時，同仁向保管組領取新品，一定要繳回舊品；校車駕駛對車行里程也要登記清楚，包括他自己的座車就以身作則。所謂勤儉治校，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節約，世新才能由四間教室的職業學校，發展成為今日規模宏偉的世新大學。在那段物資艱困的年代，如果沒有舍公的節約資源，理財得當，那麼今天世新要想快速發展，將會倍增困難。

另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在民國六十一年，私立學校可以買賣股票作為理財工具，舍公也委託友人代學校購買南亞股票，以增加學校的資財，結果遺失了一千股（當年每股票面額五十元；多年後政府一律調整為十元）。這一千股的股票，當時市價值新台幣十五萬六千多元，那時，台北市一棟三十坪的公寓房子，大概就值這個價錢。董事會議上多位董事均提議由學校列呆帳處理，但是舍公堅持不肯，他說股票屬學校資產，由他經手購買的股票遺失，當然應由他自己負責賠償。結果舍公決定由他的薪水中按月扣還。這種公私分明的風格，一般人實在很難做得到。

學校利益最高依據、眼光獨到理財專家

那時，台灣社會資源還是很緊俏，但世新的財務已經愈來愈好。當時

臺北市銀行初成立，董事長金克和先生來找舍公，要求世新將學校部分存款轉存該行。舍公要我查對存款利，發現臺北市銀行存款利率較低，比不上存在信託公司及購買商業本票或公債的利息高。所以，舍公就不同意將錢存入該銀行，絕不會因為他和金董事長是舊識，就講人情，而損及學校的利息收入。舍公處理財務問題，一向公正，完全以學校利益為最高依據。記得大約七十年代，亞洲及國泰信託公司先後發生擠兌風波，社會一時傳言信託公司很可能會發生財務危機，我非常緊張，立即請示舍公是否將學校基金提領改存銀行，舍公篤定地說這次金融危機，政府絕對有能力處理，不必提前解約改存銀行。結果，果然一切均如舍公所料，有驚無險，學校毫無損失，且依然領取高利率。這件事，使我深刻體認到舍公不但眼光獨到，而且是位膽大心細理財專家。教育部的官員私下常常讚佩世新，公認舍公治校勤儉，刻苦自勵，真了不起；但是，卻不幫助世新，也不核准世新改制為學院。有好多位老師向舍公建議說，教育部認為世新很有錢，只要肯花錢，教育部就會准許世新改制學院。舍公不以為然，他說：「世新培養了那麼多校友、人才，教育部卻無動於衷，現在世新唯一的王牌就是這些基金，只要教育部背書核准改制學院，我立刻就將所有的基金拿作為建設世新學院之用。」結果，改制學院案一拖就是二十多年。現在想起來不由得不佩服舍公的智慧，公家單位朝令夕改，各自為政，舍公是一清二楚，所以絕不隨意浪費金錢，他早已打算好，這筆基金將是世新大學奠基的希望！

長遠規劃世新發展、預購校地二十公頃、節省基金數十億元

為了規劃世新的長遠發展，舍公不但以身作則勤治校，儲積了大筆的建校基金，並於民國五十七年間，在深坑為學校購了二十公頃的土地，作為世新未來發展為大學之用。

舍公當年購買這一大塊土地，只花費了新台幣四百餘萬元，實在是非

常便宜。其間，有些地主有反悔的，要求加價的，土地過戶不是很順利，但舍公仍然堅持買下這塊土地，後來就憑有這塊第二校區預定地，才得以順利改制成大學。

假如當年舍公沒有預購這塊土地，或者是中途放棄了，現在要購買二十公頃的土地，大約要花費新台幣二十億元，學校那還有餘力興建校舍及世新會館呢？

由此可見，舍公目光的宏遠，在他的腦海中，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未來，規劃世新長遠的發展，他的深謀遠慮，的確超越常人。

改制大學、夢想成真、世新巨輪、向前邁進

舍公生前曾說：「有一天，世新必定會成為一所知名的大學。」那時我聽了只覺得：「夢想的境界是不是太高了？」誰知道水到渠成，只短短的六年，世新在成校長嘉玲女士的領軍下，善用這筆建校基金，快速改善學校軟、硬體設施，提昇教學品質，同時有效地改建成美侖美奐的世新學院。接著又馬不停蹄地執行各項中長程發展計畫，使學校的社會聲譽急速提升，辦學績效也獲得教育部肯定。終於在八十六年八月一日進一步獲准改制成為世新大學！學校的成就更獲得了各界前所有的重視。時光荏苒，日月飛逝，今天，舍我先生已經是一百歲冥誕了，他老人家在天之靈，一定會欣慰地看著世新像巨輪般地向前邁進，他的理想終於實現了！而我卻淚眼模糊，彷彿又看到他老人家在暗夜的檯燈下，拿著放大鏡，沈穩地，安祥地批示著每一頁公文和傳票……。

活出他的形象

那個時候，世新畢業的學生給人的印象是不怕吃苦，腳踏實地，你把他放到窮鄉僻壤當地方記者，他照樣把新聞跑的有聲有色，而世新人富正義感，嫉惡如仇，好打抱不平，尤其是不畏權勢、官吏、警察的貪瀆不法，往往被毫不留情地揭發出來，有時候甚至為報社帶來困擾，但這正是成舍我教出來學生的共同特質。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魏瀚（中央日報研究委員） 發佈日期：2005-10-30

「他是世新畢業的，成舍我的學生。」這句話是褒是貶，很難說。褒，是對成舍我教出來的學生的一種肯定；貶，帶有三分忌憚兩分懼。

早些年，說的準確一點，應該是民國五十幾年，六十年代，為數不多的世新畢業校友還在新聞界闖天下的時候。當時，新聞界前輩或報社主管談到某一位記者時，常會冒出一句話，「他是世新畢業的，成舍我的學生。」這句話是褒是貶，很難說，有褒也有貶吧。褒，是對成舍我教出來的學生的一種肯定；貶，帶有三分忌憚兩分懼。

那個時候，世新畢業的學生給人的印象是不怕吃苦，腳踏實地，你把他放到窮鄉僻壤當地方記者，他照樣把新聞跑的有聲有色，而世新人富正義感，嫉惡如仇，好打抱不平，尤其是不畏權勢、官吏、警察的貪瀆不法，往往被毫不留情地揭發出來，有時候甚至為報社帶來困擾，但這正是成舍我教出來學生的共同特質。也正是這種特質，使世新畢業的學生，往往特立獨行，與眾不同，思想、言行也比較開放，不願受到約束，成為報社主管頭痛的人物。當時的時空環境，言論管制相當嚴格，新聞自由還屬於禁忌的話題，偏偏世新畢業的學生喜歡放言高論，批評時政，大談新聞自由，嘴裡尖銳，筆鋒如刀，於是，大家對「成舍我的學生」是又愛又怕。

其實世新畢業學生思想開放、言論激烈，並不是成舍我教的，只是流風所及，蔚然成勢。記得當時上成師的課，他的認真、嚴格當然不在話下，但是談到政治方面，他還是很謹慎的。成舍我的不畏權勢、超然獨立、剛正不阿，都是從書上看到以及從別的老師那裡聽來的。

談到世新當年的老師，就不得不佩服成師的眼光和魄力，他親自聘請的老師，都是學術界、政界的重鎮，像蔣勻田、胡秋原、程滄波、沈雲龍、阮毅成、費海璣等，以當時的大專師資來說，確為一時之選，這些老師深具學養，閱歷豐富，在課堂上引經據典，談笑風生，讓學生們聽得如醉如痴，尤其是在評析時局、月旦政治人物時，往往一針見血，老師講得淋漓痛快，學子們聽的酣暢過癮。心靈的啟發與思想的形塑，就在課堂中的議論滔滔中傳承。

世新的學生就這樣學習成長的，要說名師出高徒倒也未必，但影響力是絕對的。所以說，世新畢業的學生在思想、言論方面較為自由、開放，自有其形成的背景。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代代薪傳，已形成一種

校風，雖然成師和好多老師已離我們而去，但是直到今天，世新校園中仍瀰漫著自由、開放的風氣。

對後期的學弟學妹來說，做不成「成舍我的學生」，是一大遺憾，但早期受教於成師的校友，被人點名為「成舍我的學生」，是榮譽，也是負擔；有讚揚，也有期待，頂著成舍我的光環，你的新聞風骨和新聞品質，都受到高標準檢驗。

當時，在新聞界工作的世新校友大多互相認識，那個人表現傑出，那個人混水摸魚，大家看的一清二楚，每個人都是兢兢業業、力爭上游，生怕搞砸了世新這塊招牌，也生怕損及成師他老人家的形象。

以往在做學生的時代，老聽到成師在週會上強調新聞記者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當時往往言者諄而聽者藐，等到進入社會，尤其是跳進新聞圈這個大染缸，方能領悟要有多麼堅定的意志力，要經歷多少心靈上的掙扎，才可守住此一信條。也唯有設身處地，才會對成師早年在大陸辦報時所表現一代報人的風骨，產生由衷的敬意。

在成師眾多的門生中，我十分幸運地在踏出校門多年後，經由幫忙主編「小世界」週刊，而和他老人家有較多接觸和受教的機會，替成師做事，壓力很大，但也學到很多東西，更珍貴的是，長年的相處，對他老人家個性、脾氣和特點，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她的認真、執著、勤儉和永不懈怠，的確是我們年輕人，尤其是新聞工作者的楷模和典範。

當自己年歲增長，新聞工作這條路艱苦地走過來，一晃也已三十年時，面對母校的師長和成師的後人，我常常想到一件事，就是如何無忝成師所教，活出他的形象。對新聞界的世新校友和在校的學弟學妹，我也常以個人的體認和許多實例，希望他們以成師為榜樣，以世新人為榮，以做「成舍我的學生」自許。

值此成師百歲冥誕，緬懷昔日風範，無限追思，爰撰短文，以為紀念。

(本文資料整理及校對者：吳瓊月 2005/09/12)

九十二歲的記者
立報各級主管人員，
每人每天的工作，
都得寫在統一發給的「工作日誌」中，
老人家用紅筆批閱後發還，
「下情」可以天天「上達」，
開放式的辦公室，
哪怕是立報工友有事，
都可以直接見社長。

作者/譯者：安強（前臺灣立報副總編輯）

光陰荏苒，不知不覺距成老校長九四高齡，於全力以赴創辦「台灣立報」途中，積勞成疾，不幸病逝，悠忽六年了。惟他老人家辦報時的打拼神情，音容笑貌，那股認真、慈祥、信心滿滿的風範，卻常留在我腦際，不時浮現，總感到在他老人家跟前忙著報紙的事，恍若就是昨天一般。

我常想，能夠追隨他老人家報，真是三生有幸，是人生最寶貴難忘的經歷。我很願把目睹一代報人辦報的種種，記下一二，供大家分享。

記得民國七十七年初的一天，成老校長叫我回學校一談。原來問我願不願意參與創辦「台灣立報」的工作。我當然興奮不已，求之不得，立即表示願意。

豈知並不是我心裡想像的那麼容易，絕不是答應一聲「願意」就能如願。接著他老人家微笑，但很慎重的告訴我，雖然知道我已從事新聞廿餘載，還是要經過他老人家特備一格的考試才行。

於是，我便被指定每週來學校兩次，和他老人家同看「小世界」週刊（學生實習報）清樣。也就是多打份清樣，叫我拿到會議室去看。然後把我看過的清樣，和他老人家看過的比較一下，看看他老人家發現的標題錯誤或不夠恰當，文字內容有問題，文句不通順，錯、別字等等，我是否也能找出來。如此，經過兩個多月「考試」，終獲他老人家認可通

過，開始了參加忙碌的籌備工作。

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台灣立報」正式創刊出報了，這一天，是他老人家完成四十年來的心願，最感安慰，也最為辛勞的開始。

爲了立報，他老人家每天早上忙到深夜，立報開始降版，才放心的回家。白天，通常上午先看立報，找出所有的錯誤與問題，包括編排技巧、標題好壞、錯字和不妥的字等，以及新聞寫作的好壞，文字是否合乎邏輯或在法律上站不站得住腳等等，均以紅筆標出。此外，並作新聞比較。他老人家不管立報只有十名記者，一定要和聯合、中央及中國時報等擁有百名以上記者的報紙爭高下，他老人家每得意的說，過去他主持學校「小世界」學生實習報期間，不是經常有獨家的大消息刊登出來，而令大報採訪主任汗顏、緊張嗎？他老人家認為，立報十名記者，只要都能盡責努力，肯動腦筋，應該可與各大報一爭長短的。

所以，在他老人家嚴格的新聞比較下，那些是獨發，那些新聞漏掉了，那些新聞寫得好，那些是照抄中央社來稿等，下午或傍晚，總舉行一次編採會議，有時還兼談廣告、發行，除了要求編採部門知錯必改以外，並檢討廣告與發行，希望早日突破這方面困境。

他老人家每於深夜，看完社論清樣，便喝杯牛奶，加幾塊小圓芝麻餅當點心充飢。據說此餅是他老人家幼年時代，在湖南家鄉最愛吃的東西。

老人家最恨報紙上有錯字，或不通的句子，認為這是沒水準的報紙，會令人瞧不起，甚至有時會因此闖禍，白紙黑字，有理也說不清，故社論清樣總命我校完，或由其女公子成嘉玲（現世新大學校長）過目，而後他老人家再看一遍，才送編輯部，總編輯看畢最後一次，始可進行排版。

立報各級主管人員，也和世新學校一樣每人每天的工作，以及個人的意見、建議，都得寫在統一發給的十行本式的「工作日誌」中，老人家

不論再忙，必定於當晚或次日，挪出時間仔細看，用紅筆批閱後，立刻發還，藉以瞭解各部門工作情形，同時分別作出指，省去許多開會的時間，而「下情」天天可以「上達」。不僅如此，日誌中的錯字等，他老均加以改正，這種機會教育令人感激。

他老人家雖是「台灣立報」發行人兼社長，卻仍在報紙創刊後，曾多次親自出馬跑新聞。記得我有幾次因臨時有事，要向他老人家報告，發現在他老人家桌上留了張外出探訪，幾時前當可趕返的字條。我把老人家離報社去探訪的事，向編輯部同仁談起，大家均感十分驚異，對於當時九十二歲高齡老記者的敬業精神，無不大為嘆服，都認恐怕是當今世界上年齡最高的記者了。

他老人家每次採訪回來，並不休息便開始撰稿、定稿後，交採訪組轉編輯部，一切照記者發稿流程，只不過晚上一定「加班」，親自等校清樣後才放心。報社同仁們，見老人家對新聞工作沉醉的情形，和那狂熱的程度，敬佩之餘，皆萬分感動。

在「台灣立報」發刊辭中，他老人家除了指出何以要創辦此報的原因外，曾特別指出，雖不敢確保張報紙必將辦得光輝燦爛，十分精彩，但一定可以確保這張報紙絕對能發揮正義，抵抗暴力，為民衆說話，不僅不會依附任何黨派，並將永遠不致如英、美等國家報紙，儘管不是黨派的政治工具，卻是資本家的發財工具。老人家強調，世新學校是財團法人，世新的「台灣立報」，當然也就是財團法人，英美報紙往社為投資者，或大幅廣告客戶所操縱，相信「台灣立報」將永遠不會發生此類似的弊病。

同時，他老人家表明立報的基本立場，將百分之百為搶救國家生存，維護大多數人民福祉，任何政黨或個人，其言行合於此主旨者，本報無不擁護，凡違反此主旨者，無不加以譴責。

如今「台灣立報」發行已十年了，凡常看立報的人，都會感覺到成老校長當初辦報的宗旨，迄今沒有改變，而學校有了立報，也使三萬多校友及在校同學，有一確實無黨無派，不偏不倚的報紙，令課堂中的新聞學理論，得以在立報上實踐。

日前，在國內傳播界，立報正是訓練新聞專才的搖籃，它可供應各種媒體需要的優秀人員。

回憶他老人家在立報創刊時，曾說，他已九十一歲，正該迅速退休，頤養天年，竟仍創辦新報，這在中國新聞史上，甚至世界新聞史中，似乎也沒有任何國家這樣高齡的老人，敢如此大膽吧。當時老人家的豪情、勇氣與那信心十足的壯志，使在他老人家身邊的同仁，無不受到強烈的振撼與鼓舞。

在立報試報和創刊發行之初，他老人家經常和我們一樣，通宵不眠。往往堅持到工廠親見當日第一份報紙印出後，翻閱各版，認大致不錯，拿著這「剛出爐」的報紙，安心的回家去。通常他老人家不吃晚飯，深更半夜回到花園新城住所，見師母已熟睡，不願驚醒她老，就自己到廚房熱點東西吃。有一次因為天氣太熱，食後合衣就寢，夜晚沒蓋被子，受了涼，感冒住院，我們抽空去看望，卻見他老人家正在病床上細批報，用紅筆劃出所有錯處，正準備派人送回報社編輯部檢討改進。

平時，老校長的稿紙，就是隨手撕下的日曆紙，翻過來便可寫社論。學校用過作廢的公文紙，背面就當稿紙。他老人家那精關警世的宏論，和傲視各報的獨家新聞，誰又知道竟是用廢紙背面寫出的呢。

在此，我想起七十七年雙十國慶日前幾天，立報曾生一件值得一記的事情。即那日臺北街頭有成千證券投資人遊行請願爭取權益。立報新任職的女記者（戴曉湄），突然於中午打電話回報社，我訴她不管別報記者離開現場，或去吃午飯，我們可與請願團體一塊兒吃便當，一定盯到底，以

防萬一生事，便可採到一手新聞。

果然不錯，這群人先在立法院前呼喊求助，得不到結果，乃轉到中央黨部，但是仍不得要領，且沒人理會。於是中午時分，大夥一氣之下，突的「移師」南昌街，把李總統官邸團團圍住，幸附近駐衛的憲兵大批趕到，用盾牌等武器阻擋，對峙一陣才告解圍，而未發生不幸。

不料立報本黃副社長（按：黃仰山先生），當晚突接到有關方面主管官員的電話，要求不要刊登該新聞，並強調全國各媒體均已答應不發該新聞，故立報也不可例外。而其理由是，雙十國慶前夕，外賓和華僑到台灣的很多，這新聞發出來不好看。

黃副社長掛斷該電話，叫我去商量，我直覺的表示不能接受，並馬上要求向老人家報告，他老人家立即的反應是，這官員見解太低俗，缺乏智慧，眼光短淺。他老接著說，這新聞正好讓外國人和華僑們看看，中華民國總統官邸前，照樣與美國白宮相同，准許民衆遊行示威。美國表現的自由民主，在台灣也是一樣。所以這新聞發生的時機很巧，可謂求之不得，怎麼能不發呢？次日，「台灣立報」的這則新聞，以極顯著的一版頭條地位刊登，並配以放大的彩色照片，成了極突出的獨家新聞。

這事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體會到他老人家在學校諄諄教導我們，做為一個新聞記者，要敦品勵學，要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真義。覺得做個真正合乎他老人家心目中「報人」，確非易事，必須學識淵博、品格端正，始能見解高超，明辨是非；也就是真知灼見，方有能力把新聞作適當的處理，對國家、人民有所貢獻。

跟他老人家做事，朝夕相處。我發現他老人家雖然對工作要求很嚴格，且擅控制錢財，不論多寡，用錢均得花在刀口上，不會有分毫浪費。但是他老人家日常待人和藹可親，單以開會來說，他身為主持人，從無唯唯我獨尊、一言堂架式。而是像大家長般，讓大家好的壞的說個夠。他老

人家總能沉住氣，微笑而認真的邊聽邊記下各類意見，以便分別研討和答覆。

觀察他老人家待人與做事，不僅雍容大度，善於面對和解決各種疑難雜症，從不對人疾言厲色。

他老人家這種特具的報人氣度，在他老人家周圍做事，會深深感受到並被其綻發出來的那種「自由民主」的氣息與魅力所潛移默化，老人家辦公室是開放式的，那怕是立報工友有事，都可直接見社長。我們隨時有問題，立刻便可去見他老人家。即使他老人家正在寫社論，也會招呼先坐在他對面稍等。當他撰完，和我談畢事情，他老人家還會問我，如不忙，幫他看一遍剛寫好的社論，有沒有不妥之處。這種虛懷若谷的精神，想必只有一代報人成舍我恩師做到了。

如今，他老人家離開我們已久，惟他那辦立報期間的一言一行，將永遠值得銘記、懷念、效法和學習的事實在太多了。他老人家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想到他老人家，人生就會不斷的努力奮鬥前進。

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堡壘—記成舍我先生與世新

有人利用政權的組織來壓迫一個人，
個人顯然是孤立的、單薄的、
無可奈何的。
但在這個時候，舍老竟毫不考慮我會增加學校的麻煩，
大家為我加課。

作者/譯者：王曉波（台大哲學系教授）

成舍我先生是近代中國新聞史上的巨人，許多軼事的傳聞早有所知，但我從台中到台北唸台大，向來也沒覺得自己和世新會有什麼關係。我第一次見到舍老，是和鄧維楨辦《大學雜誌》，那應該是一九六八年的事，到世新見舍老，希望世新能訂一份《大學雜誌》。在舍老的辦公室看他，記得是一個大辦公室。我們見到這位名報人，說了幾句景仰的話，也表明來意，送上幾本雜誌。舍老也鼓勵我們年輕人追求理想發揚言論自由的精神，但回來後，一直未見世新的訂閱單。一九七二年，當時我剛任台大哲學系講師，陳鼓應在世新兼課找我去代課，我記得那是一班夜間部的課，學生年齡好些人都比我要大。從來都沒覺得會和世新生什麼關係，竟成了世新的教師。不過，因為我課排在星期日上午，學校不上班的時候，所以，我教我的書，舍老自當他的校長，我一向不擅逢迎和巴結，跟舍老也扯不上什麼關係，但亦景仰他當年敢言辦報，不畏強暴精神。當時也沒想到，為了代陳鼓應的課，竟和世新結上了終身之緣。一九七三年，我和陳鼓應遭警總約談；七四年，我在陳鼓應之後也遭台大解聘，是為「台大哲學系事件」。遭解聘後，生活亦發生問題，世新二小時兼課的鐘點費是不能維持生活的。剛從研究所畢業，在台大當講師，除了教書和寫文章外，別無所長。兩次申請出國研究，又都被駁回。當時，沈君山教授介紹我到《科學月刊》當編輯，我也和科月社長張昭鼎教授談過了，都沒問題，回家等消息。結果等來沈教授的來信，說是，我一離開科月，有關單位人員就找

到科月，警告不可聘用王曉波。老同學高信疆在《中國時報》擔任人間副刊的主編，相告，新聞黨部有通令，不得採用陳鼓應、王曉波等人的文章。後來，他轉出編海外版，邀我寫了篇當年台灣同胞追悼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文章。當時逢耀東教授在主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邀我寫篇孔子思想的學術論文，月初，雜誌還沒出版，廣告先刊出去了。有關人員又找到逢教授，非要抽掉我的文章不可，逢教授甚至讓步到同意把我的文章給他們刪改，但都不行。逢教授只好告訴他們，邀王曉波寫稿，有點稿費，「讓王曉波混兩文香煙錢」。他們竟要逢教授轉告：「王曉波要吃飯，要他跪著求我們」。當時，我在救國團的《幼獅月刊》上寫些學術文章，並且，我的碩士論文也由幼獅書店出版，主編是朱一冰先生。有關人員也去找到朱先生，說不能用我的文章，並且，說我的論文「批孔」，與當時「四人幫」的「批林批孔」唱和。因為是幼獅書店，不好明令查禁我的書，故由警總派人到幼獅書店監督把存書燒燬。朱先生一直為我辯解，他們竟跟朱先生說，「非我族類，斬草除根」。在世新兼課，調查局也來調查，說我出考題「批孔」，「與匪唱和」。教務主任成秀峰女士找我問，我跟她把近年存檔的考卷都翻出來，成主任指著一題說，大概就是這一題！「試批評孔德的知識三階段論」。我只好跟成任說，那是法國哲學家奧古斯汀·孔德，不是孔子啊！成任說，以後凡是姓「孔」的都不要出題批評就是了。後來又說了一句：「王老師，我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但是，如果你不在世新兼課，我們就沒有那麼多麻煩。」還有一次，當時任職國民黨中央黨部組工會主任的李煥先生找我，他在桌上拿了張紙條給我看，上面寫著姓名、時間、地點、事由，說我，在世新上課時講：「我們要為那些為馬克思主義犧牲的人致最高的敬意。」李先生說，「我當然知道你不會這麼說，但是，這張紙竟到我桌子上，你上課要格外謹慎。」所以，有好一陣子，我只好自備錄音機上課，並告訴學生：「我講的每一句話，我負責；同學

筆記抄錯了，同學得要自己負責。」有人利用政權的組織來壓迫一個人，個人顯然是孤立、單薄的、無可奈何的。但在這個時候，陳鼓應把我的狀況告訴了雷震先生，雷先生又跟舍老說，能不能把我兼課的鐘點數增加，舍老竟毫不考慮我會增加學校的麻煩，大量為我加課，加到每週十六小時。為了報答知遇之恩，我在世新上課從不敢掉以輕心。哲學的課程在世新是選修課程，每班選修的學生都達百人以上。有關單位怕我在台大會「毒害」青年思想，台大的選修課二、三十人就是大班了，世新每班都多達百人，「毒害」的青年更多，這大概是有關單位始料未及的罷。每週十六小時的課，一直維持到李煥先生為我安排到「大陸問題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為止，後來，我才依規定在世新日間部兼四小時，夜間部另四小時。我的教學工作轉到世新之後，所知漸漸增多。近代中國號召人民「勤儉建國」，舍老卻「勤儉建校」的身體力行者。世新是一所沒有財團背景，沒有宗教背景，也沒有政治背景（如果有，那也是負面）的一所學校。舍老終身從事新聞事業，我對新聞報業完全外行。據說，舍老來到台灣，除了立法委員的職務外，孑然一身，他在大陸時期辦過多種報紙，差點惹來殺身之禍，他唯一的「財產」就是擁有大陸時期發行報紙的執照罷。報紙的發行執照在那時很值錢的，大概不亞於今天台灣的高爾夫球證，但是在戒嚴時期的報禁下，也是廢紙一張。舍老的辦公室非常樸素簡單，連冷氣機都沒有，每天三樓爬上爬下，也沒有電梯。在世新頭十年，我每天看他的西裝總是那一套，還有冬天的圍巾，也是十年如一日，直到他八十歲生日，到美國去了回來，才看到他換了新西裝，後來，和舍老么女成露茜教授談起，成教授說，那西裝是她幫舍老做的。在舍老管事的時候，世新職員原子筆，必須要用完了之後，才可以舊筆換新筆。辦公室電話，都是投幣式的，要打長途電話，必須申請批准，才得使用。葉明勳董事長當過世新的副校長，後來說出來一個故事，教育部派人來視察學校，總務處簽報「茶

點招待」，竟被舍老將「茶點」的「點」字劃掉，改成「水」字。學校的教室，白天不准開燈。學生上課的時候，舍老經常巡視校園，有燈沒關的教室，一一關好，有水龍頭滴水，一一關緊。舍老的「節省」，可說是有口皆碑。我自己就碰到過幾件事情，有學生反映，圖書館的日光燈是管燈，但是只裝了單管，看書光線不夠；又冬天宿舍熱水洗澡，每天只開放一小時。當時年輕不懂事，我就跑去跟舍老說，我還以為舍老身校長不會知道這些小事。舍老聽完我講，他立刻表示知道這些事情，且說：「我們在抗戰的時候，學生讀書都是點清油燈，一根燈管足夠了。冬天不必天天洗澡，我冬天也很少洗澡，不可太浪費。」記得有一次，舍老召集大家開會，我也去了。他拿出一份學生週記來，那該是三專一年級的學生，上面寫著：「大學聯考沒考取已經是很倒霉了，專科聯考又沒考取公立學校，只考取私立的，真是倒霉中的倒霉，害得我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舍老要們提意見改善這種情形。在台灣私立學校的資源、設備比公立學校差太多了，學費又比公立學校貴許多。所以，學生爭相投考國立學校，私立學校招生就顯然難以競爭。前幾年的調查，台灣私立院校的學生數量大約是國立院校的三倍，教育部補助公立學校經費也大致是私立院校的三倍，只有私立院校的學費是國立學校的三倍。所以，優秀的學生都往國立院校去了。考到世新來的學生顯然充滿挫折感。當時，我又犯了不懂事的毛病，起立發言，大致的內容是：世新實務的課程應該在實務崗位上的老師來教，用兼任的。但是，基礎學科的課程，可以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所畢業生來擔任，要專任的，要求他們做研究，在一定的時限中要升等。世新自己培養師資，老師的流動率會因專任而降低，敬業精神也可以提高。我發言完了之後，舍老沒有任何回應，會後，有位資深的同仁跟我說，「你的建議又是要花錢的。」我才恍然大悟。有一年，蘇澳沈船，淹死了好些大專院校的學生，教育部長蔣彥士因此下臺。那時每年蔣介石誕辰，救國

團總是要動員學生去遊行以示慶祝。世新總教官向舍老報告，要派校車送學生去遊行，舍老一向對這種個人崇拜不感興趣，就向總教官打官腔：「教育部三申五令要注意學生校外活動的安全，學生出去遊行，安全誰負責？」總教官也頗理解舍老，趕快報告：「校車的汽油由救國團出。」舍老才改口，「那麼司機的誤餐費也由救國團出罷。」於是傳出舍老反對慶祝總統華誕，那時，這是一頂好大的帽子。其實舍老是反對用世新的汽油啊！舍老雖然自奉如斯，「節省」如斯。但舍老卻是公私分明，涓滴歸公。據說，舍老的夫人搭舍老的便車到南門市場買菜，從住處花園新城只能搭到景美，再搭公車到南門市場。校長夫人搭便車可以，但不能開專車。世新一成立就是財團法人，不像多私校，校庫通家庫，公私不分。後來，舍老不再當校長，而擔任董事長。那年，董事長的稽查發現有筆數目不大的錢，進入了世新的帳簿來，來歷不明。追查起來，原是那年台灣銀根奇緊，春節過後不久，舍老下條子要世新存在一家信託公司的錢取回，信託公司非常緊張，就派人帶著地毯公司的人，到花園新城，為舍老公館鋪地毯。等他們走了，舍老打電話給地毯公司，要求地毯不要鋪，要七折折現。舍老年事漸高，有一天，我看到行政大樓在裝電梯，不禁傷感的跟世新的同仁說，舍老終於衰老了，不是走不動三樓，行政大樓是決不會裝電梯的。令我最感動的一次，是舍老八十歲生日演講，他跟全校師生說，世新財務健全，校產累積，都是世新校友們的財產，他有生之年，一定會為校友們看管好這些校產。世新校友沒有一個人會懷疑舍老的話。舍老還說，他老了，生還有三心願，一是世新要由專科升格大學，一是要在台灣創辦一份報紙，一是完成他自己的回憶錄。舍老要辦報紙的消息傳出，在報禁時代，一張報紙的執照喊價到好幾千萬，要舍老花世新幾千萬買張執照辦報，這完全是不能想像的。於是，舍老又做出豪語，「報禁一日不解除，成舍我一日不辦報！」報禁終於解除了，世新的《台灣立報》終於創刊了，舍老

以九一高齡成為世界最高齡的報紙創辦人！報紙創刊了，舍老找我，跟我說：「人家說我太老了，不能再自己編報紙了，要找個年輕人當總編輯。」後來才知道，那個年輕的總編輯，只有七十歲而已！一九九一年，教育部終於批准世新改制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八月一日，「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正式成立，但舍老竟於是年四月一日逝世，未能目睹世新正式改制，令人遺憾。更令人遺憾是舍老的回憶錄，終於未能完成，一代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巨人就與世長逝了。我到了世新之後，更知道世新的老師，像我這樣遭遇的還不只一人。在我到世新之前，一些政治上有問題的知識份子學者也都在世新教過書，像蔣勻田、沈雲龍、胡秋原。我到世新之後，還發現有曾任教政大的留日學生吳盛木比我還嚴重，還是坐過政治牢的。另外，坐過政治牢的還有《自由中國》的博正、馬之驢、胡學古，還有張化民、黃珏、曾祥鐸。另外，還有陳少廷，張俊宏、黃煌雄、李日章。在我之後，還有李茂政、李筱峰。依據世新的傳統，一九九年世新改制後，我擔任共同科主任，也延聘了王津平、張星戈、陳振盛。在那個時候，雖然每年暑假都傳說上面又有解聘的「黑名單」下來。但是，我們都很安心，在舍老保護傘下，我們這些被政治迫害的知識份子仍能安心的教學研究。世新竟成為在戒嚴時期，台灣唯一的「自由學府」。雖然、舍老以他的鐵肩硬骨為我們擔當政治的壓力，但是，舍老對世新教師的要求並不是「揀到籃子的都是菜」。有次在舍老的辦公室，外面電話打來，似乎是一位沒再被續聘的老師質問舍老，舍老就直接了當的說：「你教書不認真，學生應很壞，我們不能再聘你！」由於在世新教學，和自己的研究，我一個由台大解聘的講師，在世新由講師升副教授，由副教授升教授。升教授之後，台灣的政治氣氛也比較寬鬆了，於是，我向舍老要求由兼任改為專任，而辭去「大陸問題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專職。如果不是舍老的庇護和栽培，我是不可能由一個被解聘的小講師升為教授的。後來，由於「台大哲學系

事件」平反，我才能回台大擔任哲學系教授。世新之所以在戒嚴時期成台灣唯一的「自由學府」，成為我們這些受迫害的知識份子「自由的堡壘」，這又和舍老「勤儉建校」的「節省」密切相關。在那個時代，各私校的財務多不健全，公私不分，甚至有的學校還拖欠教員的薪水。舍老創世新，白手起家，公私分明，涓滴歸公，自奉甚儉。其他私校因財務不健全多向銀行貸款，而當時的銀行全是官辦，向政府的銀行貸款，就不免受制政府。唯世新在舍老的經營下，不但不向銀行貸款，而且借錢給銀行。不向政府的銀行貸款，當然也就不必受制於政府。甚至，舍老也不接受教育部的補助，以免受制於教育部。原來世新的「自由學府」，也不是沒有「經濟基礎」的。此外，世新之成為台灣戒時期的「自由學府」，也和舍老早年的信念有關。舍我出身於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崇尚自由，並且為安那其主義者。後來，舍老投身新聞報業，崇尚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甚至險些為新聞自由犧牲。到了台灣來之後，舍老雖然失去了報紙，但在立法院仍不遺餘力的維護新聞出版的自由，一九五五年三月四日，他就在立法院提出詢反對出版法修正案。十一月二十九日，又提出反對內政部的「出版法施行細則」。一九五六年，舍老即創辦「世界新聞職業學校」，是為「世新」之始。在嚴酷的戒嚴體制下，老報人成舍我雖然失去了報紙，失去了戰場，但卻創辦了世新，四十多年來，為台灣新聞報業，培養了四萬餘名新聞從業人員，並堅持理念，使世新成為一個獨立的自由學府，也使世新在戒嚴時期成為了我們這些受政治迫害的知識份子「自由的堡壘」老實說，由於舍老的「節省」，在舍老在世之時，世新的師生雖然對舍老敬重有加，但心中總是不能沒有抱怨。然在世新四十周年，校友雲集回校之際，看到改制後的世新美侖美奐，尤其是在慶祝晚會上，大家才感到沒有舍老當年的「節省」，就沒有今天世新的建設，大家竟都以感恩的心懷念這位「老校長」。舍老為了中國新聞報發達，創辦世新，為了世新，舍老自奉甚儉，

沒有任何享受，只有奉獻。舍老是近代中國新聞史上巨人，是歷史的終於要回歸歷史，舍老百年，一個從北大出身的中國兒子，終於回到了中國歷史的長河！

深深懷念成舍我老校長
在我出獄於世新任教幾年之後，
有一位長輩私下對我說：
「有人說你又被列入黑名單了，
聽說是排名第四！
不過，
也許你根本用不著擔心，
因為據看過黑名單的人說，
排名第一的是成舍我校長。」

作者/譯者：曾祥鐸（中興大學歷史系專任副教授）

世新如今是大學，每次來上課，看到校景煥然一新，開始堂皇起來，心裡自然感到高興。不過，三十多年前山谷內的樸實景象，也常會浮上心頭。過去的青草池塘，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綠柳垂楊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現代化高聳入雲的大樓，一間間電化教室，舖滿磚石的校園大道，點綴著新型的路燈，使世新的面貌完全改變了。過去上課每每要爬上幾層樓梯，如今卻有電梯直達。過去教室內只有舊式風扇，如今卻有標準冷氣。我看了三十多年，看到了世新這一巨大變化。如今考入世新的新生，一進校園便接觸到這一切現代化設備，可能以為世新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他們當然無法想像世新創辦人當年的老董事長成舍我老師是如何艱苦地在經營這所學校的。三十多年了，看到世新成長與變化，總是會深深懷念起老校長成舍我老師來，我想，沒有他老人家當年省吃儉用的慘淡經營，世新不可能有今天這個樣子。老校長不是達官貴人，不是資本家，他那有錢在台灣這個異鄉辦大學？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守，一群失去故土的外省人奔向台灣，老校長是其中之一。到了台灣，能謀個生活已經不錯了，怎願還敢做夢去辦大學？然而，如今世新大學出現在大家面前了，這不是夢想，而是一個現實，一個如包的現實。只憑這一點，你能不佩服當年的老校長成老先生嗎？

開路給後人走的人，都是偉大的

世界上什麼人最偉大？我最欣賞這樣一個定義與答案：「能開路給後人走的人，都是偉大的；路開得愈大的愈偉大！」依這定義，歐洲歷史上誰最偉大？歐洲歷史家說，不是亞力山大、凱撒或拿破崙，而是英國大科學家牛頓；因為牛頓在科學上開了一條大路，使整個世界都起了巨大變化，使人們的生活過得更舒適。這一點，是亞力山大，凱撒與拿破崙都做不到的。依這定義，在中國歷史上誰最偉大？應該是孔夫子，因為，他為中國人的生活立下了一些不朽的典範，使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有所遵循，使中庸之道，成為中國人的基本性格。

依上述定義，老校長有沒有開路給後人走？一個世新大學，這條路開得夠大了。每當我在世新校園與教室，看到一群群學生來來往往熱鬧情形，看到畢業典禮上那一片黑壓壓的方帽子，我想，老校長開給後人的走的路可真不小。假如在三四十年前老校長如果沒有動過在台灣創辦一所新聞學校的念頭，那麼，今天這一切可能不會出現。辦一所大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人一生能辦一所大學，就已經是成就了一大件大事，對社會作出巨大貢獻了，更何況這是「白手成家」的？大陸變色，多少外省人避難來台，有誰能像老校長這樣的只憑一己之力就創辦出一個大學來？

世新一年使我受益無窮

遠在民國五十一年，我考進了世新編採科。一年之後，我重考考進了台灣大學歷史系。我在世新雖然只唸了一年，但卻受益無窮，且舉一例來說，我唸世新的那一年，學校的設備雖然不夠理想，不過，師資是一流的。我念的編採科，授世界通史是胡秋原老師，授新聞學是王洪鈞老師，授中國近代史的沈雲龍老師，授中國新聞史的，是成舍我老校長本人，授法學概論的是涂懷瑩老師，此外還有陶百川、阮毅成與程滄波諸教授，都是學術界名人，這樣堅強的陣容，當然能使學生奮發向上，因此，當時與我上

下班的世新老同學，今日多已卓然有成，為新聞界的中堅人物，如王效蘭是民生報的董事長，王景弘是聯合報國際新聞的台柱，魏瀚是中央日報總編輯，康健是立報副總輯，李在敬博士在中央日報主持國際新聞編務，成大喬是商界聞人，張世良曾任立法委員，顧安生與唐經瀾是電視新聞的名人，黃營杉教授是中興大學的系主任，盧淦金教授與安強教授在學術界與新聞界都能威震一方。其餘在社會各界卓然有成者大有人在，無法一一細述。只是與我上下班的老同學，總數也不會很多，便能培養上述這些社會上的中堅份子出來，我們以世新為榮，而老校長與世新大概也會以我們為慰了。以我那時編採科的上下班例，世新「人才培育成功率」應該是驚人的。信筆寫來，上述名單一定還有一些漏列的老同學，先在這裡告罪。

老校長對出獄後的我雪中送炭

在我當年的世新老師裡面，胡秋原老師與王洪鈞老師我自五十一年起追隨至今，已經三十六年了，這種師生情誼，多麼值得珍惜啊。胡秋原老師今年已九十高齡，身體依然健康，思路十分清晰。最近歡渡九十壽辰，我們舉辦了一個祝壽演講會，我與政大尉天驄教授、台大王曉波教授、中興毛鑄倫教授、政大周玉山教授、大作家陳映真先生與林書揚先生等擔任主講。我特別提到當年在世新受教於胡老師的情形，我說，在世新雖然只唸了一年，此後在台大唸了七年（四年大學部，三年研究所），不過，世新那一年對我的思想形成與發展，影響最大，因為當時世新的老師，如胡秋原、王洪鈞、沈雲龍、阮毅成、陶百川、程滄波諸教授，都是擅長理論的學界前輩，而且很有傳統士大夫那種「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風範，對學生所起的潛移默化的身教作用特別大。

在我求學過程中，我對世新懷有特別的感情，這有下述兩個理由：

（一）我遭逢戰亂，未能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大陸變色後，由於父親是黨官，遂自大陸避難香港，幾年後再回台灣歸隊。我只唸完小學，便無

力升學，在香港過是難民生活。回到台灣後，不久即屆兵役年齡，當兵去了。不過，在我失學期間，我一邊做工，一邊全力自修初中與高中的英、數、理、化課程。服兵役期間，蒙連長林福清少校照顧，勉勵參加軍中隨營補習，考取了一張「高中同等學力」證書。退伍後參加大專聯考，以第一志願考取世新編採科，經長期失學後，第一次重返學校，就是進入世新，自然比別人會加倍珍惜了！

(二) 我於民國五十九年自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後，至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書。在那段所謂「白色恐怖」的日子裡，在我教書三年後，即被冠以「為匪宣傳」之罪名，慘遭牢獄之災。根本的原因，大概是因為我在台大史研所時，研究的是馬克思。失去自由一年多之後，幸獲出獄。世新老師胡秋原之全力營救，是我能重獲自由的主要原因，我於民國六十三年秋出獄後，由於頂著「紅帽子」，在社會上是被排斥的。但是，世新老師沈雲龍教授立即向老校長成舍我老師進言，認為曾祥鐸是世新培養出來的人，慘遭政治上的無情打擊，不宜聽任沉淪……。老校長不顧外界壓力，立即發我聘書，讓我返校任教，使一位幾乎被「白色恐怖」所擊倒的人，重新獲得一個立足點。老校長成舍我，胡秋原老師與沈雲龍老師，這三位世新長者，使一位幾乎沉淪於亂世的我重見天日，這使我終身感激！

老校長長期照顧政治受難者

老校長不僅照顧我一個人。當時因受政治迫害而失去教職的一些年輕一代的學人，不少都受到老校長的照顧。當時「台大哲學系事件」使陳鼓應與王曉波等教授解職。陳鼓應教授驟失生活憑依，而陳鼓應夫人被邀至世新擔任秘書工作，減輕了鼓應兄所受生活壓力，而王曉波教授也被延聘至世新教書。此外，政大的吳盛木教授也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長期掙扎於臺北監獄與綠島之間，出獄後也受聘至世新任教。這類事件不少，未及一一細述。老校長長期照顧這批落難的知識份子，那精神是偉大

的。

近年，立法院通過了對政治受難者平反的條例，使吳盛木教授得以重返政大，我與吳盛木教授都受過牢獄之災，深深體會到人生無常，以及世間真情之可貴，因此，對老校長之感激相信比別人深刻。我與王曉波教授在台大是同屆同學，他唸哲學系，我唸歷史系，自大學至研究所，同窗七年，最後同樣遭到政治風波，同樣受老校長照顧，返世新任教。去年，王曉波教授因平反而重返台大哲學系專任，我也因平反而重返中興大學歷史系專任。不過，我們依然在世新兼任，原因就是忘不了老校長當年雪中送炭的照顧之恩，覺得自己只要能為世新盡一點力，不僅是盡了自己的一份責任，也可以多報答一點老校長當年的恩情！

總期無負老校長照拂之恩情

老校長這樣長期照顧我們這一批政治受難者，對老校長來說，就是由於他懷有杜甫所說的「國人吾欲殺，我意獨憐才」的那種高貴情懷。不過，他這樣做，是要承受不少壓力的。老校長為當道所不喜，這是原因之一，當時的當權派顯然不喜歡他照顧這批政治受難者。記得有一次，（在我出獄在世新任教幾年之後），有一位長輩不知是對我表示關切（可能性比較大），或是想對我開玩笑（可能性比較小），私下對我說：「你也許要注意一下，有人說你又被列入世新黑名單裡了，聽說是排名第四！」為之愕然。不過，他馬上以寬慰的口吻說：「也許你根本用不著耽心，因為據看過黑名單的人說，排名第一的是成舍我校長，排名第二的是沈雲龍教授。如果再出事，有老校長與沈教授同行，閣下與有榮焉，有什麼好怕的！」我聽後不覺為之怡然！

從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當時老校長承受了多大壓力。但是老校長從不退縮！當代文豪魯迅，曾經以兩句詩句自況，每次讀來，都不覺肅然起敬，這兩句名句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在老校長

身上看到了這種身影，因此，每次至世新校園上課，總是不敢怠慢，希望能多給世新學生一點學識與精神鼓舞，以期老校長開創世新培育人才的宏願，更期無負老校長對我個人於遇難時伸手援助的深恩！

他，是我內心溫暖的秘密。
在我最感到無助的時候，
多次去過成舍我老先生的家門口，
朋友遠遠地指著他的身影告訴我：
那個人就是
連半個饅頭都捨不得丟掉，
一心一意要辦報、要辦學校的成舍我老先生。

作者/譯者：王津平（世新大學兼任講師）

我在世新兼課一轉眼已第六個年頭了。很多同事都以爲是王曉波的面子夠大，我才會不辭勞苦，從北投山上那麼遠的路到世新，上那幾個鐘頭的課，我對成露茜社長辦立報的理想與熱情也的確有一份由衷的尊敬，總覺得該爲這樣的一份報紙做點事。但是，真正驅使我累出病了還捨不得放下世新的課，實在忙得不可能多做一件事還想爲立報盡一份心力的真正原因，是因為我內心有一個溫暖的秘密，一個將近二十年還沒有說出來的秘密。

這個溫暖的秘密得從一九七九年說起，不，應該從一九七五年說起。

那一年，我熱呼呼地從美國奔回母校淡江教書。四年之間，淡江成爲當時全台灣最開放、最進步校園。有心辦好教育的張建邦校長給了我很大的發揮空間，我自己也全心投入，完全以校家，一心栽培青年學生，教育果真成了我最鍾情的事業。

我那裡知道，那躲在背後一直在「偵察」我、誹謗我、抹黑我，被我打從心底瞧不起的「情治單位」，已經完全受不了我，這個「在校園製造麻煩的人」，必欲除我而後快。山雨欲來風滿樓，其實，要整我，把我趕出校園的風暴，早在我返校執教不到半年之後就醞釀形成了。有好心的朋友冒著「不忠黨」的大不韙，偷偷相告：「他們」最受不了我的是因為他們派了上百位學生來調查我，卻發現那些學生雖拿了錢，卻十之八九都不肯寫下不利於我的報告，可見我這個人多麼「陰險」、「可怕」，「一定

是共匪派來的」。不利於我的風聲越來越緊，聽說「他們」藉故要整我，已決定不讓我教書了，甚至可能要逮捕我了。學生和同事們群情激憤，串連著要為我罷課抗議；連當時在海外的李遠哲都公開在柏克萊的學人座談會上質問淡江校長張建邦先生：「海內外皆知王津愛護青年學生，是個好老師，連這樣的人都不見容於大學校園了，我們怎麼敢回去？」張建邦先生回台以後，爲了我的事去找調查局長吵了一架，卻也頂不住「情治單位」排山倒海的惡勢力，私下找我密談不利我的處境，我還記得他好心為我安排出路，叫我先出國進修，避避風頭，學校和錢都為我準備好了，我心領了他的好意，卻以沉默拒絕了他的安排及任何金錢上的幫助。隔天，我就毅然、也黯然地搬離了淡江宿舍。

我自己很清楚，我再也不能教書了。

在那之前，其實那些在背後整我的人也有人扮白臉來企圖拉攏我、甚至「收買」我。我絲毫不假以詞色的態度一定更激怒了他們，我已做好了坐牢的心理準備。我強顏歡笑，主要是怕母親和妻子精神上遭到過重的打擊，但是，工作呢？二十年後，我第一次說出來，我當時竟是身分文，毫無積蓄，做為校長特別照顧的「歸國學人」，我曾擁有等於一般同事三倍的薪水，但我的錢不是用來支持「夏潮雜誌」，就是給窮學生註冊，或買書給沒錢買書的學生，突然之間沒工作了，租了一個月租金一千二百元的破房子之後，連剛出生的女兒的奶媽錢都付不起了，只好把女兒抱回來自己養……；總之，一切都得從頭開始。

幾年以後，當報上有人訪問我，談起那一段「被迫害」的心路歷程的時候，我曾很自豪地說，那是一種「脫胎換骨的寶貴經驗」，因為，我終於能夠擺脫「歸國學人」、「英雄主義」、「知識分子」的身段，勇敢地「走向群眾」，如今，我已年過半百，再也不必裝英雄好漢了。臨終還為我加油打氣，相信我所做所為都是好事的母親已不必再為我擔驚受怕了；

陪著我嘗盡苦頭、半夜都要擔心失去丈夫的妻子也熬過來了，在白色恐怖的苦難中出生的女鬼也長大成人了；當年，我還年少氣盛，為了保護家人還要故作英雄烈士狀，現在，我也可以承認我自己的某種「軟弱」了。在那種孤立無援、隨時可能失蹤的年代，我和常人沒有什麼不一樣，一點點的友誼的溫暖與鼓勵都是我最最需要的，也都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我深深感謝在那個年代還願意和我站在一起的每一個善良的人，更感謝成舍我老校長——國民黨中常委張建邦先生都不敢讓我教書了，他敢。

就是在我最感到無助的時候，珊珊（鼓應嫂）走在路上告訴我（因為怕她家被監聽、竊聽），世新成舍我老校長知道我被政治迫、被解聘，很關心我的處境，邀我到世新去教書，想找我去他家先談談；不過，他老人家特別交待，他本人也被「盯」著，叫我某月某日某時假裝是一般遊客，直接去他在花園新城的家，千萬不要讓「那個看大門的」知道我是去找成舍我先生的，免得「打草驚蛇」。

幾天以後，花園新城我是上去了，成舍我先生家的大門前我也徘徊過了。但是，我並沒有去敲成舍我先生的門。

幾個月之後，在更肅殺的氣氛中，我也搬到花園新城住了一年。（據說那時已做好了一個大案子）我也多次去過成舍我老先生的家門口，有好幾回，朋友們遠遠地指著他的身影告訴我：那個人就是半個饅頭都捨不得丟掉，節省得不得了，一心一意要辦報、要辦學校，年輕時代就為了言人所不敢言差點被軍閥「斃」掉的成舍我老先生。

散步的時候，我也曾經走過他的身邊，看到他慈祥的身影。但是我並沒有和他打招呼。我不是沒有那個衝動，我想告訴他，「我就是那個王津平，那個約好要來看您的王津，那個您曾經關心過的王津平……，」我沒有和他打招呼，因為我不敢保證我自己有沒有被監視著，會不會為老先生帶來不必要的麻煩。這是我內心溫暖的一個秘密。成舍我先生是內心溫暖的

秘密。

我結識不少受過成舍我先生「保護」、「收容」的好友：王曉波、曾祥鐸、博正等等，我自己終究沒有接受他的「保護」與「收容」，也有我的一份溫暖的秘密：在那個恐怖的年代，我有我一種傻傻的執著：「倒下一個人，喚醒千萬人」，我有那份豪情，「為了美好的明天」，我也認識不少世新培養出來，在新聞媒體中懷抱著理想工作的年輕人，我衷心的希望世新能培養出更多更好的人才，我也期盼著成舍我先生少壯辦報的理想終能實現；而我自己，一直到解嚴前，都還在政治監牢的門前徘徊，隨時有「失蹤」的可能。性格使然，我自己可以「引刀成一快」，但同時我也希望理想的事業能細水長流地傳承下去。當年，我不想為成舍我先生帶來任何麻煩；我一念之間決定了不為他添任何政治上的麻煩。每次經過舍我樓，成舍我先生的陳列館，看到成舍我先生遺像，我總會情不自禁地再多看他幾眼——他，成舍我先生，是我內心珍藏、溫暖的秘密。

為了當年沒有赴成舍我先生的約，我在他把棒子交給下一代的時候，終於還是赴約了。

捨我者，國民黨 成我者，成舍我

記得成董事長出殯的前多，我獨坐在世新禮堂內他的靈襯前，
為他守靈到深夜，
那是我第二次為非親人守靈。
我知道，
只有不畏權勢的人，才能接納在權勢的夾縫下奮鬥的青年。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李筱峰（世新大學專任教授）

我雖生長在中產家庭，但自小即目睹鄉下左鄰右舍的工農生活，感受民間疾苦與社會不公，養成喜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就讀高中時，因受羅素(Bertrand Russell)、殷海光、雷震、陶百川等人作品的影響，嚮往自由主義的精神，看穿蔣介石國民黨政權一黨專政的法西斯本質，因此不知天高地厚，開始發出不平之鳴。高二那年，在校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寫在離譜的絃歌聲中〉的文章，旋遭校方撕毀，並成為訓導處心目中的異端學生。

一九七一年我考入政治大學教育系後，因看不下去黨化教育的猖狂，開始在當時由陳少廷、楊國樞、陳鼓應等人所辦的《大學》雜誌上發表文章，鼓吹自由教育。大學二年級時，發表〈個性教育往哪裡去？〉一文，遭政治大學訓導處以「侮辱師長、破壞校譽」之名，記大過一次；大三那年，我又在同一雜誌上發表〈奈何明月照溝渠？〉一文，引起甫上任校長的李元簇的震怒，最後終以原「罪名」外加「屢勸不聽」的理由，將我勒令退學。

離開國民黨黨性堅強的政治大學後，我轉學進淡江大學(當時還叫做「淡江文理學院」)，並於一九七七年自淡江歷史系畢業。

一九七九年夏，我自軍中退伍，時值「黨外」運動蓬勃發展，摯友陳永興結合康寧祥於這年六月創刊《八十年代》雜誌，我經陳永興的介紹，進入《八十年代》擔任主編工作。同年年底，「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發生，許多「黨外」精英被捕入獄，《八十年代》雜誌遭池魚之殃，也被查禁，繼而遭停刊一年。我雖然沒有到高雄事件現場，卻也於事後遭情治單位「禮貌性」約談。《八十年代》雜誌遭停刊後，我們雜誌社以司馬文武、康文雄的名義，接續申請創辦《亞洲人》及《暖流》雜誌，但是仍先後遭到當時宋楚瑜所主持的行政院新聞局的停刊處分。

在有志未伸，走投無路之下，高雄《民眾日報》社長李哲朗邀我擔任採訪記

者，派我跑立法院新聞，我欣然接受。不料，進民眾日報跑立法院新聞不到三個月，警備總部的發言人徐梅齡即出面向報社施壓，表示民眾日報讓我跑這麼重要的國會新聞，他們不放心。李社長在警總的高壓下，不得以將我內調，改聘為「撰述委員」，然而警總並沒有因此而善罷，又再度向李社長施壓說「將李某人改為撰述委員，他一樣還會寫稿啊！」言下之意，是不希望我寫稿。社方無奈，最後把我調為「經理部督導」，我自感無趣，只好辭職離開報社，又回到復刊後的《八十年代》及《亞洲人》雜誌社擔任執行主編工作。

差不多在我進民眾日報時，我的一本文集《叛徒的告白》(四季出版社)也遭警備總部查禁，警總查禁我書的理由是「內容歪曲事實，蓄意中傷，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足以影響民心士氣，與危害社會治安」。在那個軍事戒嚴的威權統治時代裡，我的書也被列在禁書目錄中，這到底是我的不幸，還是我的榮幸？

復刊後的《八十年代》及《亞洲人》雜誌，仍經常遭警備總部查禁，我經常要與這些粗魯的軍人玩捉迷藏的遊戲，家裡妻小又經常受到不明電話干擾，惶惶不安，使我備感身心憔悴。一方面我又自覺有必要再進修，於是決定離開雜誌社，去報考當時在台灣史研究上略有成績的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九八二年我去報考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心想，以往警總不讓我當記者、不讓我們辦雜誌，這下子我來讀書求學，總不會有意見吧？沒想到，無所不在的警總，連我要報考研究所，也都出面干涉。我事後才知道，我報名後，警備總部「照會」當時的師大校長郭為藩，要他留意有一位「黨外青年」來報考，為了校園的安寧，最好慎重其事。郭校長原先指示試務人員將我的試卷另外處理，後經內部老師發覺而作罷，郭校長又擬只錄取到我的前一名為止(意即如果我考第七名，則錄取六名)，後來幸虧我考第一名，終使警總和郭為藩之計畫不能得逞。

一九八五年，我從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因環境所限，不便再深造，必須找份工作。然而，純粹為了五斗米折腰，非我所願，可是要找一個能償宿願、能遂志向的工作，談何容易？尤其在國民黨包山包海的專政之下，豈有我這個「異端」容身之處？

在思考工作去向的考慮中，我想到了一個人——成舍我先生。從中學時代起，我就聽聞過他的名字，知道他自由辦報的精神，聽聞過他為了「出版法」曾對當局諤諤直言以致被蔣介石指為「不愛國」的事蹟，這樣的人格特質，最符合我的品味。尤其成舍我先生長期對民主運動也相當支持，雷震時代的組黨運動，他曾經參與過；「黨外」時代的運動，他也很關心。在《八十年代》雜誌

創刊五週年的酒會上，他親自到場致賀。在《八十年代》的捐款名單中，我也親眼看過成老的大名。又久聞他所創辦的世界新專，是一個臥龍藏虎、「異端」薈萃之所，我心想，若能忝列其中，當為人生一大快事。於是，我央請當時的監察委員尤清為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成董事長。

正在等待回音之際，旅居北美洲的台灣人團體「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PA)提供島內青年兩個名額去巡迴訪問美國各著名大學，為期約兩個月，我很榮幸被邀請(另一名額給現任宜蘭縣長的劉守成)。於是，是年七月上旬，我啟程赴美，在走訪過芝加哥大學、華盛頓大學、哈佛大學等名校之後，我們來到加州的史丹福大學。來自台灣的才女張富美教授任職該校的胡佛中心，她熱誠接待我們。我在胡佛圖書館找到許多與我的研究主題相關的二二八史料，正在樂不思蜀之際，有一天張富美教授告訴我，陶百川先生刻正來到史丹福附近的女兒家，他知道我也來史丹福，想邀請我們過去聊聊。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向敬重「為人權法治呼號」的陶百川先生，過去與他也有過數面之緣，這次在海外能再次拜謁他，當然求之不得。那一天陶先生在他女兒家中擺下豐盛的宴席接待我們。我那一次的拜謁陶先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轉捩點，不僅我從陶先生的談話中感受到台灣政治即將會有重大的變化(容以後有機會再敘述)，對我個人最重要的影響是，陶先生問起我的近況，我回答他說，研究所剛畢業，正在失業中，回台灣要趕快找工作。陶先生問我對教書有無興趣，他可以介紹我到世界新專試試看，他說成董事長是他的好友，也是一個能欣賞青年才俊的人。我聽了，心中一陣狂喜，覺得世間事真是無巧不成書。謝過陶先生後，我回到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繼續翻閱資料，約莫下午四點鐘，陶百川先生拿了一封他已經寫好的介紹信，親自跑來胡佛圖書館找我，要我回台灣後將介紹信交給世新的成董事長。我一時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拿著陶先生的介紹信，我縮短以後的行程，趕回台灣。

回台翌日，我拿著陶先生的介紹函趕到世新，適巧成董事長在辦公室。我對他說明來意，他請我坐在他辦公桌的前面，接過介紹信後，他仔細端詳內容，然後面露一絲微笑對我說：「李先生，我看過你的文章，你很有膽識。我歡迎你來世新。不過現在已經八月了，下學年的課差不多都排定了，我想辦法先安排兩堂課讓你上，等第二年之後，再聘你專任。」他的乾脆俐落，簡直讓我不敢相信。面對這位乾脆俐落的老人家，過去警備總部、調查局、新聞局給我的種種壓力，頓然都變得滑稽又可笑。

就這樣子，我進入世新。第一年兼任，第二年起，果然被聘為專任。至今，已是我進入世新的第十四個年頭了。十三年來，世新從專科學校改制為學院，進而成為大學；我也從講師升為副教授，再升為教授。但是接納我、成就我的成

董事長，卻已經不在了。

記得成董事長出殯的前夕，我獨坐在世新禮堂內他的靈柩前，為他守靈到深夜，那是我第二次為非親人守靈(第一次是為林義雄的母親及雙生女)。在他的靈前，我默默地想著，以往，我求學遭退學、寫書被查禁、求職遭干擾、辦雜誌被停刊…如果沒有這位躺在靈柩內的老人家接納我，我的後半生將不知道是何等漂泊的命運。如今，我能從事喜愛的教育與學術工作，又有完全自由的空間供我揮灑，真要深深感念老人家對我的知遇之恩。想著，想著，我忍不住流下淚來，那一刻，沒有人能了解我的心情。

但我知道，我的淚，不僅為感念知遇之恩而流，也為成老一生中不畏權勢的志氣而流。我知道，只有不畏權勢的人，才能接納在權勢的夾縫下奮鬥的青年。這種惺惺相惜的人生哲學，正是我最欣賞的生命情調的抉擇。

為言論自由而殞落的文星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文星雜誌」創刊第三期刊出成舍我先生「狗年談新聞自由」〈附錄一〉一文，旋即被有關方面指為意有所指。一月十七日由中央日報登出社論「亡國主義與救國主義」作預警。

——文章出處：《成舍我先生紀念文叢》

作者/譯者：夏烈

為追憶那個時代，
以及新聞界那些不懼者的風範，
昨天我拿三篇文章的父親看，
他斜坐在沙發上，
背後是窗外大片天光及浮雲。
他默默的看了一會兒，
臉上沒有太多的表情，
只淡淡說了一句：
『很久了啊！』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文星雜誌」創刊第三期刊出成舍我先生[「狗年談新聞自由」](#)〈附錄一〉一文，旋即被有關方面指為意有所指。一月十七日由中央日報登出社論「亡國主義與救國主義」作預警。「文星」當時由家嚴夏承楹〈筆名何凡〉擔任主編，家慈林海音負責文藝部份，陳立峰先生負責一般行政業務。何凡立即再二月五日出刊之第四期以「本社」著文[「互信團結，不必自擾」](#)〈附錄二〉，反駁中央日報社論。何凡更在翌年九一記者節「文星」二卷五期刊出成舍我先生之[「記者節與『感恩節』」](#)〈附錄三〉一文。現再將三文一併出以追憶那個時代，以及新聞界那些不懼者的風範。

「文星」後來被查封是否在創刊第三期就種下了遠因，無法做判斷，因為當時我還是建國中學的高中生，猶記「文星」負責人蕭孟能先生為此來家中與我父母商計對應之道，我們住的是國語日報宿舍日式塌塌米小屋子，天花板低矮〈有時半夜聽到鼠群跑過〉，蕭先生一百八十公分的身高顯得屋子更小。我在臥室內讀書，隔薄紙門傳來客廳〈只有六蓆加走廊〉裡三個大人言談商計之聲。我父親在「互」文中有云：「『文星』同仁並無政治野心，一個非政論性的刊物亦無助於此項目的達成。」此言仍屬實話。我父母剛出校門時均任職於成先生創辦的北平「世界日報」。我母親還是北平世新畢業生，成先生的高足，我國第一個女記者。學生請老師為自己編的刊物寫文章仍屬天經地義之事。

許多年以後，我已步入哀樂中年，在舊金山灣區遇到蕭孟能先生，徵得他同意，重刊此文於成先生的百年紀念專冊。昨天我拿到這三篇給我父親看，他斜坐在沙發椅上，背後是窗外大片天光及浮雲，他默默的看了一會兒，臉上沒有太多的表情，只淡淡的說了一句：『很久了啊！』

我父親明年九十歲，我母親今年八十一歲，蕭孟能先生今年接近八十歲。看到他們，我想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這句話；西方人也有：「We all come and we all go」,這麼簡單瞭解的一句。